

目 录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献档案资料

- 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1)
- 七军工作总报告……………陈豪人(41)
- 红军第七军报告(节录)……………(72)
- 雷经天自传(节录)……………(97)
- 黄一平自传(节录)……………(101)

人物介绍

邓小平在广西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05)

专题资料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30)

回忆录

绥远和平解放和起义部队的改造

……………高克林(180)

进军四川

——和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一次决战 ……………杜义德(213)

转 载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

运动的一些回顾 ……………刘 晓(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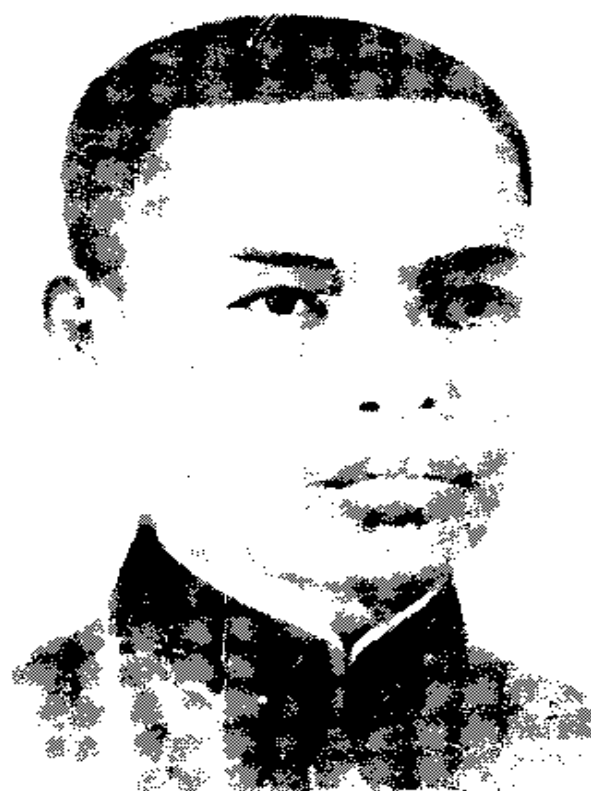
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 邓小平



红七军总指挥 朱德



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李明赞



红七军总政治委员 陈锡侯



红七军政治部主任 陈豪人



右江农民运动领袖、红七军廿一师师长 韦拔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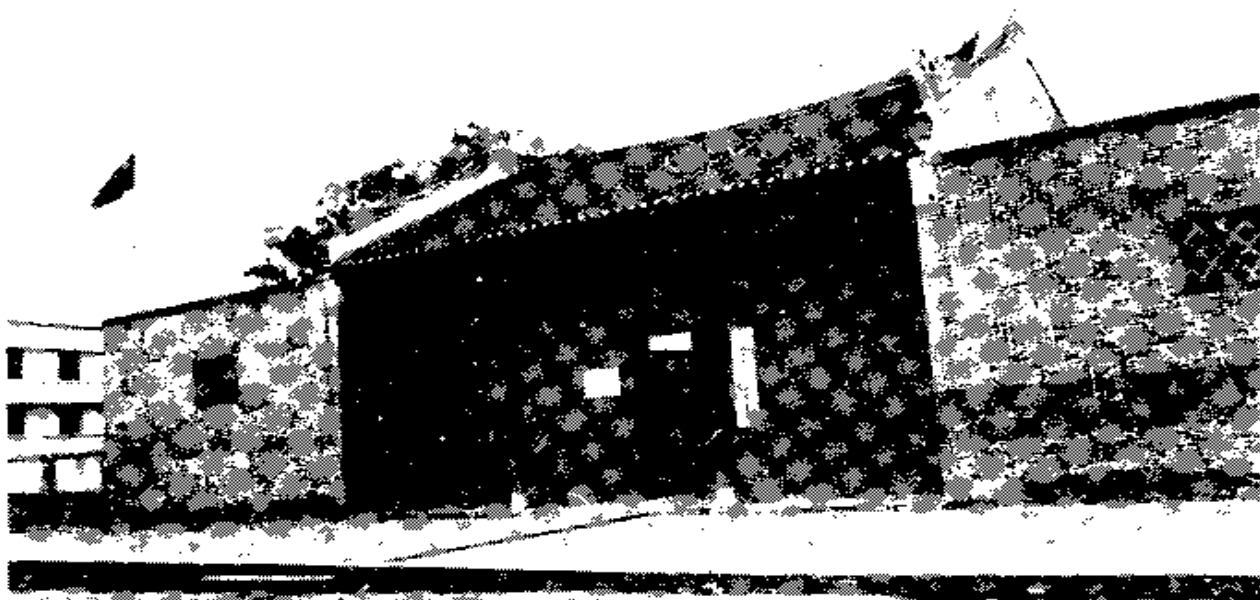
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雷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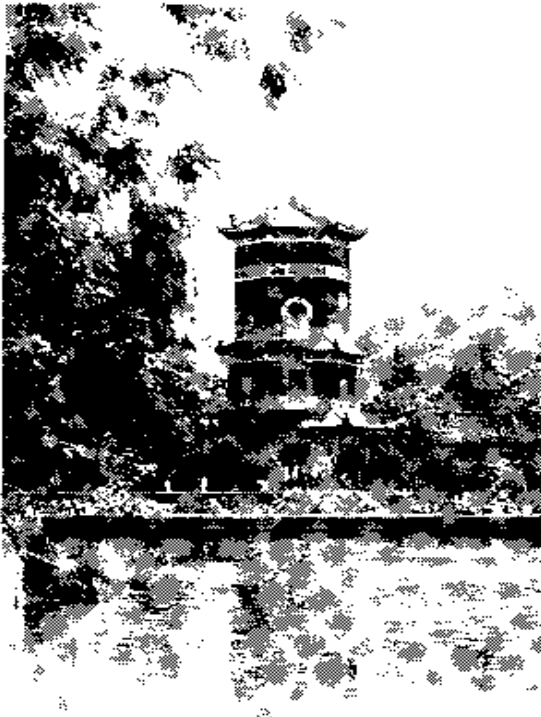
红七军军部旧址



红八军司令部旧址



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



东兰县武篆魁星楼——中共红七军前委曾设在这里。邓小平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布告

各地方革命同志：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为宣传党的政策，特布告如下：中国红军第七军，自成立以来，始终与工农群众在一起，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现正处在艰苦的斗争中，需要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因此，特布告如下：一、土地革命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三、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四、保护工农利益，反对任何损害工农利益的行径。五、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六、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七、开展群众运动。八、实行减租减息。九、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十、遵守纪律，维护团结。以上各条，望各地方革命同志，遵照执行，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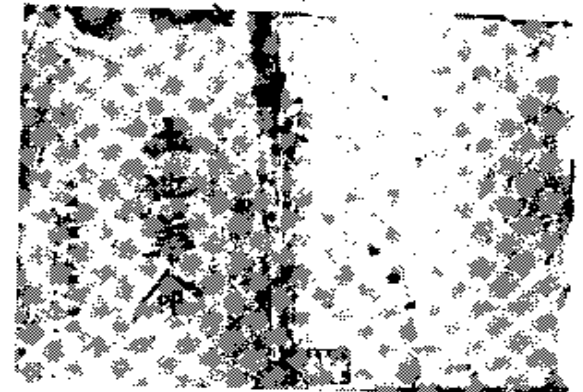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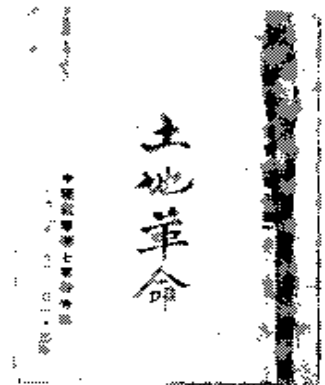
政治部 部长 邓小平

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土地法暂行条例

为实施土地革命，保障农民利益，特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如下：一、土地归农民所有。二、禁止土地买卖。三、实行减租减息。四、发展农业生产。五、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六、建立农民协会。七、开展土地运动。八、实行土地改革。九、加强土地管理。十、遵守土地法规。以上各条，望各农民群众，遵照执行，共同为实现土地革命而奋斗到底。

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右江《土地法暂行条例》



红七军政治部编印的《土地革命》小册子

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 转七军前委的指示^{*}

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

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一、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一)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

目前政治形势最严重的一点，就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帝国主义为要迅速爆发并顺利的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解决他们的内部所包涵〔含〕的矛盾，必定要先从进攻拥有全世界1/6的土地的第一个工人的祖国苏联着手，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建设在各帝国主义包围中一天天的发展，苏联的政治影响在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被压迫劳苦群众中一天天的扩大，更给帝国主义以无限的威

* 标题是另拟的，原标题是“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 〕中的字系编者所加。

吓，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加重进攻苏联的决心。所以杨格计划^①的实行，英相麦克唐纳尔的赴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的增加，太平洋会议的召集，驱使罗马尼亚与波兰不断的向苏联挑战，在阿富汗原来接近苏联的政府被英帝国主义压下来，一直到喉使中国国民党用强盗式的手段夺取中东路，实行把兵力侵入苏联境界，都是表现他们进攻苏联的一贯政策。虽然在进攻苏联和攫取殖民地的分赃问题上表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更加来得尖锐，来得复杂，但是国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更要来得剧烈，是很明显的了！所以自中东路问题发生以后，各帝国主义的直接行动越发加剧，日本增派驻满军队，在沈阳、满洲、宽城子各地以及南满沿线各站加筑炮台和大规模的营房；英国把握着长江、珠江两流域的航行权，加派军舰、海陆军来华，供给国民政府以海军人材及炮舰材料，在下院讨论英帝国“对此问题应采的行动”以及英国扩张在华航空特权，增派大批巡洋舰及海陆军来华，在“非战公约”欺骗口号之下，号召法、意、德等帝国主义向苏联提出命令式的劝告，以图制止苏联在他们一致武力进攻之下的防御抵抗，都是很明显的例证。现在中东路的问题在表面上虽已经成立了伯力的谈判，然而这决不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态度和缓了。这只是苏联和平政策的胜利与进攻苏联的结果，引起了帝国主义之间、中国强盗军阀之间都发生更剧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反对协约国关于解决交付赔款问题的计划。各国代表于1929年在巴黎集会，由美国总代表杨格主持制订了新计划，世称这个新计划为杨格计划。

烈的矛盾，而成立了暂时的协定。所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危机，绝不会因“伯力协定”而有丝毫的和缓，反之，帝国主义更会因此感到苏联前途发展的可怕，更要加紧其对苏联的武装进攻！目前南京就已再三反对伯力条约，就是一个明证。总之，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决不是历史上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统率着各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着殖民地的劳苦群众的一次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残酷的阶级战争。这次战争的危机，决不会有和缓的可能。这次战争的胜负，是取决于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以帝国主义一面进攻苏联，一面还是要不断的镇压本国无产阶级的骚扰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兴起。这样，必然会引起全世界劳苦群众更强烈的反抗，更深一层认识苏联是他们的领导者，这样更可以断定进攻苏联的战争的爆发，必然要引起全世界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要将帝国主义的统治送到他自己挖掘的坟墓中去。

(二)帝国主义之间分割殖民地特别是瓜分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帝国主义国家因为生产过剩增加了抢夺市场的需要，因此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冲突，必然的日益尖锐，且必不可免的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小的问题上都表现出来，特别是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现的事实，现在又重演起来。杨格计划之实行，太平洋会议之召集，以及最近的伦敦海军会议，一面固然是包含得有

对付苏联的问题，一面却充分表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之尖锐，这些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战前必要的程序上的工作。其实，国际联盟完全是英法的御用机关，帝国主义列强积极准备战争的工具，凯洛格公约^①正式成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之一种企图。帝国主义国家军备之无限制的增加，新的政治同盟、军事同盟之缔结，以及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军阀战争积极在中国作军事的布置（如美国占有航空，英国夺取海军，日本在山东、满洲扩大其自由驻兵的范围等），使中国成了爆发帝国主义大战的主要区域之一。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接近，这次战争较第一次要更残酷。这次战争的背影最主要是隐藏着英美间争世界霸权，以及美日间争太平洋的霸权的剧烈冲突，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及其集团间的主要矛盾相互错综的表现出来。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加紧准备期中，各国社会民主党成了最忠实最积极的工具，它积极的帮助了帝国主义作战争的准备，它更积极的压迫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完成了“社会法西斯蒂”的任务。尤其可耻的是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想以和平的假面具来掩饰战争的准备工作的，想重演一次第二国际在第一次大战中欺骗群众的故技。

（三）全国军阀战争的局势更形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

目前政治上第二个中心问题，便是全国军阀战争一天天扩大了。全国军阀混战决不会因为进攻苏联的一致而停

^① 1927年美国国务卿发起订立非战公约，世称这个公约为凯洛格公约。

止的，虽然各派军阀都企图在一致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来和缓或减弱对方的反对与冲突，来发展自己方面的势力，可是正因为这样更加深了军阀混战的危机。因为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统治阶级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的矛盾，军阀制度的存在三大原因（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的反映）所反映出来，欲消灭军阀战争，只有根本毁灭这三大原因。国民党各派军阀的一致进攻苏联决不会毁灭这三大原因，正因为他们都想争取进攻苏联的优先利益和领导权，都想在进攻苏联口号之下来各自扩大地盘，各自扩大势力，必然使这三大原因更加着〔加〕重。当然决不〔是〕说因为他们内部的冲突而减弱进攻苏联的一致。正相反，他们将会因为内战的加紧，更只有从进攻苏联的战争上来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取得帝国主义的帮助，更只有从进攻苏联的战争上散布其“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以转移群众的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过，更只有从进攻苏联的战争上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来表示自己是进攻苏联的急先锋，来相互的指责对方“攻俄不力”！所以目前军阀战争，就在上述形式之下更加混乱起来。蒋介石自从迎合帝国主义的意旨揭出进攻苏联的旗帜，企图领导其他军阀“对俄”，以减弱其他军阀对自己的反对以来，事实上这种聪明如意的算盘，并未能完全打通。当然在“进攻苏联”这一点，是得到各帝国主义的嘉奖的。但是到底蒋介石是特别对美献媚，而要在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伸其势力到北方，这就根本与日本在北方的势力相矛盾了！所以在蒋介石这个计划还未实现之前，日帝国主义就指使其走狗冯系军阀实行向

河南进攻了。这一战争，虽然因反蒋各军阀派别本身的矛盾和日英帝国因蒋介石一再让步，在当时尚未能坚决一致倒蒋，而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仿佛得到胜利，然而实际上的胜利还是归于在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的唐生智、阎锡山等其他军阀。在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也随之嗾使其走狗桂系军阀和改组派——李宗仁、汪精卫、张发奎等，以“蒋介石攻俄不力”为名进行夺取两广及南京政府的战争，使蒋介石在北方不得不接受阎锡山的武装调停与冯系军阀停战，而来抽暇应付两广。同时蒋介石也正因为这样更要向日帝国主义表示让步，让张学良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单独与苏联进行武装谈判，而使日帝国主义在进攻苏联上得到优先利益。然而这决不能和缓在日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各个军阀与在英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蒋系南京政府的根本利益上冲突，所以在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大举南下讨伐李、张之际，而唐生智、石友三等又在日帝国主义嗾使之下乘虚举兵豫、皖以企图进攻南京，以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了！现在两广战争虽然因新旧桂系与改组派之间的地盘之争，和蒋介石以20架飞机，15只军舰、60团大兵，大批毒瓦斯挫丧了张发奎军的锐气而暂时表现南京政府的胜利，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反蒋各势力，蒋介石是无法消灭。唐生智之自动下野，石友三的暂时表示服从中央，并不是蒋系的南京政府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又取得胜利，而是北方反蒋各军阀的缓兵之计，以武装调停来拒绝蒋介石的兵力侵入北方。至于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已亲自从太原到了郑州，一方面以四师兵力向东南进逼，一方

面仍以“和平解决国是”为护符，邀同另一些北方有力的军阀张学良等发出气焰逼人的通电。这个通电发表只是表示军阀战争的局面更是扩大，已经把整个北方以及东三省的大小军阀都转入战争的漩涡，从番禺到沈阳，从珠江至白河两岸都将变成军阀混战的屠场！

最近异常紧张的蒋阎战争已在津浦、陇海两线密布着战云，阎老西已准备在北京成立政府，是战争下笼罩着更凶恶的危机。福建的军阀混战已逐渐爆发起来，两广的战争始终是维持着发展。从此全国进到更混乱的局面，连过去蒋介石的虚伪统一和平的南京政府的假面具都已经打得粉碎，任何一派军阀都不能统一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日益扩大，蒋介石的倒台与否，并不能成为战争继续与否的中心问题，要消灭军阀混战，只有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两广混战的形势完全是全国军阀混战的缩影

两广军阀战争直到现在还未告一段落。这一战争自然同样是受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指使，它同样包含得有英美争世界霸权的矛盾。现在战争的形势，自张、桂军从广东败退以后，广东军即乘胜入桂，蒋介石亦用很猛烈的兵力来协助攻桂，但因广东的两陈有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故对桂处置并不能一致。蒋介石是主张彻底解决张、桂军，有以朱绍良任桂省主席说。陈济棠则主对桂军妥协而仅消灭张军，这当然是拒绝蒋介石势力在两广发展的策略。蒋介石因北方问题的紧张，亦不能不对陈济棠的主张让步。另一方面，张、桂军在暂时因为共同敌人的关系，更不能不勉〔强〕相结合以准备第二次的混战，同时广东军的不一致不

但不易消灭张、桂军，而且即能消灭，两陈马上必爆发战争。一样的，张、桂军万一打下广东，张、桂军必然要爆发争夺广东的战争。因此，两广的混战绝不会有所停止，反之，只有更加延长与扩大。

(五)客观的事实充分证明，目前革命形势的复兴已经走上革命高潮的前夜

目前全国各部分的事实证明中国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一方面，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延长与扩大，其背后隐藏着帝国主义的剧烈冲突与世界第二次大危机的危机，反苏联的冒险政策引起了一切矛盾的剧烈与复杂化；国民党一切建设废约等欺骗群众的把戏完全破产，揭露于广大群众之前；全国的工业、农业的衰败与危机只有日益延长而深入，反之，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全国都在发展与扩大。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引起了不断的群众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已成“平衡发展”的趋势：第一，工人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资本的进攻，失业的大批增加，工资的更加减少，工作时间的更加延长；尤其是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与帝国主义商品竞争，更只有加紧剥削工人群众，因此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日益增长，不仅很快的转向政治斗争而且很快的走上武装冲突。上海数月来的大小百余次的罢工，景德镇的20万工人罢工，北平人力车夫的大骚扰以至于演成极剧烈的巷战，汉口裕源纱厂的工人驱逐军队，青岛纱厂工人的与日本水兵及中国军队搏战，唐山近日又爆发了伟大的罢工，以及武汉、天津、香港、广州这些中心区域的工人

斗争的加剧，都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因为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既不能有丝毫真正的政治、经济的让步，因此改良主义也减少了他的效能，遇到了群众的斗争只有仰赖于武力的压迫。当然压迫越凶，群众的斗争越易走上武装冲突等。第二，全国范围的农村斗争也日益加紧起来，农民群众因忍受不住地方豪绅残酷的剥削和军阀战争的惨祸，只有斗争是他们的出路。所以农民自发抗租税的斗争无论在南方在北方都极其普遍，游击战争的区域继续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更加深入，农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更是普遍了斗争区域，土匪、神兵、大刀会、红枪会的自发骚扰，更是满布在全国各地。第三，红军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不独存在两年有斗争历史的朱毛部队、彭黄部队、贺龙部队，统治阶级无法使之消灭且日益扩大其战斗力，而且赣西南、赣东北、湘西、鄂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等区域都有新的发展。最近你们又在广西西部竖立了红旗。第四，全国的兵士群众也一天天地倾向革命化，兵变的呼声已普遍到全国。军阀们从工农群众血汗里所收括〔搜刮〕的千百万编遣公债并不能用来改善士兵的生活，特别是军阀战争的继续延长，更使士兵沦入不堪设想的痛苦的深渊。所以士兵斗争的情绪也随着他生活的痛苦而日益增加，继续不断的在鄂西的熊师，九江的王均部，芜湖的鲍彤部，湘西的吴尚、周澜部，安庆、埔口、蚌埠的石友三部，上海的熊式辉部，汉口的刘峙部发动有组织的兵变。这些兵变虽然有许多并不是革命的领导，然而总可以证明统治阶级也在很剧烈的崩溃和兵士群众政治觉悟的加速。第五，

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因全国的混乱而更动摇，城市贫民更一天天的走上革命；学生群众更广泛的恢复其革命的情绪，哈尔滨的反帝示威运动，上海的许多示威游行都有广大的学生群众参加，城市反帝国运动更渐渐的复兴，所有这些事实无一不在说明统治阶级已是日益走向奔〔崩〕溃的道路。另一方面，革命形势特别是职工运动的复兴是进展到革命高潮的前夜。

(六)红军第七军的出现虽在偏僻的广西并不能减低它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红军第七军是在上述全国客观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它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各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但它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它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它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它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同时红军第七军的出现更加证明全国革命形势是在日益走向革命高潮之分析是非常的正确。

(七)目前党的任务是在有组织的配合并扩大各部分的斗争促进革命高潮以执行武装保护苏联反军阀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加紧争取群众的工作，并要使各部分群众斗争有组织的配合起来。扩大各部分群众的斗争，必须使工人的经济与政治的斗争配合起来。尤要注意政治罢工的发展，有计划的去组织同一

产业、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同时加紧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推翻政府工会、黄色工会。必须注意扩大游击战争，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兵变，组织地方暴动，最大限度的武装群众。必须加强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任何一派的工作，坚决使“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要求，加紧反帝国主义、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这一宣传并须与各国革命运动的事实联系起来，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和斗争，要坚决认清改良主义是目前革命最严重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执行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以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准备革命高潮的主要任务。

(八)在执行这一主要任务中必须加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反对尾巴主义反对取消派的工作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和执行党的重大任务之下，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成了党的最主要议程。因此必须坚决的反对尾巴主义，反对取消派——机会主义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工作。尾巴主义的结果不但不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且必然脱离群众，出卖群众。取消派更已成了统治阶级消灭群众斗争最得力的工具，已经公开的变成了工贼。只有坚决的反尾巴主义，彻底肃清取消派才能握紧党的领导与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二、对于过去工作应有的认识

(一)第一阶段的主要缺点是仍未能将士兵运动当作最

中心的工作

我们到军阀军队中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发展士兵运动，这是毫无疑义的。广西军委在第一阶段中（即南宁时代）的确对于士兵运动没有多大成绩，且系由军官来作兵运的方式，兵运的工作并没有深入。固然这还有兵运人的缺乏，地方党部没有帮助，在军中工作人多担任了公开的职务要忙于应付公开的工作等等原因，但军委本身仍未能将兵运看作最中心的工作，的确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教导队的事件便是很明显的例证。

（二）第二阶段中虽然已经注意到发动群众的路线，但仍余留了不少第一阶段工作的残余方式

离开南宁到百色后，你们在策略开始转变到正确的道路，坚决的提出了反国民党与短期转变作游击战争的路线。但在实行中虽然已经注意到一切工作向着群众，然执行得极不充分，工作方式还余留了不少第一阶段的残余，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极大部分是采用由上而下方式。许多主要的改变没有使之成为士兵群众的普遍要求，但凭一纸命令来执行。更没有注意到发动士兵的斗争来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即在驱逐反动长官的问题上也没有采用由下而上的斗争方式，但〔而〕是〔以〕由上而下的政治手腕或军事阴谋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绝不否认在初期到右江的动摇时期，可以采用由上而下的军事阴谋与政治手腕，但仅仅这样就非常不够。这样仅是一种和平的转变，不能使士兵群众感受到一种刺击〔激〕而深刻的感到红军的成立是他们从斗争中得来的，增加其拥护红军的决心。过去你们没有注

意到这一点，所以红军第七军的基础现在仍极不巩固。

(三)在工作无基础之下，俞、李的失败与军阀战争的继续，给予了你们转变最大的帮助

在七军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在过去工作的错误与群众工作无多大的基础之下，要是俞、李不失败，你们一定得不到现在这样的结果，且有陷入很深错误的危险。要不是军阀战争的继续，你们在动摇的时期必不能抵抗敌人的进攻而有瓦解的可能，更无余力来发展整顿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帮助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有很严重的意义，每一个同志都应了解没有强健〔固〕的士兵运动基础，只有几个上层的军官是于我们的工作很难有顺利的前进的。如果不改变过来，将来必然要遇到很大的危机。

(四)和平的转变不能当作一般的原则，且包含有很多将来工作的困难

因此，每个同志都要认识，和平的转变，绝不能当作一般的原则来运用。只有斗争才能创造很强的基础，没有斗争绝不能创造坚固的基础。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转变过来了，仍要严重的指出你们的基础不是巩固的，仍然有受敌人运动发生兵变等事件的可能。你们必须继续加紧士兵的教育，以及红军的改造工作，提高士兵群众向外斗争的情绪，只有经过如此的艰苦工作才能补救基础不巩固的危机。

三、以后工作的主要路线

(一)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是最主要的路线

红军在现在的任务最主要的是扩大游击战争与深入土地革命。一定要了解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红军的一切困难，才能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只有坚决的执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彻底肃清乡村中的封建基础，才能掀起广大群众的斗争勇气，才能引导他们为土地为政权而斗争。红军亦才能在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之下求得存在与发展。右江的群众斗争尚停留在反豪绅阶级上，仅有极少地方开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工作，且大都为富农所领导。如果不马上作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必然会使群众的情绪低落。东□在打倒豪绅之后，群众感到没有事做，勇气忽然低降，是很明显的例证。你们必须严重的注意到这一主要路线之执行。

(二) 游击区域的工作仍然是斗争的路线，在一切问题的解决上必须联系到将来的前途

因为中国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地理上的便利，可以使有些苏维埃区域得到相当的时期的存在。所以在许多区域发生了“保守”观念的严重问题，如各地的事实证明了保守观念的存在必然使苏维埃区域遭受失败的结果。我们必须了解，想在很小的范围内求得长期的存在或者幻想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绝不可能的。只有斗争，只有扩大到一省、几省或全国政权时才有这样的可能。这一前提必须坚定的认识，不然，必很易跟着农民的保守观念跑而走向失败。游击区域的党必须在一切问题上打破农民的保守观念，鼓起他们向外发展的斗争勇气，一切问题的解决与宣传必须联系到将来胜利的前途。

(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但须坚决反对烧杀政策

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是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最中心的任务，红军游击战争负了这一任务的广大使命。执行这一任务最主要是消灭乡村中一切封建剥削的关系，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和其武装，消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务使乡村旧的关系有一个大的破坏和改变，必如此才能引起广大农民群众为全国政权的前途而斗争的决心。同时要注意防止大杀大烧的现象，这是农民意识的表现。烧杀政策的结果不但在经济上是自杀的政策，而且烧城市的结果必然违反了工人的利益。尤其严重的是政治上的影响，它给了敌人很好的宣传材料，必然使发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与打击。当然反对烧杀政策亦绝不是主张不烧不杀，必要的烧杀还可给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以很大的帮助，而是反对无目的的乱烧乱杀成了一种烧杀的政策。

(四)反对取消观念必须有坚决进攻的精神

红军在艰苦的困难的斗争中，一方面群众斗争的发展的确可以增加他们的勇气，另一方面仍有发生取消观念的可能，特别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与红军在失败之后，很易发生这样的观念。或者主张处处回避敌人，或者主张将红军分散埋藏到乡村中去以减少敌人进攻的目标，或者主张取消游击战争将武装完全交给农民，这些都是不要红军，不要游击战争的取消观念。它的来源最主要是对前途的悲观，对统治阶级存了过分的估量，没有认识全国革命的形势是日益走向革命高潮，没有了解红军是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

动力之一。取消观念无疑的是破坏红军和游击战争的路线，是帮助敌人的路线。我们必须消灭这样的观念，要以坚决进攻的精神来回答一切的困难，也只有处处站在向敌人进攻的地位上才能打破一切困难。

(五)一切工作必须向着群众，要尽量采取由下而上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不要使群众存在依赖红军的观念

红军所到的地方很易使群众发生依赖红军的观念，有些地方甚至因为这个观念而失败。这主要的是红军的工作方式不正确，没有认识群众的力量。处处包办了群众的工作，没有注意发动群众的工作，其结果群众固然是觉得红军好而存依赖的观念，但到了红军没在时群众便不敢起来。同时苏维埃和工农会亦很易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只凭由上面的命令，而忽略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拥护这一工作。这些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危机，使之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来拥护与巩固。由下而上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右江过去执行得极不充分，以后必须严重的注意到。

(六)建立苏维埃政权应使苏维埃政权建筑在广大群众的信仰上

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完全是不同的形式，议会制度表现了官僚主义的发展，并且是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工农群众的工具。苏维埃则反是，它是站在生产地位的广大群众直接参加政权的反官僚主义的最好形式。同时它也〔是〕由工农民主独裁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它对剥削阶级是专政形式，但对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本身却是

最民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各地苏维埃的建立必须适合于广大群众参加政权与反官僚主义的原则，现在红军所到的地方无疑的应该要计划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但是，正式的苏维埃政权一定是直接从群众代表会议（绝不是仅限于各地革命团体代表）选举出来，绝无所谓还有什么“秘密的”或是“临时的”。在正式苏维埃政权还不能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这临时政权即是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参加人绝不能由红军中政治部委任，而是以革命团体的代表（当然红军代表也是参加这政权的一部分）成立之。在这个临时政权成立以后即应着手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由下而上的建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等到这个正式政权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即应政权移交——一般的原则是如此。但是如果你们所到的地方也没有群众起来，也没有工农革命团体的组织而反动的县长又不得不撤消，这时候当然不能不管他，或者让他处在无政府状态中。这时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就应该暂时代理执行这种政权。他主要的工作应是组织群众，广泛的发动群众以准备召集苏维埃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

（七）实行党的政纲必须与群众斗争的具体纲领联系起来

政纲的宣布与实行在扩大党及红军的政治影响上，在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上有伟大的意义，必定要宣布政纲才能吸收广大群众于政纲之下而奋斗。因此对于党的政纲的宣传和实施极为重要。在揭起红旗的头一秒钟即应向群众宣布党的政纲，使群众能了解红军的行动，使党的影响能

在群众中增高。这一工作你们是注意到，但只是宣布还是不够的。主要的还是怎样能正确的运用这个政纲，使这个政纲不致于成为纸上空文，而实际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你们必定要根据各部分群众个别特殊的情形，在这个政纲总的原则之下提出斗争纲领和斗争口号，并且这些斗争纲领和斗争口号一定要能切合于广大群众的切身要求与客观的可能。

(八)加紧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两大任务的执行

在前面已经指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武装保护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在第一个任务的执行一定要使广大群众了解苏联——唯一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祖国的国际意义，一定要使群众能了解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更一定要尽量的向群众宣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攻苏联（武装的侵略和政治的挑拨）的事实。过去你们对于这项任务的执行，是曾经注意到，在十月革命12周年那一天曾经召集一次庆祝大会。但是这还是由“自上而下”的方式所发动，并不曾使群众对这个任务的意义有广泛的认识，这样当然是很不够的。关于第二个任务反军阀战争你们尤其要注意执行。广西是军阀战争的区域，工农劳苦群众而特别是士兵已经饱受了军阀战争的惨祸奇灾，对于军阀的怨恨，可以说到了极点，这都是便利于你们执行这一任务的客观条件。你们必定不仅是口头向群众宣传军阀战争的罪恶，而且还要在实际行动上号召广大的士兵群众不去为军阀争地盘，挡炮火，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致起来破坏军阀战争的后方、前线。

(九) 加紧反帝国主义和肃清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在群众中的残余幻想

帝国主义在广西表面上仿佛没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广西整个的经济都握在帝国主义手中。法国的纸币布满在市场，特别是右江更与法属安南^①接壤。因此你们绝不可丝毫忽略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不仅利用广西边界的事实来反法帝国主义，而且要运用全国的事实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你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扩大反帝运动与宣传，提起广大群众反帝的情绪。同时要联系到拥护苏联反世界大战的宣传，这与将来的前途有极大的意义，绝不可忽视。其次广西西部群众的确一般的反国民党的情绪非常之高，同时你们在右江对于反国民党特别是反改组派做了不少的工作，但群众并不能对改组派有很明确的认识，而右江群众还多少对改组派存有幻想。所以你们对于反国民党特别是反改组派在群众的残余幻想，工作必须继续加紧，特别是自己基础还未稳固时改组派还有发展其改良欺骗影响的可能。更要加紧向群众宣布国民党勾结一切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残酷的压迫、剥削、屠杀一切工农劳苦群众的罪恶，揭穿改组派欺骗群众压迫革命的阴谋。尤其是改组派在他走到日暮穷途的时候，一定会对群众大肆改组欺骗的毒辣手腕，企图暂时利用一下群众的力量，以遂其死灰复燃的野心。那么你们这种工作的进行，更是刻不容缓。同时反改组派必须与反改良主义的宣传联系起来，才能使

^① 即今越南。

群众得到明确的认识。

(十)加强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尾巴主义的危险成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目前各地一般的现象是党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力量仍然异常薄弱，许多群众自发的斗争党不能领导，许多斗争群众已经走到前线，党的支部还不能起作用。在乡村斗争中很少无产阶级的领导，乡村无产阶级的组织很少地方有。特别是广西西部，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更成了极严重的问题，必须发动并紧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对于乡村无产阶级尤要很艰苦的将他们组织起来，团聚起来。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防止农民意识的发展和尾巴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

(十一)坚决执行反富农的策略

对于富农的问题的确很严重的摆在你们的面前，富农的反革命性和阻碍农村的斗争在你们那里也曾很明显的发生过（如富农公开的在农会提出只抗地主的债，不抗农民的债等等）。因此你们必定要根据中央的路线坚决的执行反富农的斗争，以种种的方法来打击富农。特别是在党的组织中、军队的系统中、苏维埃的组织中、农会的组织中，毫不迟疑的排除富农，在斗争中排除富农的影响。为要这样，在农村中一定要加紧雇农的组织，加强雇贫农的领导。一定要在农村中公开的提出雇农所拥护的斗争纲领，如富农反对则应以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甚至在没收反革命财产的政纲之下没收其土地。左右两江的斗争领导权过去多在富农的领导上，转变这一领导权到贫农、雇农的手上，

是极困难的工作，你们绝不可只用一道命令取消某几个富农的办法。这样，只能取消几个人，而不能根本肃清富农的影响，你们必须多用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方式来驱逐富农。

(十二)红军第七军发展的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联络，以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同时应推动当地广大群众起来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

红军第七军必定要向外发展才能实现其主要的任务，他的发展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汇合起来，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前途。目前广东代表大会已决定组织各种斗争汇合起来，如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均入粤发展帮助东江发动整个的地方暴动，北江发动游击战争，南路发展琼崖的游击，以及加深全省的士兵运动、工农武装等等。这完全是争取广东先胜利的计划，红军第七军无疑的要与这一工作计划配合起来，使之能够实现。中央已另给朱毛与广东的指示，要他们迅速发动北江的地方暴动，扩大湘粤桂赣四省边界的红色区域，经过这一游击发展可以与你们联络。因此，中央对于你们进攻南宁的策略，认为根本不能适用。不但会助长旧势力的发展，而且偏于割据，离开了与各方革命势力会合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目前广西桂、张军阀的军事力量已偏重桂省中南部，中部以北已渐空虚，湘军亦因全国混战有撤退的趋势，因此更便利你们向湘粤发展。同时你们向湘粤发展时必然要将当地的农民队伍带一大部分出来，因为

这些可以锻炼为红军中心战斗力量。

(十三)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加紧白色区域的工作

红军不可能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制胜敌人，红军的游击战争之扩大必须与群众斗争汇合起来，才能有胜利的保障。因此，必须用一切的可能，无论在政治的影响上，策略的正确运用上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使红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使红军成为群众的武装。同时必须加紧邻近白色区域的工作以与扩大游击战争的任务联系起来。对于加紧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的保守观念下是很容易忽略的，望你们特别的注意。

(十四)猛烈的扩大红军的组织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武装工农群众亦即所以扩大红军基础，故武装农民不宜用分散武装的办法

尽量扩大红军的组织是目前主要任务之一，但红军的扩大，绝不是招兵买马的方式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你们已经感觉到招兵的困难，一定要了解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情绪提高时才有便利扩大红军的条件。同时也只有吸收工农武装中的进步分子来扩大红军才是最妥当的办法。所以你们必须经常注意到鼓起广大群众参加红军的宣传，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同时必须尽可能的帮助群众以武装，不可存好枪留着坏枪交群众的观念。固然补充红军本身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工作，但一定要认清武装群众加紧对群众的教育与集中的武装训练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当然在武装农民不宜用分散武装的办法，而是要集中组织编为红军。

四、各种具体策略问题的回答

(一)群众工作方面

1. 苏维埃的组织和工作

除了一般原则在上面已经说明外，还须注意下列几点：

- ①苏维埃必须是群众的代表会议，由此代表会议举出若干人来组织委员会处理政权的工作，代表的任务在会议后即已完结，代表应将群众的要求报告于大会。同时要将大会的决议报告于群众，群众有随时撤退其代表的权力。
- ②工人代表应占主要的成分，某一企业或职业可以直接举代表到代表会议。雇农更有两重选举权——乡村群众大会与雇农工会，这样的办法对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有很重大的意义。
- ③苏维埃的组织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其系统为村、乡、区、县、省苏维埃。村是苏维埃的基础，村乡苏维埃只设常务委员会，不设执行委员会，区县则应组执委与常委，下面设多少部或委员会由当地实际情形决定。
- ④苏维埃成立的第二天必须议决一些法令颁布出去。
- ⑤苏维埃是政权的组织，不可采用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如在下设立小组等。失败后无疑的苏维埃自然取消，仍由工农会来指挥一切。
- ⑥富农在苏维埃中无选举权。

2. 对工运的策略问题

广西，尤其是左右江的雇农工人是极少，但手工工人们具有相当的数量，他们仍然是先进的群众。乡村的农民运动如果没有城市工人的领导是不能上正轨的，所以我们

一定要加紧工运的工作，最主要是在左右江发展他们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去组织他们。应在群众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党在赤色工会中应该要有核心的领导作用，提出适合于工人群众切身要求的斗争纲领，必定要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厂委员会”，经过工厂委员会，从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到党里面来。对黄色工会主要的策略应依照最近中央所决定的，一定要在黄色工会里组织赤色小组，不仅揭穿黄色工会的改良欺骗的假面具，而且公开的提出赤色工会的纲领来号召，使群众能脱离黄色影响之下而团结在赤色工会的周围。在左右江一带的失业工人，我们应该要很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很快的引导他们到斗争方面来。雇农、手工工人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应该要发动他们来组织雇农工会成为农村斗争的核心！在有农会的地方，雇农应在农会中成立小组，以便能在农会中起领导的核心[作用]，这个小组就是雇农工会的基础。雇农工会的组织系统一县有县雇农工会，一区有区雇农工会，一乡有雇农小组；县雇农工会必加入县总工会，所以雇农实际上有两重作用，将来也可以参加城市的政权而同时又得参加乡村政权。但是，这样并不是与贫农离开，雇农在乡村应要有独立的组织，实为了要起领导作用。

3. 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问题

第一，目前乡村的斗争最主要是反对封建剥削与要求土地，游击区域必须坚决执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的工作，才能实现消灭封建势力，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第二，富农在斗争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当然对反革命的富农不能对

于没收其土地问题发生犹豫。在政纲不能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这主要是在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但在政纲上必须在第二条就订出“没收反革命财产”的条文。对富农能遵守一切法令政纲的当然可以不没收其土地。第三，凡是带有封建剥削性的土地与财产，如祠堂、庙宇等必须坚决的没收，即对孤寡的很少土地只要是他租给人剥削人的都要没收。一定要了解没收土地是一回事，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又是一回事。第四，没收土地后一定要宣传土地是天生的，打破私有的观念，并宣布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即是归群众自己，禁止土地的卖买。第五，没收土地后的处理问题，一般的运用，经过三种方式：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与共耕。这三种方式都有其客观适用的条件，我们不能机械的决定，必须交乡苏维埃按照群众的要求来处理，一定要相信群众有解决此问题的力量，不过一定要注意防止富农阻止分配土地的斗争。第六，分配土地的办法与标准必须以当地群众的要求为准则。第七，为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雇农，乡村手工业工人以不分土地为好。但亦不能机械的运用，或者仅消极命令不分，而应从积极方面颁布劳动保护法令来保障其生活使他们自愿不分土地。当他们要求分土地时，绝不可机械的阻止。

4. 农协问题

在成立了苏维埃的区域农协已失其作用，应该取消。不过有一个实际问题即在目前斗争时期，苏维埃区域仍时有失败的可能。失败后仍要团结群众在农协之下，故在目

前苏维埃区域仍应保持其相当的作用。但必须坚决执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农协逐渐减少其作用，在农协在群众中尚有很大信仰时，更不应用一纸命令取消农协的办法。在农协中应坚决的将富农排斥出去。

5. 农头问题

广西的“农头”虽在反军阀、反豪绅的斗争有了长期的奋斗的历史，但是因为他的出身很复杂，还保留着很浓厚的封建色彩，尤其是多注重梁山寨式的领导，极妨碍群众直接的斗争。要是他们来找我们进去工作，我们当然不是拒绝，而且我们自己还要找线索能够打进去。但是我们派人打进去主要的还是在夺取他下层的群众和转变他内部的成分，而决不是仅仅只就其“农头”暂时与我们合作就够了。反之，如我们艰苦工作的结果已经在群众中有强固的基础，即是“农头”表示不跟着我们来，我们也有方法解决他。所以“龙〔农〕头”的能不能转变都不成什么严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要着重如何才能转变还在“龙〔农〕头”率领下的下层群众。

6. 城市贫民工作与组织

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紧，军阀混战日益剧烈，人民生活日益痛苦，城市贫民必然日益走上革命道路。对城市贫民工作，绝对不要忽视，应发动其组织，领导他们做反帝、反国民党、反苛捐杂税及拥护苏维埃政权一切斗争。广西的城市贫民运动尚未开始，的确是过去工作之缺点。

7. 土匪问题

土匪的领袖，大都是投机分子，很容易被土豪劣绅利

用。但是土匪的群众都是失业的农民和工人，被生活压迫，流为土匪。我们应该夺取其群众，消灭其反动的首领。广西土匪特别的多，若忽略了夺取土匪群众的工作，必然任土匪走到反动势力方面去，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为红军发展前途的障碍。然而收编土匪必具有几个条件：一红军的武装力量胜过土匪；二有群众斗争来推动；三在土匪群众中有相当的工作。在赤色区域中必然有不少的土匪来投。我们收编的步骤：第一，要他们能接受我们的政纲，并执行我们的政纲；第二，派人去艰苦的工作，以转变其下层群众的心理。经过相当的工作时间群众已倾向我们，即应坚决执行第三步骤改编其队伍，若其首领表示动摇或不革命，当毫无疑问的以群众力量来解决他。即是表示得很好，也应更调别的职务。要彻底的改变其组织，才能成真正革命力量，才能编为正式的红军。在开始收编的时候，万不可给以红军的名义。

8. 学生运动

对学生运动的工作，你们并未开始做，只曾注意到，曾派同志到学校里去组织委员会，曾提交学校补助金1000元。对于学生的解释，过去在党的决议中都有不妥当的地方，把学生看作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分子，但是实际上的情形不是这样。学生中有许多是富农、地主的子弟，这一部分富农、地主的子弟，很容易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到了上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必不可避免的要动摇。最近中央已经把这种意见更正过来，认为不能把整个的学生都看做民主主义的分子，也不是把所有的学生都看做工农的同盟军

(虽然有一部分是民主主义的分子，是工农的同盟军)。所以还需要我们以共产主义的教育去影响他们，组织革命的学生会，去吸收学生中的革命分子，真正民主主义的分子。

9. 少数民族问题

广西内部杂居不少的瑶民，这些瑶民虽然大部分同化汉族，然还有不少的种族关系。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生活的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要他们起来反对汉人(是统治阶级，并不是整个的汉人)的压迫，要他们脱离酋长制的领导以求得本身的解放。对安南民族也要在斗争中去影响他们，号召他们对法帝国主义独立，并要与他们互通声气。

10. 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我们主要工作之一，应抽出一笔较大的经费，专作宣传之用。各个苏维(埃)和民众团体应有定期刊物，前委除现办的《右江日报》以外，还要办一种党的刊物，对外公开的发行。主要的材料是党的对群众一切宣言，党的主要策略和路线，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群众对党有明确的认识。对外宣传的主要点，已散见前面，不再列举。

(二) 经济方面

1. 对商人的态度与允许中小商人营业的策略

对商人一般的策略，此地用不着详细说明。此地要特别指示出的只是我们决不能“明令保护商人的利益”。因为

商人是剥削人的，我们工农革命政府决不能容许剥削人的人存在，更不应“明令保护”其利益。我们能容许中小商人存在只是为了保护工农兵的利益，但是虽然容许他，还是必要严厉取缔他在革命政权下继续过分的剥削人。所以我们在布告（只能用布告方式，决不能用告商人书）上一定要这样说明，不然必会模糊群众的观点。对于大商人尤要特别的注意，到了革命紧张的时候，大商人必定反革命，应毫不迟疑的实行政治没收。

2. 经济解决的主要来源

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对这一问题首先一定要明了，你们现在所占据的还是游击区，还是要在斗争中去求发展，因此解决经济的问题，第一，必定与红军进攻的策略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进攻以求向其他区域发展，则敌人可以用经济封锁“久困穷追”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尤其是在处在广西一隅的你们，交通既不甚方便，经济的来源又不甚流转，对于这个问题更加要十分留神。第二，必定要很广泛的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广大的农民渐渐的认识红军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应自动来给养红军。当然这个前途目前还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使同志能了解并注意这个前途。在目前要广大群众自动来给养红军的前途，还没有到的时候，一定要以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一切政治没收的没收和征收统一累进税为给养红军的来源。

3. 禁吸鸦片烟运动

鸦片烟的害处是人人知道，在赤色区域，当然要禁止吸食。但目前政权还没有稳固，群众对于鸦片烟嗜好，

还很深很普遍，绝不能以一道命令来禁止贩卖。同时广西最大的商业便是转运鸦片，如果我们只是据尔禁止其在我们的区域转运，事实上并不能禁止他从其他处（如从安南）转运，事实上也不能因此根本杜绝群众对鸦片的嗜好，只是反于经济的流通，商品的流转，更碰到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因鸦片的转运这件事体上存在商人的作用，而以加重其税务来解决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抽来的税暂时解决我们军队中的给养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商人转运其他日用商品到我们区域来，使我们不致于发生大的恐慌。不过这绝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是我们在目前困难环境中的一种并不违背原则的临时办法而已。所以我们还应从群众的本身来作反鸦片的宣传，而且这种宣传尽在右江还不够，还要扩大全国。如当地群众已有基础，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当然即可在当地以群众的力量执行严禁鸦片烟。但是这种禁止只能就当地执行，如贩卖到其他处去只是从当地经过，当地还不能执行扣留，还只能特别加重其税务。当然我们决不能对鸦片烟还“明令保护”，反之，我们还要向群众解释特别加重其税务的意义和加紧并扩大反鸦片烟的宣传，渐渐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总之，你们决不要把目前所能收到的鸦片烟税当做唯一长久的经济来源。

(三)军事方面

1. 游击战争的战略

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第一，要有进攻的精神，不仅发动群众斗争要有进攻的精神，即是经济问题，给养问题

的解决都看我们能否采用进攻的策略为转移。保守观念或割据观念结果都只有走到被敌人消灭的前途。因为游击战争也只有进攻，如果割据一区，则敌人将用经济封锁、久困穷追的诡计来使我们归于失败。所以只有进攻才能保障我们的胜利，只有进攻才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也只有进攻才能冲破敌人的包围。当然此处所说的进攻并不是“英雄好汉”式的、不顾一切条件的打硬战和无目的东打西征，而是说要经常的有这个精神，利用一切机会以群众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的力量。第二，在我们不明了敌情或其他条件未具备、无胜利把握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攻坚或打硬战，这种避免当然站在进攻的精神上，一方面保持自己的部队不作无益的牺牲，一方面加强敌人所在地的群众运动以及敌人部队中的士兵工作，使敌人的势力由强变弱。第三，一定要善于运用“集中”与“分散”的策略。“集中”与“分散”并不是两相对立的，也不能机械的应用，而是要有集中的指挥去应付敌人，要有分散的运动去推动群众，使“集中”与“分散”能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互相配合起来。其余如用绕圈子办法来避免敌人的追击，用波浪式的推动去影响其他区域的斗争在相当时也可以采用，但这不是主要的策略。

2. 红军的编制

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惟旧有的部队，未能分别改编，很容易被旧有的反动军官所煽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们一定要立即改变原有的组织，将各部错综编制，而且要将农民群众参入进来。

3. 农民武装编制与训练

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无疑义的要尽可能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决不是招兵买马的方式可以做到的。集中农民武装编成红军，成为扩大红军主要方式之一。编制农军，不特是扩大红军并可保护苏维埃政权。若没有武装工农，在红军离开后，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是很难保存的。广西农民普遍的有枪枝，惟大部被富农意识或反动豪绅所领导。使其能在我们政治影响之下，而加以编制，集中训练。编制农军的办法要以建立红军基础为主要原则。编制系统目前应属于农会，我们党必定要在里面起领导作用，从斗争中训练成为红军。

4. 士兵的训练

因为你们这次的发动，是偏重自上而下的和平转变，所以对于发动士兵斗争，在斗争中去训练士兵的工作，的确做得很不充分。现在虽然你们的部队已变转成为红军，这个斗争，还是不能放弃。保留在你们部队中的政治上、生活上、经济上的弊病还多，还需要我们用很大的努力去发动士兵的斗争，加强士兵对我们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以求渐渐的消除。当然除发动士兵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去训练士兵以外，是需要经常的采用很多的特殊方法，如早晚点名呼口号，个别谈话，集体的举行报告讲演会，办兵士壁报等等，以启发士兵的政治认识力。

5. 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作用

军队营、连均应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系统，系隶属于军中政治工作系统之下。士兵委员会的作用：

①推动民众的组织；②训练士兵并管理士兵日常生活的秩序；③审查军队的用费；④对军中行政的建议；⑤维持军纪，设立裁判委员会，以解决兵士中所发生的纠纷（如极小的事，可不提裁判委员会解决，可由长官执行，如到战场上军官有执行一切军令之权）。在这些权限的执行中，一定要防止对于军事行动有妨碍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故兵委是经常受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指导的，如果有严重的错误时，政治委员〔会〕得解散而重新组织之。

6. 士兵成分问题

虽然你们的军队已改变成红军，但是你们的军队原来是由军阀部队改编过来的，里面的成分一定要改变。士兵的成分在原则上一定要吸收贫农，必须经过农军训练。对于老兵中十分不可靠的或者还保留他原有的旧习惯的，当然要设法淘汰。但大部分还可以保留，加以训练，分散到各队去用其军事技术，训练新兵。

7. 薪饷问题

红军绝对不是雇佣的军队，所以20块的薪饷，是绝对要渐渐的使其废除。虽然在方才转变的你们的军队，要立即废除当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一定要努力完成这个前途。在士兵群众中施行广大的宣传，并且经过经济公开，当兵夫役一律待遇平等，〔用〕这些办法来使士兵群众自己起来废除薪饷制，只有零用钱及供给伙食、衣服。

8. 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与政治委员制

前委是军队中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和党的最高指导机关，前委之下有政治部，政治部执行前委的决议，对内施

行政治教育，对外参加群众工作。政治部一定要是党的组织，政治工作人员并一定要是党员。政治部的系统，军有军政治部，纵队有纵队政治部，纵队以下则为政治委员，但军与纵队除政治部以外，尚须另设政治委员，此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可以指导政治部并得至最高长官会衔施令。营以朱毛那里的经验，并不要设一政治委员，只设直属支部，但要是你们现在觉得感到困难，也可以设一政治委员。前委必成为所到地方党部的政治指导者，但一定要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独立的组织。至于军队中与政权的关系，决不能以党的名义，应以军队的名义。若要与政权机关合同筹划一件事(如筹款)，应以群众政权居主要地位，以使群众明了并不是军力统治政权。除上述应健全党的组织系统以外，应加紧健全下层士兵支部的工作，支部以连为单位，应经常建立连支的中心工作，定期召集开会，定期到群众中去宣传，使每一个士兵都能自动的来了解党的决议。

9. 收集反动武装

广西地势险要，便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也便利于反革命势力的存在。因此广西即是在你们所游击的西南一隅，反动武装（如商团、民团的武装）仍然很强。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武装必定要加以注意不能忽视。在我们所能影响到的地方，一定要以广大的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在每种特别情形之下极相当的可由军事阴谋来解决这类武装，但还是要经过群众的路线，在解决后一定要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

10. 在周围敌军中的工作

在周围你们的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你们过去是未注意到。现在正值军阀混战继续扩大的时候，敌人军队士兵群众必定一天天的因为忍不住本身生活的痛苦而倾向革命，敌人的统治也必日益动摇。因此我们必定不能放弃这个工作，找线索有计划的征调同志及有斗争性的工农分子打入敌人军队中以夺取其下层群众，使其不为军阀当炮灰，不替军阀压迫工农，不打红军，实行有组织的兵变，与工农红军携手。

11. 军事交通网的建立

为要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你们必定要建立单独的军事交通网。你们应在思林建立总的交通处，经过龙州、谅山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由省委与中央发生联系，并由思林又直接与广西特委发生联系。除此以外，还应在平马、百色、东兰、凌云等中心区各建立一交通处，以便你们的行动能互相配合。

五、左江问题

(一) 左江具备了很好的革命条件

(1) 右江驻军转变成红军以后，可以提高左江驻军士兵的革命情绪，尤其是吓得左江驻军领袖李明瑞等发抖，减少其复兴及投机的幻想，对于我们的活动，不敢加以十分的压迫。(2) 在粤桂军阀混战未已的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不久的即过去），敌人不能抽调大批军队进驻左江。(3)

在左江驻军中，已有很多的线索打进去工作。(4)左江的农民，已有相当的组织，并经过与豪绅的长久斗争，惟大都在富农领导之下，而对于国民党的凶恶，已有相当的认识，只要加紧工作，可以转变成革命的一支力量。有了这些原因，很便利我们工作的进行，开辟为赤色区域。

(二)加紧左江的工作，应运用过去右江的经验，最主要的是群众工作路线之坚决执行

左江虽具备了很好的革命条件，若不加紧工作，或不能执行正确的工作路线，仍不能很快的促成革命的实现，过去工作毫无成绩，即其明确〔证〕。左江的工作，应运用过去右江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坚决执行发动群众工作的路线，才能树立起革命的势力，否则即挂起了红旗，仍不能巩固，革命不能深入。

(三)对旧军官不能存有丝毫幻想

在左江军队中的工作，主要的是夺取其群众，自下而上改变其军队性质，绝不要对旧军官存有丝毫幻想。即旧军官甚至其军事领袖，因一时没有出路，外面〔表〕上对我们表示很好，也不可信任，给以任何名义，仍保留在旧部队。如果他真正觉悟，愿为革命工作，可派往其他红军中工作。充其量只能利用线索打入到各方面去，此点应很坚决的认识。如果有丝毫妥协犹豫的精神，将来的危险很大！即或他自动的扯起红旗，来欺骗群众，我们也应该认识其用意，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监视他的行动。

(四)加紧发动士兵的斗争，迅速组织兵变的实现

夺取士兵群众，只有加紧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要由

这些斗争中，才能唤醒他的阶级觉悟，才能坚强他们组织，才能使他们认清军阀的罪恶，才能使他们诚意的自觉的拥护红军。反动的动摇的军官，尤其要以群众的力量解决他。绝对的不要只利用上层线索，以政治手腕，军事阴谋等自上而下的和平转变方法。右江曾犯了这个毛病，所以他的基础仍不很稳固，前途的危险尚多。由这些日常生活及解决反动军官等斗争日益发展中要很迅速的**组织兵变**，以群众的力量消灭反动军官，由士兵要求转变成红军。

(五)右江兵变后应于短期内发动左江群众建立群众政权，然后向右江集中

组织兵变，不独要经过士兵的剧烈斗争，还需要群众力量的推动。在兵变以后，应于最短期间内，更普遍的发动群众，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群众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只有群众起来，才能保护群众自己的政权。若红军不能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政权，是放弃了自身的责任。左江群众政权建立起来了，左江红军应向右江集中。

六、地方党部

(一)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

广西左右江党员的数量很微弱，若不发展党的组织，增加数量，群众很难得到党的领导。党应加〔该〕在群众剧烈的斗争中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入党，以扩充数量，扩充数量中同时应注意党员的成分。现在右江党的基础，还建立在大多数富农知识分子身上，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在

斗争中吸收无产阶级的成分到党内来。富农实际上是反革命，应驱逐其出党。知识分子也要特别加以训练，主要的要使其有很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意识。

(二)党与群众关系必须划分清楚

在赤色区域中，每易发现党包办一切的现象，使群众认不清是自己的政权，是自己的组织。党在群众组织、在群众的政权机关只能以党、团起核心作用，党与群众关系必须划分清楚。

(三)健全地方党部

广西地方党部工作，可以说以前简直是没有建立。因此群众斗争的领导，完全失去中心。你们现在必定要尽力注意这个工作，必要加强巡视工作，以帮助地方党部建立独立的工作系统。为要这样，并要注意中心区域与中心工作的配合。

(四)建立支部生活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生活没有建立起来，党的任务即无法执行。广西党的支部很不健全。以后应加紧建立支部生活，使每个支部，都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教育和训练同志，经常分配每个同志工作，使每个同志都能做党的组织员和宣传员，按期到会发言，自动缴纳党费，并能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急先锋，领导群众斗争。

(五)加紧干部训练

党的工作人员一定不能尽靠上级机关供给，必定要设立定期训练班来训练一批干部人材，再由这批已经训练好

的干部人材到下层群众中去设立广大的流动训练班，在斗争中去训练党员干部！

(六)秘密工作

为使党的工作将来不至于在红军退后被敌人消灭，你们在公开环境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党的秘密基础。

(七)党的经费

地方党部的经费来源，一定不要专靠红军来补充，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八)交通网的建立与特委的关系

为要使工作能得到正确周详的指导，各地方党部应要经过交通网与特委发生紧密的联系。

七、几个零碎问题

(一)批准前委名单

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指定小平、昭礼、云逸、龙光、伯群、云甫、世昌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昭礼为政治部主任，云逸为第七军军长，小平、昭礼、云逸三人为常委。

(二)军应设军政治委员

军应设军政治委员，指定小平为军部政治委员。

(三)供给中央经济

党的经济来源唯一的是征收党员月费和特别捐，赤色区域募集特别捐，比较容易，以后应经常供给中央经济。现中央经济极艰紧，甚望源源的供给。

中央为使你们明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这
政治形势下，你们应注意的工作方针，特给你们这封很长
的指导信。希望你们在接到指示以后与从此回部的△△同
志详细讨论，详细制订一部分工作的具体计划，并将执行
的程度以及执行中所碰着的困难情形时常报告中央！

（另附中央70号政治通告请参照讨论）

党的敬礼！

中 央

3月2日

七军工作总报告*

(1931年3月9日)

陈 豪 人

一、七军成立前准备工作

1. 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我们的策略

自俞、李进攻广东失败之后，俞之部队几全数为旧桂系所掌握，所余者仅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及教导队三部。教导队中则有我们相当的基础，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中我们亦有工作，但第五大队基础极薄弱而已。俞失败出走，李明瑞率其特务营及第五大队（俞作豫的）往左江龙彬〔州〕一带，张云逸则率第四大队及教导队，往右江、百色一带。因为俞、李失败后，广西旧桂系复兴，仍形成与广东对抗之局面，军阀混战仍未已，四、五大队在左、右江之割据始能安然无事。

右江各县与滇、黔交界，在军事上对于广西局面非必争之地，且交通阻塞，经济落后，地形险要，易于形成一独立之区域。当第四大队至右江之时，俞之旧部第三大队

*〔〕号中的字系编者所加。

亦跟踪而来，该部多系土匪编成，约一团人，枪仅400多枝。三、四大队因同在俞之旗帜之下，虽两方猜疑甚深，表面上仍安然相处于右江各县。但右江土匪如毛，与第三大队均有历史关系。同时右江一带豪绅力量颇强，各县均有豪绅武装，已编成队伍中共有枪2000余枝。右江豪绅在历史上与俞作柏政权成对抗之局面，第四大队以俞之旗帜驻右江，所以各县豪绅蠢动，东兰、凤山、凌云各县县城均为其占领，有与第三大队土匪合谋解决第四大队之企图。

当时右江群众反豪绅之斗争情绪颇高，各地与豪绅武装冲突之事不断的发生，尤以东兰群众力量为大，因该县农民在韦拔群领导之下已有数年斗争之历史。不过其它各县群众之组织基础甚薄弱，农会才开始组织，武装亦甚少，党的领导力量更微弱。右江十多县中仅东兰、平马、思林、奉议四五县有党的组织，且只有同志三四人、七八人不等。

第四大队虽在俞之旗帜之下，但大队长为我们同志，下级干部及士兵中我们亦有一部分力量。教导团的基础在我们掌握中。且俞已出走，客观的环境极便利于我们的工作。第四大队力量，共有三营人及机关枪连，人数千余，步枪1000杆，再合教导团约一营人，共有枪1300杆左右。尚有第五大队第五营，当时亦在右江，归第四大队指挥，惟该营营长极反动，且驻兵地方偏僻，实际上指挥不到，形成独立力量。第四大队除已编成队伍之力量外，在军械方面尚有从南宁搬来步枪千余枝，子弹七八十万发，大炮四门，迫击炮六七挺，水机关枪七八挺，轻旱机关枪十数

架，在军实方面不可讲不充足。惟当时俞之故旧及学生在四大队中充当干部者甚多，力量不弱。我们在兵士中基础又不广大，所以转变为红军之企图尚不能马上实现。当时军委（左右江军队中党的最高机关）即照以下之策略积极进行：

- （1）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
- （2）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中）；
- （3）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
- （4）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
- （5）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

2. 改造第四大队与发动右江群众工作

根据以上策略之决定，我们去进行改造第四大队与发动右江群众的工作。自1929年10月第四大队到右江以后，经过约二个月之工作，成绩颇好。兹将工作经过情形概述于下：

当时豪绅主要力量集中在东兰、凤山一带及平马的乡村中，与第四大队对抗，随时向农民袭击。我们到右江之第一天即开始武装农民，运来之5000杆步枪，大部分都是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以武装群众，组织农军。右江群众得此大批武装，并眼见着第四大队站在农民方面反豪绅，莫不欢天喜地，斗争情绪益高，天天向豪绅进攻。农民与豪绅的武装冲突，逐蔓延右江各县，第四大队亦分兵帮助各县农军扑灭豪绅。在当

时反豪绅的武装冲突中，每次都有广大群众参加，且在作战中继续不断的增加群众的数量，张曾给以第四大队士兵以深刻的影响。他们过去在军阀部队当兵，在军阀混战及剿匪时，只看见两方敌对兵力的对抗，绝未见过有群众热烈参加的情况，所以当时士气甚盛。士兵时常高兴地说：“我们的人愈打愈多”啊！同时“打倒土豪劣绅”的实际行动在第四大队中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经过这样的武装冲突之后，东兰、凤山县城均为农民所占领，平马的豪绅也受重大打击。第四大队又派兵光复了凌云县城，豪绅的气焰稍扼下去。不过在与豪绅的冲突中，农民群众实行烧杀政策的错误倾向颇严重，每攻下豪绅所占据之村庄，必焚毁一空。且亦不分别是豪绅地主抑系其统治下之农民，有见人即杀之势。此种倾向经严厉的禁止，多方的解释，虽稍为改正一点，但仍未禁绝。因烧杀政策之结果，豪绅所欺骗下之农民，几乎全是始终站在豪绅方面，极少投过来的现象。

在反豪绅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微弱的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均渐渐强大起来。在百色、奉议、平马、思林、东兰、凤山均已成立县委的组织，果德、向都也成立了特支。右江工作委员会，则早以建立起来了，党员数量达五六百人，惟党的领导机关多系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反豪绅之初期斗争中均在领导群众而为群众中干部分子，在以后斗争深入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同志一部分因其经济背景之关系，有成为阻碍群众斗争深入者。当时党没有在工人、农民群众中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进来，以巩固党的基

础，这是极错误的事情。农会的发展更快，奉议、平马、思林、果德、东兰、凤山县农民协会均已建立起来，且有广大之群众。”百色、向都、凌云虽尚未有县农协之组织，但乡农协亦有一部分组织起来。同时右委亦曾决定在平马组织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以指挥右江各县农民运动。右江农协办事处，当时在群众颇有信仰。在农协工作中，我们亦做出了极大的错误，就是各乡、区农协以至县农协中多在一般知识分子操纵之下。这些知识分子的背景，多半很坏的，有的与旧豪绅尚有关系，有成为新豪绅而为富农在政治上之代表，农军的武装好多操在他们的手里。这种现象乃种下以后右江工作之恶果，以平马、思林为最严重。这种恶果在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就充分的表现出来了！工会的组织，在百色及平马亦甚发展。百色为右江政治、经济之中心，商业颇繁盛，店员与手工业工人数量颇多。当时军委用很大力量做百色工作，建立19个工会。工人群众情绪亦甚高，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斗争接踵而起（要求减时斗争甚少），均得到胜利。百色总工会于12月初在200多人之各工会代表大会中建立出来，在群众中颇有权威。平马的商业资本家多兼豪绅地主。自第四大队到右江后，这些店东早已逃走，商店停业者甚多，工人多散回乡村去，未能集中于县城，所以平马工人工作较难进行。虽亦组织了十多个工会，惟斗争甚少，工会群众不多。

在群众斗争的发展当中，第四大队内部反动军官渐恐慌，而至〔有〕企图推翻我们的密谋。对于这些反动不革命的军官，我们亦用上级的命令逐渐撤换之，有时亦有发动士兵

群众驱逐这些军官，但占少数之例外而已。被撤换之军官（指带兵的）多安插以无实权之位置，此虽系当时应付环境之用意，但于后来工作亦留多少不好之结果：这些不良分子常有拐款潜逃，暗中制造谣言，时出怨言，以及各种不良于我们的密谋等事发生。这也是军委当时对于处置这些事情，欠于适当的地方。

当时对于士兵政治教育亦曾有积极之工作。第四大队队部之内设有政治委员会，为政治工作最高机关。各营、连则设政治委员（当时政治委员即指导员，并未有现在中央规定政委之含义）。政治委员随军，在与豪绅之武装战斗中，从实际方面，启发士兵之阶级意识。在平时则每上政治讲堂一小时至二小时，则举行个别谈话，举行士兵会，唱革命歌曲，娱乐游戏，及率领士兵到街道上、农村中向工农宣传等等。在这时期中，士兵稍形活泼之气象，工农兵联合反国民党的观念，渐深入士兵之脑海中。

同时我们召集了千多数农民，扩充部队，组织特务营及机关枪营，并参加农民分子于各部队中，部队的农民成分增加，亦得了很好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进行扩充部队，一方面又加紧军事训练，并从打豪绅的行动中，增加了新兵不少的作战经验，壮了他们的勇气。

在我们积极改造部队、发动群众的行动中，共产党的半公开活动，渐为一般社会所窥见。且《右江日报》（我们到右江后办的报纸）之半公开的宣传，第四大队的色彩渐为人所看出。由是右江一般反动势力——第三大队、豪绅民团、土匪、第四大队内部少数反动分子，渐由大团结而

谋解决第四大队之企图。当时我们对内部之整理稍有结果。外部之群众斗争也渐扩大起来，豪绅力量受了相当的打击。我们遂决心解决第三大队，扣留其大队长小军阀熊熊，围缴其部队枪械。约有100多枝枪逃出此役，我们又得枪300多枝，大部均发与农军，由此第四大队在右江的局面渐次稳定了。

3. 转变时机的成熟

第四大队到了右江以后，经月余工作，在部队本身之改造方面，发动群众斗争方面，及对反动势力之镇压均有相当成效。此时我们对四大队之掌握已相当巩固，后得中央之指示，我们准备更积极，并于12月11日决定广州暴动纪念中举行转变，成立红军第七军。在这一时期中，我们为要取得群众之同情，宣布了取消二三十种苛捐杂税，影响颇好。我们并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种种宣传，一般群众及士兵的心理为之一变，对于国民党留下的心理渐次消蚀了。同时我们〔并〕刊行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共产党任务、苏联、土地革命、反国民党打红军、红军等小册子，对宣传颇收了一些效果。同时在党内开设训练部，更确定了同志的观念，党内更一致的热烈于转变工作，转变到了成熟的时期了。当时我们乃集中部队于百色、平马二地，待期举行转变，以免部队分散，以免发生事变。

转变后关于新干部补充问题，亦颇重要。我们在准备时期中已顾虑到。当时即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招集右江一带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之训练。技

术方面之转变，如布告、传单、旗帜等等，均在转变的前数日秘密进行。我们并于转变前数日，向商人筹得十数万现款。

二、七军转变的概况

1. 转变的方式

我们党在第四大队的工作，是在特殊顺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着。当时第四大队在右江形成独立力量，上面并无任何长官统治着，又在两广军阀混战未已的时候，第四大队最高长官又为我们同志，在这样情况之下，乃有和平转变的特殊情形。当时转变是采取了由上层的命令和士兵、工农拥护之下而进行之方式。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未有政治委员制度）的决议。在士兵代表大会中，并且通过官兵平等待遇，月饷20元及要求肃清反动军官等决议案。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情形热烈，“我们要当红军呵！”的呼声震天。次日（11日）在百色，12日在平马开群众大会，并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布告就职，第七军就在这样的方式之下转变成立。这种转变方式显然只能应用于七军特殊情形之下。

这种和平转变的方法，虽给第七军在转变时以许多便利，但亦留下许多困难于未来。因为这样的转变，还不是由士兵的自觉要求，主要的出于上层之命令。到了七军成

立以后，乃有多数老兵不愿报△而发生逃走现象。关于月饷20元之提出，原系我们顾虑到未能掌握着全数士兵以这个口号号召他们赞同转变的用意，但一方加重了士兵雇佣观念，是不好的影响。以后经过了长久的解释，从斗争中锻炼了七军才废除了这个口号。当举行转变前一日，我们勒令百色商家将公枪和私枪一概自动缴来，围缴那△△△△之枪械，并告诉他们用这些枪枝组织赤卫队，武装工人。同时扣留几个旧政府之官吏，枪决部队中两个反动的营长以肃清内部。

12月11日百色开群众大会，纪念广暴并举行七军成立典礼，到会工人群众数千，农民数百人（百色群众运动才开始，工人较发展），为百色第一次最盛大的大会，驻色部队千人全体参加。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革命空气甚紧张。12日在平马开群众大会，到者竟达三四万人，为平马历史上说来未有之广大群众运动。会中演说声、呼口号声、欢呼声震天。开会时间迫击炮三声庆祝，会场群众有许多尚听不到炮响，可见群众当时之热烈，此亦表明右江群众对于红军之热烈拥护也。

2. 七军成立时的一般情况

七军成立时共有三个纵队，是由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之五营一部、东兰韦拔群所部农军（约六七百枪）及奉议农军一营合组而成。每纵队约等一团人力量，尚有军部直属部队，如特务营、小炮连、教导队、军政训练所等。当时第一纵队颇有战斗力，第二纵队只有一营人有战斗力，第三纵队名义上虽已编成，实在仍散在东兰、凤山两县各乡

中镇压豪绅，未能集中，战斗力也薄弱。至于枪枝、子弹则均精锐充足，一般士兵之政治觉悟当然以第三纵队久经斗争之农民为最好。因为当时安处在右江百色一带，粮饷充足，士兵亦未有如何不好表现。在一般老兵中，自然不能表现出彻底的阶级觉悟。

三、右江10县政权的建立与七军在隆安的失败

1. 建立政权的斗争与反革命的两次进攻

七军成立之后，一切行动均受前委之指挥，前委对于七军初期的行动策略，决定暂在右江各县实行分兵游击以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起来。百色、恩阳、奉议、平马、思林、果德、隆安、东兰、凤山、凌云、向都等11县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产生之后，又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为右江政权之最高机关。各县政权以百色、东兰为最得群众之拥护。百色苏维埃以百色总工会为核心，苏维埃主要人员均系工人分子，确能代表群众之利益而奋斗，且无官僚主义腐化之倾向。东兰之群众斗争颇久，故苏维埃政府有广大之斗争群众为基础，亦甚稳固。平马、奉议、思林、果德、凤山等县苏维埃开始亦有广大群众之拥护，但因多为富农新豪绅所把持。在群众斗争深入之后，七军第一次离开右江的时候，反为阻碍群众斗争之机关，而渐脱离了广大群众。恩阳、凌云、向都、隆安等县群众基础很弱，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待军事力量一

去，亦同之瓦解。七军对于苏维埃问题未能加以十分注意，致多为富农新豪绅所把持，实为最沉痛之教训。

七军在初期时，以百色、平马、东兰为三个中心，分兵各县游击。军部直属部队及第二纵队在百色，第一纵队在平马，第三纵队在东兰，常分散兵力肃清豪绅，每日派工作人员及士兵中干部分组下乡组织农会，没收豪绅地主财产谷子，分散给与贫苦农民。每到一乡，首先一二次号召农民来搬地主之谷子，他们都不敢动，后由士兵搬到他家里。再过二三月，大家都来争抢了。这样的行动极得到群众之同情。甚易发动他们起来斗争。右江农民斗争也如其他各地一样，开始时仅在反土豪劣绅口号之下而行动，斗争逐渐一步一步的深入，进到反对地主，不交租，没收土地，杀豪绅地主，直至于分配土地。当时我们提出不还债的口号，有些农民不大表同情，实际这个口号也有毛病，后改为不还高利贷。富农在土地革命斗争始由动摇而渐至于反革命，可由许多事实证明出来。

七军分兵游击时，又犯了驻兵太散的毛病，因此第一难于集中力量做群众及部队中工作，第二给了反动力量以有机可乘向我袭击之机会。因为游击之结果及右江土匪与豪绅之特殊关系（土匪与民团合作），他们乃大团结乘我百色兵力薄弱的时候来进攻了两次，结果都被我军击溃了。右江内部反动的武装民团那时已无能力再来蠢动了。

2. 广西政局变化与游击南宁之决定

当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之后，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那一时期蒋、桂正在粤北江、

桂北一带剧战。这次大混战的结果，据我们得到的确实消息，又是两败俱伤的形势。两方面均不能马上再战，在互相严重监视之下。当时桂系的主力集中柳州、桂林之线，桂系吕焕炎所部主力在梧州，忽通电降粤反桂。时值1930年1月间，南宁驻吕部，杨义旅驻一团，蒙志仁团（第五大队叛变出来的约有枪400多枝）及警备第六大队张贯之部不及一团兵力（战斗力极弱），在吕之挟制之下均通电反桂降粤。但不久蒙志仁、张贯之联合解决杨义部一团，又反吕归桂系。当时前委估量广西统治阶级在南宁极薄弱，仅蒙志仁、张贯之所部及解决杨旅一团所编过的一部，总计枪枝不过1500枝，且张部战斗力甚弱，以我们力量（七八两军）进攻南宁敌人颇有把握。前委更估量到桂系主力在柳州、桂林一带正受粤军及梧州吕部所压迫的时候，目前无力顾及南宁。当时七军士气很壮，一般下级干部及士兵心理均欲进攻南宁。前委乃站在扩大政治影响，决定游击南宁一次。游击南宁之军事布置，以右左江为后方。4日，第二纵队两营守百色，赤卫军守平马，军部率特务营、教导队训练所（约一营）、山炮连、第一纵队全部、第二纵队一营、第三纵队两营及赤卫军1000余人，从右江向南宁进攻。第八军全部从左江向南宁进攻。这个策略决定后，因八军及第三纵队之准备约半个月后，七军方集中果德、隆安一带，决于2月6日从隆安向南宁前进。2月8日在南宁附近与八军会合实行进攻后，因政局之变动，敌已先我们而来，南宁游击策略未得实现而失败。此次策略之错误，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计。南宁是广

西政治中心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绝不致易于放弃。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关于游击南宁的准备中，军中从上级指挥官至士兵都带有十分轻敌的情绪，游击南宁的策略很早就公开宣布于群众等等，这也都是错误中较小的问题。

3. 隆安战后的失败

当我们准备进攻南宁的时候，广西战事又生了变化，即是在此时桂系在战略上有了大大改变。桂系主力移到南宁，决心以南宁及左右江为后方，向廉、钦攻广东。在桂系这一战略之下，乃分三团攻右江。2月3日早晨，敌至隆安城边，我军才发觉敌情，城中竟〔仅〕第一纵队直属部队（机、迫、特务等连）及第一营仓卒应战，纵队长即受伤，部队乃由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及第一营营长协同指挥。战数小时，即将敌两团击退，夺枪百余枝，机枪一挺。后敌又增兵一团，我军在隆部队与之相持一日夜，以待援。2月4日后，支援部队陆续到齐，激战四日夜，我军均连连胜利。敌在最危险时候，将敌军集中向我反攻一点，我军士兵只能冲不能守，为其冲破一点全线乃溃退。此役损失约一营人。沈静斋同志指挥四日未睡，彼原是体弱之人，退出时走不动，为其俘虏死难。沈同志在党内任一纵队队委书记，为官兵及同志们信仰亲爱之领袖，今日尚有许多下级干部、士兵思念之，谈及此事尚觉得有所失。我军直退平马，敌跟踪来，我军离平马数十里之村庄休息。敌大队跟入直插百色，百色留守之部亦退至凌云向东走，方与大队会合。在隆安战役中，有以下教训：

第一，我们不应隆安应战。因隆安群众基础甚弱，且无防可守，也不利于增兵，我兵力又未在隆安集中，诸多不利。当时如诱敌深入至果德、思林一带的方向，对我均有利，且可应用群众武装，较有胜利把握。

第二，我军士兵只能冲不能守。冲锋时任何强敌都当不住，为人所攻即难坚守，隆安之失败应在此（后检得敌军日记，记述我军士兵之猛勇难当。依日记中有一句云：“共党放隆安狱犯到前线冲锋，骁勇异常”）。

第三，一般干部作战经验太少。在隆安战役中，竟有分队在未得到命令之时，敢自动增加前线的事情发生，可见当时干部在军队中习惯尚有未懂的。

第四，七军未注意到经理、军需、副官、参谋处各部分的组织，多用不负责的、对革命无认识的充当这些职务。隆安作战，后方经理处对子弹之接济不及，当时有九连部队〔子弹〕用尽不能应战。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反攻敌人的准备及其结果

1. 反攻的准备及平马的胜利退兵

隆安失败后，我军退平马附近之村庄，当时企图与留守百色之部队两营会合后，在敌分兵百色时即向平马反攻。但一般群众及地方党部，即欲七军恢复右江沿河政权时来作种种催促。不久右江党部及右江苏维埃政府忽来报告，说平马之敌大部撤退，听说下游有战事，仅留一营人留守平马。七军对此消息亦未加如何考虑即决定反攻平马。及

至与敌接触时，发现敌约一团多人，始知受骗，不得已应战。激战一日始将敌击退，占领街道之一部。敌大部向百色、奉议退却，小部仍占领街道，一部扼险死守，当夜连攻数次不破。我军恐敌增兵赶到，乃自行撤退。惟有极小部及赤卫军未得通知，在街道与敌人战了两昼夜才退出。后又闻敌军一团到了离平马90里之奉议县城，因见其大部溃退，又闻在平残部为我解决，亦不敢前进，然我军已行胜利的退兵了。此役给与士兵与群众之不好的影响，大家都怪指挥官缺少进攻精神已至半途而废，事后论断七军的确缺少进攻精神。

2. 停四遭遇战后困难的时期

平马之役无结果而退，七军大部乃至平马与东兰交界处之市镇燕洞休息，此时士气经两次打击后已不振。不久第二纵队亦到会合，次日忽得敌绕道截我东兰僻路之消息。当时匆忙率队向东兰前进，决心背东兰待敌来与之作战。谁知敌已绕了两日的路程，经过许多苏维埃区域，包了我军的后方（苏区赤卫军惊慌逃走未来报告）。在停四遭遇，剧战一日，两败俱伤，我退敌亦退，但敌死伤较大。

七军成立时，初期士气甚壮，精神紧张。连遭这三次打击之后，士气为之衰颓，一部干部、士兵失败情绪均甚浓厚。停四失败后，在盘阳（东兰、凤山交界）驻兵月余。该地又是穷苦的地方，粮食时感困难，士兵之零用更是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部队中的整理训练工作都进行得极缓，群众工作也极少进行，党内也充分表现失败情绪之反映，一切工作都形成了停滞的状态。

3. 向外游击的决定

在这样情况之下，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分是没有出路的，由是前委乃有向外游击之决定。七军曾接受指示：湘、粤边界为发展之路线。所以七军出发游击时，即拟向湘、粤边界游击前进。但因七军在隆安失败的时候，曾电知八军绕道桂、滇边界到东兰会合。当时八军亦必受敌之压迫，过来会合乃为上计。惟迟迟不得八军过来之讯。为着与八军之联络便利起见，前委乃决定留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军部率第一、二纵队及直属部队在河池、南丹（均与东兰交界的县分）一带游击，发动群众斗争，待会合八军之后，则以全力向湘、粤边界发展。此种决定之后，出发部队乃由东兰向河池前进，实现这一策略。

五、桂、黔一带游击战争

1. 河池的游击工作及思恩之失败

4月初，七军到了河池。河池民众久在反动统治之下，受了反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说什么“共产共妻，15岁以下小孩子，30岁以上成年均在杀戳之列”等等无稽之谈，一般群众确是惊恐万状，逃避一空。但红军一到，举动确是“文明”，迁逃者二三日内渐渐搬回，商店亦照常营业。红军废除一切捐税之政纲大得民众之拥护。他们传说：“红军取消苛捐杂税，莫不欢天喜地。”占领河池县城，我军又分兵各乡宣传，没收地主谷子给农民，又大得农民群众之赞同，来报告豪绅之罪恶及行踪者接踵而至。我们召集了

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数百人。有一青年上台演讲，反国民党情绪甚热烈。在大会中乃通过革命委员会之名单，河池革委即告成立。参加者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之分子，红军亦有代表参加。驻河池七八日间，组织了几个农会、工会，士兵见了群众的欢迎，士气渐恢复了。

七军到河池后，得知庆远敌人甚少。庆远离柳州仅三日路程，为重要商业县分，解决红军经济问题必有办法，前委乃决定派一纵队到怀远游击（怀远为庆远之第一镇，商业更盛于庆远），留一纵队在河池工作。并料定敌必来对付，乃决定到了怀远后，三数日即回河池。第一纵队到怀远，敌数百闻风先逃，过河至庆远。我军在怀远数日，筹款及发动群众影响颇好。后闻敌来，第一纵队由怀远退思恩，并约二纵队亦由河池至思恩会合。那知第一纵队到思恩敌已跟踵而来。稍抵抗即退却，此役损失30余枪，死伤亦30多人。

2. 进攻榕江的胜利及其政治影响

自思恩失败，一纵队经宜北县城，在桂、黔交界之乡村中才得会合第二纵队。七军初次向外游击又遭此打击，一切物质上均感困难，无法补充。当时得贵州内部有战事及榕江（即古州，为贵州重要城市）兵少的消息，前委乃决定向榕前进，攻敌不意。从桂、黔边界之荔波县境经苗山行军5日始达榕江。苗山道路崎岖为瑶民区域，绝少行人，故我军于1930年5月1日行至榕江城边，敌始发觉，匆忙应战。敌守城激战1日，卒将其全部约两营人解决。此役得枪400多枝，大炮1门，子弹10多万，迫击炮、机关枪各

2 挺，俘虏数十人（敌大部分死伤，仅逃走百人）及无线电 1 架。进榕后始知王家烈率兵 8 团向湘西发展，以榕江为后方。前委估量敌必回师反攻榕江，乃决定在榕 3 日即退。3 日中筹款 10 多万，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每日向群众宣传，没收反革命的军官财产分给群众，影响极好。对于敌伤兵招待亦优，敌兵颇为感动。待七军行时，一般民众与伤兵都有依依不舍之表现。榕江之胜利，士气又恢复，且政治影响甚大。

3. 回师河池的决定改变为回右江之策略

在榕江 3 日，得报敌 5 团向榕江包围，我军迅速向广西境撤退。几为敌追及。至未〔半〕路，因伤兵运输之困难，无法觅人招之，步枪 100 余枝，大炮 1 门，无线电 1 架投入河中，因当时无群众组织不得不出此法。退出榕江之后，因第三纵队及第八军之消息尚未得到，及湘、粤边界有重兵驻在〔扎〕（正适粤、桂在湘南大战时）之关系，前委乃决定回师河池，与第三纵队第八军取得联络后，再向湘、粤边前进。

回师河池路过宜北县城。前次经过宜北，群众受豪绅欺骗逃避一空。但我军军纪极好，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所以此次重返宜北群众甚热烈欢迎。召集一次群众大会，到者 1000 多人，热烈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打豪绅，投军者甚多。

至河池适邓斌同志从东兰出来（邓同志于 3 月前从中央至八军后到东兰，七军大部已出走），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前委接受此种意见，

乃决定回师右江，3个月后才向外游击。

六、重回右江后事变

1. 回右江的策略及围攻百色敌人

重回右江是根据以下策略而决定：（1）攻敌不意，恢复右江沿河各县政权，肃清豪绅；（2）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3）扩大红军组织，改编赤卫军为红军；（4）联络第八军第一纵队。

从河池返右江，经东兰向百色前进。过百色边境时，敌人约两营人来进攻驻凤山第三纵队之一部。适遇我军大部，出其不意将其击溃。敌回散山中，极少回色者，只因我军未穷追致未得些什么。龙州之役，敌受重大打击，我军到百色时，敌约1团人及豪绅武装数百据坚固之炮台顽抗。激战1昼夜，始得将其击溃，仅少部逃走，几全军覆没。此役得步枪500枝左右，迫击炮2门，机关枪1挺，子弹三四万发。到了百色后，我军及〔急〕分兵恢复奉议、平马。敌在沿河一带，尚有兵1营，未经作战，乃会合豪绅武装共千人逃避。沿河各县均次第为赤卫军所统领。重回右江，在百色又得此重大胜利，干部士兵莫不兴高彩烈。我们正拟以百色为中心来实现以上四项策略，岂知政局又生变化，我军行动受了莫大影响。

2. 滇军来桂与果化之役

我军下百色仅三四日，滇军3师人分左右江两路来攻南宁。1师约3团多人，后经百色过右江，我军即撤退平

马。敌进了百色后，即继续向平马、南宁方向前进。敌将至平马，我军又避开离平30里之乡村，让路给敌通过。当时前委讨论对付滇军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待敌通过平马后，我军以一部在路上埋伏，大部跟敌后头，出其不意夺取辎重，收缴其一部枪械，在实际行动上以反对军阀混战。待对付滇军后，再回师百色。百色必无滇军留守，恢复百色不成问题。一种主张我们只要号召群众来反对军阀混战，如召集群众大会，以小部赤卫军扰乱敌人等等办法，此次不可以红军主力去对付滇军。因为仅2团才经战斗之部队，敌则有3团富有战斗力之部队，且敌必留兵与右江豪绅共守百色，我们应待敌大部通过，迅速收复百色，以实现我们回右江之策略。两种不同意见争论结果，通过了前一种主张。敌至思林被我伏兵两连截击，得一些辎重。敌继续通过至果化湾河，我大部从后面赶来攻击。敌过河了2团，尚有1团在河边顽抗，我军猛击不下。战3日夜，敌架好浮桥，又增1团过来，我军乃转攻为守，据险要石坳相持。敌于当晚偷行撤退，我亦不能再追。此役我死伤颇大，失枪数十枝，在榕江、百色二次所补充之子弹亦几打尽。

3. 内部叛变不攻百色

我回师平马欲恢复百色，至中途，第二纵队第一营离大队约60里，担任向百色警戒任务。乃该营第一连连长反动，勾结少数反动排长及兵油子将营长、副营长杀害，率领队伍向百色逃走。事变起时一般干部及士兵莫明其妙，受挟迫而走，此次事变给我们教训：

第一，部队尚未彻底肃清旧军官；第二，未实行肃清兵油子；第三，党的基础薄弱（在百色作战之后，第一营党的干部同志死伤殆尽），政治工作不充分。回师百色之任务，因受攻滇军不利及第一营叛变，子弹又告缺乏，终于不能实现。当时滇军已编杂色部队1团人，并勾结桂系为我击败之残部1营多人，及豪绅武装千人据百色险要炮楼图死守，我军卒因子弹缺乏攻坚不易，乃集部队于平马、奉议一带积极训练。当时因训练补充及集中兵力以备应付敌人之袭击，并为需要休养之故，采分兵游击。整理3个月，部队稍完整，每连均补充八九十人，一般士兵政治觉悟也相当提高，党的工作也建立了相当基础，各支部能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分配工作，党内政治水平也提高了。这一时期训练之结果得了相当成绩，但是发生了一种错误倾向——集中力量于军队内部，而忽视了群众工作。当时对于地方工作只是少数负责同志给与地方党部以一些帮助，为他们开训练班、办政治训练班等，及前委给各县党部以工作上党的指导之外，没有动员军中党及士兵委员会去做群众工作，这是莫大之错误。

4. 右江土地革命与反富农的斗争

右江工作经七军第一时期的发动，已有广大群众起来，土地革命逐渐深入。但当时因工作路线之错误，富农新豪绅分子侵入了苏维埃，而至于把持政权机关，掌握了赤卫军，反而阻碍了土地革命之深入。因自七军第一次离开了右江之后，党的右江工作委员会，渐成为官僚机关，负责同志之腐化，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隔离，乃使右江苏维埃

政府变成纯官僚之机关，丝毫不得群众拥护。右江苏维埃主席雷荣璞（擎天）同志（现已开除党籍），以私娼为爱人，引入苏维埃工作。因此不但大失群众信仰，且予新豪绅以籍口，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右江苏维埃忘记了土地革命工作，日在计划扩充赤卫军之组织至20营之多。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赤卫军大半是新豪绅领导之下，右江苏维埃已失去威信，赤卫军连苏维埃的命令都可以不执行。赤卫军始则以单纯的行动对付豪绅，渐渐脱离了群众及至受了豪绅武装打击二次后，连与豪绅的武装冲突都不敢了。赤卫军不敢侵入豪绅统治下的地方，在苏维埃区域中，天天要群众供给粮食，而至于收捐、筹饷、勒索，无所不为，苏维埃赤卫军与广大群众已成对立的形势。待七军从游击重回到右江，此种现象已经很严重。许多群众表示我们只要红军，不要赤卫军。前委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从下而上的改组苏维埃，缩编赤卫军，编成四营，其余解散归各乡苏维埃，组织预备队，由此可以减少群众对于赤卫军之负担，可以剥夺新豪绅对于赤卫军之领导权。但当时右江党的领导权薄弱，前委又患〔犯〕了重大错误，没有动员全军党员及士兵去做群众工作，只是扣留了一个赤卫军的反动军官，所以对于苏维埃及赤卫军之决议成效甚少。同时关于反富农斗争，在较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又机械的执行这一策略，实行见富农就杀的办法。机械的反富农之结果，中农因之动摇恐慌，而至于与富农联盟。在东兰、凤山，有好几乡富农领导中农向贫农、雇农进攻。有的有他们独立政治组织，如救乡团（？）等。有他们的独立主

张，既反对豪绅、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说是要救乡，结果他们是勾结国民党豪绅向苏维埃进攻。许多县分，特别是平马、思林、果德各县，富农是暗伏在苏维埃内，用种种方法妨碍土地革命，如主张调查好再来分配，不召集群众大会讨论分配土地问题等等，（采取）延期敷衍的办法。或者实行分配了，将肥美的田分给富农自己及其亲属，贫农、雇农得到的是瘦田。分配了田地而不解决耕具问题，而使贫农、雇农没有办法耕种等等。总括说来，右江工作除百色、奉议对于党的苏维埃的影响尚好外，平马、思林、果德曾经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组织都瓦解了。凤山则因机械反富农的结果，工作也受大打击。已经实行分配土地者，只东兰一县，及凤山、平马、奉议、思林、果德之少数乡村。分配土地的办法约分以下几种：

（1）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不侵患〔犯〕到富农的田地；

（2）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

（3）实行共耕。共耕有两种：一种共耕共食；一是共耕分食（共耕共食者绝少）。

当时土地政纲中，尚有没收反革命者土地财产一条，系对富农而定的。当时我们对于反富农斗争，是以拿到其反动行为后而对付之原则。分配土地以四岁以上为一个单位，因许多农民意见，小孩子比成人开销更大之故。

5. 向外游击之决议与后方布置

回右江3月，七军本身问题已得到相当解决（补充训练），又改编奉议、平马、果德等县赤卫军为第四纵队。东

兰、凤山及奉议，平马各一部赤卫军为第五纵队。此时七军决定出发游击，邓拔奇同志即从中央南方局来，代表中央南方局有所指示，七军乃接受中央之指示而出发。一、二、四纵队从凌云绕桂、黔边界会合八军第一纵队出河池，三纵队从东兰出河池会合前委。对于后方问题，决议留第五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作游击战争，再扩充第六、第七纵队（由赤卫军改编）。当时统计枪枝、人数均已足额，第六纵队现必已编成，第七纵队或亦有编成希望。

6. 凌云行军间之事变与会合八军

当改编赤卫军为红军时，前委规定了一个原则，将在新豪绅领导下之赤卫军编入第四纵队，随大队出发，到河池时（离他们家乡稍远时）再解决其反动领袖，整顿其队伍，所以第四纵队之部分力量是在这些坏分子领导之下。行军至半途桂、黔边界时，第四纵队第二营营长以奉纵队长命令欺骗群众，连夜率兵五连逃回右江，我们估量其前途必为敌人所勾引。

第八军大部已早为敌人扑灭，仅第一纵队绕道至右江会合，途中被敌包围损失甚大，仅余200枝枪，至贵州边界编为护商队，至七军此次往接时才得到联络。共同向河池出发，乃与第四纵队余留之一部分为第四纵队。

七、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与 河池全军改编

1. 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及当时党的组织状况

代表大会定期到河池后召集，沿途准备大会的工作。主要的是举行各级党部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及七军过去经验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并举行选举代表，选举支部书记，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因此，此次行军中党的工作，尚有多少进步。

当开代表大会时，全军党的概况，约有以下的现象：除第四纵队是才编成的队伍，过去未有发展工作，党员数量甚少，其他三个纵队各连差不多均有支部组织，支部亦能开会讨论问题，在上级机关指导之下可以工作。同志的总数约500多人，军队中下级干部颇占重要成分，比较的以士兵成分多一点。各纵队中以第一纵队工作最好，因历史较久，干部较多的缘故。一般的同志，政治水平均甚低，虽较七军刚成立时则高的多了。代表大会中士兵成分仅占1/3弱。当时一般同志革命情绪甚高，对革命前途颇抱乐观。

2. 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及其决议

代表大会会期仅1天，主要的议事日程如下：

(1)中央代表政治报告；(2)前委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3)过去策略与工作的检阅；(4)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的讨论；(5)选举前委。

邓拔奇同志从中央来，正是“立三路线”全盛时代。他带中央6月11(日)决议的精神，向七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因此，此次代表大会充满了“立三路线”的精神，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中央南方局给七军的指示，是要七军在夺取广州，完成南方革命胜利的总路线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

沿途创造地方暴动，夺取柳、桂，出小北江进攻广州。同时为要达到这一任务，要七军猛烈的扩大。

大会中对于这一指示，也是照样接受了。不过更具体的确定以庆远、融县为二个中心，发动群众，造成包围柳州的形式。惟七军为要与外面斗争能早得联系计，应绕道庆远、融县先出桂林。

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

3. 全军改编

代表大会闭幕第2天，七军一、二、三、四4个纵队，均集中河池进行改编为师团制。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第三纵队改为五十五团、五十六团，编为十九师；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改为五十八团、五十九团，编为第二十师；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为第六十团、六十一团、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留守右江。全军举行检阅，次日向庆远前进，沿途极得群众之欢迎。

八、三次战争中党的争论问题

1. 进兵怀远后党内政治意见之分歧

从河池全军向庆远前进，到庆远之怀远镇，敌约数百人过河，据河而守，阻我去庆远，据报庆远有敌1团人。此时党内对进攻庆远问题，发生意见之分歧，一方主张应遵照一次代表大会之决议出庆远发动群众与扩大政治影响；一方主张攻坚不易，应绕道天河县出融县，过了大江

之后，再同敌作战。争论结果，前委通过了后一决议。

2. 四级坳与天河之战

我军从怀远向天河出发，至中途，在四〔级〕坳敌独立第三师韩彩凤部约一团人跟踪来击，将其击溃，天晚未追。次日，我军仍向天河前进，天河群众，又逃避一空。到天河后，主张不攻庆远之同志，又主张不出融县，再绕道长安过河，过河后再与敌作战。有些同志又反对此种意见。结果，次晨沿天河出发，二十师五十八团为前卫，行30里，与敌教导师一团人相遇，战不久五十八团退却，敌亦不能追。同时，后卫十九师亦发现敌情，系敌独立第三师全部，战不久，敌败退，隔小河防守。当晚，前委多数同志主张，以十九师一团增加二十师向敌反攻，对后头敌人取守势，结果没有执行这一主张。次晚撤退三防，敌则分驻融县、长安二县防守。

3. 党内对于进攻长安之争论及进攻长安之结果

到了三防，主张不攻庆远，在天河不反攻之同志，又主张不取长安，绕道福禄过大江，过江后再战。当时一般士兵带有充分的进攻精神出来，对这数次军事行动大不满意，都怪指挥官没有决心，走了山石小路，又受敌打击。一般干部对这数次行动也认为前委没有遵照大会的决议案执行，避免敌人，缺乏进攻精神，放弃以庆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的决议，有轻视群众工作的倾向。且估量我军力量比敌军大，应进攻长安（长安为广西主要的商业地方），以解决红军之补充问题，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经过党的干部分子大会热烈之争论，决议进攻长安。

七军以四团力量进攻长安。敌在长安街边做好坚固工事，以一部守卫，教导师一团及特务营出来迎战，不久即败退街内。次日，敌独立第三师三团及豪绅武装千余来反攻，又为我击溃，狼狈而走，绕道又入街道。激战4日，经我猛冲不进。后我们预料长安无法攻破，乃自行撤退。当时敌又增两团，惟我已退。该役敌损伤大，我得枪枝百余枝，惟子弹几打尽，死伤干部极大，损失不少。长安之役，虽未得结果，损失过大，是算我们失账。但给敌以极大恐慌，七军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自此七军确信了自己的力量，还是有意义的。

4. 绥宁的政治决议及攻武冈的失败

长安撤退后，七军即向湘西前进。至边境又发生教导队副队长设计欺骗士兵共60人做匪之事，又是沉痛之教训。七军至绥宁得报，始知国民党以全力对付江西红军，前委当时乃决定迅速出广东北江，发动群众斗争，以牵制敌广东部队，再向江西进攻，以为江西红军之声援。

但七军自右江出来后未得补充，天寒已结冻，官长、士兵都还是穿单衣，脚上没有草鞋，零用钱已9个月没有发了（只庆远时每人只发五毫），物质上困难〔到〕极点。惟士兵政治觉悟，经一年来之斗争，已经提高不少，虽亦有吃不得苦而开小差者，但一般官兵都还未有怨言。在困难艰苦时期中此亦可给我们以兴奋也。为着补充衣服问题，前委又决心迅速取武冈解决衣服问题，再去北江。因当时武冈仅民团七八百人，离武冈3天路程之宝庆则有军队2团，故乘敌不意，取下武冈，就可解决一切。

武冈城极坚固，民团七八百人死守城内待援，我军攻城至第4日，几破城而入，遇敌援兵三团赶到（一团从长沙搭车来，二团从宝庆来）。我兵分散围城，一时集中兵力不及，即退却，仍向广西边境撤退。敌追来，后头部队警戒不密，又略受损失。此役阵亡团长何莽（子祁）同志——对政治上极有认识，作战极勇敢之军官，损失约2连人。七军经过几次打击，部队甚残破。

5. 占领全州后，党对七军行动之决定

当湘军尾追我军至广西边界，我军即向全州前进。当时全州有杂色部队1团人，我军正处前有敌人，后有追兵的情况之下，乃决心冲破全州敌人后，再来对付追兵。至全州，桂系杂色部队稍抵抗即退，后面追兵亦不敢深入广西。我军乃在全州安住3天，筹款补充衣服，都得到解决。我军进全州时，桂系有兵3团在桂林，因在长安之教训，不敢来犯，只在沿途布置防御工事。

到全州后，前委对七军行动问题，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间之休息，并决议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我到全州时出来，现从〔据〕报纸上消息，七军确已到江西了。

九、七军现状

1. 全州缩编的结果

七军自第二次右江出来游击，受了数次打击，干部死伤颇大，士兵中老兵没有政治觉悟均多开小差。从右江出

来，新兵（农民）因思乡之念，也逃了一些。到全州后，每连只余四五十人。因战斗兵之减少，非战斗员就感觉多起来。前委为着整理使其坚实起见，在全州乃决议十九、二十一两师，缩编为三团。一面尽量减非战斗员，以补充战斗兵。缩编之决议未实现时，我已出来。但预料缩编为三团后，编制仍保持三三制，每连可有60个战斗兵，干部亦不至十分缺乏。

2. 七军的力量

七军出发之部队，军部有直属部队二连、山炮连。各师亦有特务连，各团则有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及三营步兵，总计出来部队之人数约有6000人左右，步枪有2700枝，山炮1门。迫击炮3门，水机关枪6挺。惟子弹甚感缺乏，政治工作干部甚少，政治部组织不健全。现军及师均有政治委员，团、营、连则仅有政治指导员。因人材之缺乏，无法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的建立起来。一般干部都是过去南宁时代之教导学兵，成分大多数系右江农民，老兵余留下不及1/10。一般官兵政治表现，在斗争中日益锻炼，愈加进步。虽然现在政治路线之错误给予七军以许多危害，同时也锻炼七军日益坚强。

留守右江之二十一师至少已有两团人（多则已编成三团），枪枝亦是精良的，迫击炮、机关枪、大炮都有，惟战斗力较弱。现在桂系主力集中右江，二十一师之行动当然比较困难。但东兰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强固，敌极难深入，推想东兰苏区必因二十一师拥护而存在。至于沿河各县少数乡村之割据，亦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赤色区域。惟第二

十一师与军部已无法取得联络，此后应由中央直接加以指示。

总之，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七军在中国革命前途上，可以担负一部分任务！

红军第七军报告（节录）

中央：

我这次系自龙州失败后随军走到广东边境之大寺地方（钦州所属），因军队为黄明堂收编，遂离开队伍，由北海到香港。我是在龙州担任特委书记兼宣委，并参加七、八军前委，经省委决定要我前来出席苏全大会，向中央报告一切。这一报告，因我只在龙州工作，而且是很短的时间（只有48天），所以只知道左江方面的情形，对于右江情形不甚明了。兹将我所能报告的概括述之如下：

一、一般的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的 趋势（略）

二、红军的情形

（一）成立的经过

左右江的红军，是由俞作柏部军队因士兵的觉悟、不愿参加混战转变过来的。右江原为第四大队，转变后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为张△△同志，计有3个纵队，约3000多枪。其成立经过不甚清楚，不能详细报告。左江原为第五大队，于去年9月间俞作柏南宁失败，由俞△△同志统

* 文中的字系编者所加。

率退入左江之龙州。所属原有6营，约2000余人，后来第三营郑超部叛变，带去300余人，盘据靖西。11月间蒙志仁部又叛变，带去及被其缴械共有六七百人。所存只900余人，编为4营。于今年2月1日，俞△△同志因逼于环境及右江已经转变，同时右江前委亦决定左江非速转变不可，并征得省委同意，遂由龙州县委与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召集龙州群众大会。由工农代表提出通过，成立为中国红军第八军。俞△△同志为军长，何△△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于是日即正式成立，并举行游行示威，计编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每个纵队两营，第一纵队长为何△△，第二纵队长由俞兼。

(二)转变后工作的布置

转变后即召集军委、县委的联席会，讨论以后工作的布置。我是刚于转变日由省委派我到达龙州，即参加这一会议。在会议中，根据过去军委、县委的报告，知道党在军队中、群众中没有基础，这一转变，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转变。对于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极不充分，也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做到。所有军官，差不多都是建立在俞的个人旧的关系上，不是建立在我们政治影响上。当时我即指出这一前途是非常危险的，非马上纠正过来，是不能马上成为真正红军的。同时还有一部分黄飞虎的土匪部队约一二百人，也驻在龙州，以前是由俞与他私人的关系，利用他帮助驱逐了蒙志仁的。名义上是受俞的收编，委为警卫队长并任龙州县的县长。转变前后，即在运动赤卫队中队长何明、黄广贤为其爪牙，已显露反动之形迹。龙州原

有赤卫队一大队，计百六七十人，亦甚不稳定。整个的内部形势，都表示着隐伏很大的危机。经过很详细的讨论，决定以后的工作布置是：①很快的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②加紧士兵工作，健全各级士兵委员会，马上召集士兵委员会代表会议。③发动士兵斗争，肃清动〔摇〕的旧军官。④实行游击战争，向靖西方面进展，解决郑超反动势力。⑤解决黄飞虎，由俞私人叫他到军部商议事件，即将他扣留。然后向他的群众宣传，说明只杀黄〔飞〕虎，是为他们的利益。或将他们遣散，或加以训练，择其土匪习性比较不深的改编。此外是关于苏维埃及地方党部群众工作，亦有所讨论，再详后面。但决议是有了，执行得非常非常〔不〕充分。虽然在士兵工作、兵委工作都已执行，但关于旧的军官，只是在一纵的方面，我们已有相当基础的掉换了几个连、排长，也是由士兵要求撤换的，二纵方面始终没有发动反旧军官的斗争。原因是：一方面党的基础薄弱；一方面是俞相信旧的关系太深，阻碍执行。而在军委负责的何世昌同志能力薄弱，不能坚决站在斗争的路线上。只以俞不愿意做，就没有办法，吁声叹气而已。解决黄飞虎亦执行得极不敏捷。第一次黄到军部，俞不将他扣留，要第二次又去找他，他已察觉而逃了。后来只得将他在龙州一部分的武装解除，缴枪百十余杆，而黄仍能在他的本乡下冻北区，号召土匪，四处扰乱。以后我们派去下冻工作〔的〕何建南同志（当地农民运动领袖、特委农委、赤卫队大队长、革委会土地委员会主席）亦被其设法谋害。至于进攻靖西，后来又因右江前委来电要向南宁发展而有

所变动。虽然经过讨论，特委一致不同意进攻南宁的策略。认为左江群众一点没有发动，马上进攻南宁，龙州就要落在反动的黄飞虎手里，这样是无异脱离龙州的群众而去抢南宁的地盘，原本没有意义。而且攻南宁又无把握，纯是主观的冒险，更是塌台的举动。就军委方面也有人同意特委的意见。但何坚执〔持〕前委的电令应该执行，马上就开动一部出到驮芦。不久，邓斌同志由中央返到龙州（大约是二月八九日，记不清），即由邓斌同志召集特委、军委联席会，将他在中央讨论对左右江工作的策略，曾作几次整个的详细的报告。并根据他所得龙州同志的报告和观念，指出左江各方面工作，如党、革委会、红军、工会、农会等，都没有斗争的路线，都没有抓住中心工作。特别是革委会完全没有做到接近群众的工作，只是忙于公文机关的工作，甚至连机关工作也做得不好。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决定了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红军发展方向等问题。并指出进攻南宁是错误，马上电话〔告〕驮芦制止，召回何世昌同志，率队回龙州。并电告右江，左右江应该很快的汇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进展，以期与四军汇合而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此时右江七军一部分已进到隆安，南宁方面反动政府马上派兵3000余杆进攻隆安。在隆安，红军因军事上的疏忽及轻敌的原因，以致敌到城下才出而应敌，结果败退，颇受损失，死亡下级干部不少，一直退到东兰。左江红军，于2月23、4日邓就职为政治委员后，即由邓率一纵及二纵之一连，由驮芦向靖西进展，同时决

定三纵于一星期内离开龙州。关于龙州工作的布置是：①向下冻、凭祥、上金及龙州四乡游击，收缴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农村斗争，没收土地，组织苏维埃，组织农民武装、工人武装；②建立党的秘密组织；③布置军事上的联系；④筹备经济等。但在执行上，关于攻靖西是攻了半个多月没有攻下，原因是郑超闭城坚守。靖西城非常坚固，我们是决定不攻坚，所以只将城包围，在附近一带发动农村斗争，组织农民武装，待其内变。因为郑原系俞部，部下兵士多不服郑，且有我们同志在内工作，兵变是很可能的。在龙州之红军，关于四乡、上金、凭祥等处的游击，执行得非常迟惰。而且每到一处，只是向群众谈谈如何如何要组织要革命，并不能帮助他们即时斗争起来，大部分力量都用到剿匪。实际匪见兵到，马上去，兵去匪来，更弄得疲于奔命。农村工作更困难的做起来，除下冻外，任何地方都是一往而过。关于军事上的布置，虽有计划，亦多未执行。其他关于党的方面，经济方面，再述之后。总之关于转变工作的布置，在讨论的决议，都有发动群众斗争、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等决定，但在执行上都做得不充分。

（三）党的情形

左江红军，党的工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1. 蒙志仁未叛以前到叛变时，左江军委是由徐开先（即徐光英，业经省委开除）负责，可以说是有同志十几个人在那里当军官，而没有党的组织，更谈不上党的工作。

2. 蒙志仁叛后至左江转变为红军时，初由宛旦平负责

军委书记，后由何世昌同志负责军委书记，军委是俞作豫、宛旦平、袁□□、何端等同志，比较以前注意到组织，有同志20人，分四组，一营一组。

3. 转变后，在邓斌同志未到前，仍是由何负责，邓斌同志到后，改组为前委，指定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及我为前委，邓斌同志为书记。邓率一纵赴靖西后，由何代理书记。在这一期内，同志有相当的发展，统计一纵发展至50余人，二纵发展至30余人（连政治部工作人员），军校16人，分编支部如下：

一纵支部5个（以连为支部单位），各支部均分为两个小组，以排为单位。

二纵连支部2个（各分二小组，以排为单位）（二营的），一营支部1个（混合编成），政部与军部支部1个（分二小组），军校特支1个（分三小组），共有10个支部。其党员成分如下：士兵7/10，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3/10。一纵并组织纵委，以该纵政治部主任潘启明为书记，二纵只组织营委。党在一纵是建立了相当基础，支部生活亦很健全，每星期都能按期开会，军校支部更好，能在军校起领导作用。二纵党的力量颇为薄弱，特别是一营没有基础。

党的工作，除健全支部生活外，曾经召集过几次党员大会，何同志常常能参加支部会议，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相当的努力。

（四）政治工作

士兵委员会、士兵代表会议都由政治部有过相当的工作。关于红军的任务、红军战术、红军纪律等宣传教育工

作，亦做得不少，每日由政治部主任找士兵轮流谈话，并曾办一星期训练班。对于军官，有过政治讨论会之组织，由政治部编好题目和大纲，指定人报告后，即各发表意见，加以讨论。此外，各营、连指导员每星期开会一次，报告工作经过并讨论下星期工作。至于对群众的，关于宣传工作，如画报、传单、标语等，颇发的不少。小册子如土地革命、苏维埃、苏联等印发数种。一般的说来，政治工作在宣传教育上是做了多〔不〕少的工作。

(五) 士兵生活及对红军的认识

左右江红军的生活，官兵薪饷每月一律20元，实行了官兵平等待遇，士兵对红军确有相当的认识，大部分对旧军官都不满意。

三、苏维埃的情形

(一) 成立的经过及区域

右江方面是早成立了右江苏维埃，其成立时期及经过情形，不甚明了。左江是于2月1日〔红军同时〕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其产生方法是在群众大会工农代表提出名单通过。在左〔江〕各县，有革命委员会的为龙州、上金、凭祥、崇善、养利五县，其产生方法系由左江革命委员会委任一人为主席，由各县农会、工会、赤卫队选出代表1人或2人组织之。龙州之下冻，并组织区、乡、村各级的苏维埃，其产生都是由农工兵代表会议选出。

(二) 组织系统及委员

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13人，其组织系统及委员姓名，成分列表如下：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常委	常委	主席	常委	常委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杨春秀 (农民)	冯飞龙 (军官)	黄飞虎 (后反动，除名)	俞作豫 (军官)	麦锦汉 (工人)	何建南 (农民)	王逸 (知识分子，广东人)	周和平 (农民)	杨志坤 (工人)	姜科 (兵士)	邓生 (工人)	吴式南 (知识分子)	张兆梅 (农民)

——秘书处秘书长 林 礼

肃反 裁判委员会主席	土地委员会主席	军事委员会	行政委员会	财政委员会	文化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	交通委员会
麦锦汉	何建南	俞作豫	王逸	王逸	林礼	吴式南	杨志坤
				<small>(后因王的经济不清由前委解除其职务，由麦锦汉兼)</small>			

(三) 劳动法与土地法

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颁布了劳动法22条，土地法26条。关于条文记不清楚，主要的可以报告的，劳动法关于增资减时的规定，是增加工资的标准由工会根据实际情形以能适合生活条件为原则，酌量规定，减时规定8小时。关于各纪念日、星期日休假，及雇工每年至少须有两星期休养，及工人保障，改良待遇，及童工、女工利益，均有特别的规定。土地法是根据土地政纲，对于分配土地办法，没有呆板规定，由乡村苏维埃代表会议解决。对富农则规定没收一切反革命土地财产，对雇农手工业(者)均以不分配土地为原则，但如要求时亦得分配。红军在未退伍前不分配土地，红军家属由苏维埃给养。

(四) 下冻苏维埃及没收土地情形

在左江区域内群众工作最有基础的，只下冻一区。下冻地广40余里，昔为一州，有一大市场，商店百数十家，分东南西北中五乡。各乡均山岭崎岖，形势险要，统计人口一万六七千。西南两乡农民，完全在我领导之下，东乡大部分倾向我们。北乡是黄飞虎老巢，在黄威胁之下，大多数农民都逃到西南乡来。下冻农民，因过去何建南同志、谢玉芳同志、杨春秀同志曾做过很久的宣传组织工作，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早成立。龙州的赤卫队第一大队及各干部分子，多是下冻人，当黄飞虎因被缴械即逃回下冻，向农民大造谣言，说白军已到了龙州，俞作豫和他的部队均被

打败缴械，以致下冻均在恐慌状态中。何建南同志为要去指导下冻农民执行土地革命根本解决黄飞虎起见，特亲率赤卫队20名到下冻，到时下冻农民因受黄之欺骗，以为何亦系被白军逼迫逃回，均不敢出来。黄即趁此机会密嘱其爪牙何明、黄广贤与何虚与委蛇，请何吃饭，即在会食时将何捕杀。下冻农民因何被杀，即大为愤怒。各乡赤卫队均集中起来，有三四百杆枪，准备进攻下冻市。是时黄即驻下冻市，因有下冻豪绅地主、商民供给黄枪械，称为讨共军，准备攻龙州。龙州遂派红军两连前往剿灭，但红军未到前，黄已被下冻赤卫队迫走上山。下冻农民当攻破下冻市时，愤将下冻市场全部焚毁，将下冻市反动派大的小的杀了200多个。这样的烧杀是充分表现农民意识，同时是下冻的干部同志都跑来龙州，下冻的党简直不能领导群众。龙州的党得此消息，即派谢玉芳等同志回下冻，主持一切工作。下冻就在这次反对黄的斗争中，加深了农民革命的情绪，即于此时建立了各乡村苏维埃（以村为单位）。成立村苏维埃者有西南两乡，当即将一切土地没收。群众要求是共同耕种，因为该乡农民多数出来革命充当赤卫队，分配土地，没有方法耕种，客观的事实上是非共同耕种不可，所以在下冻就实行了共同耕种。他的办法就是在村苏维埃设生产管理部和消费管理部，各部设干事两人，所有粮食概交生产部管理。预计全村需要几多谷子，多余的就卖出来，共同设一大厨房，由消费部管理。一个大牛栏，耕具、耕牛都共用。乡苏维埃并设立消费合作社，由左江革命委员会借出了300元，办了各项油、盐等日常用品。下冻农民

自没收了土地实行共同耕种后，个个都欢天喜地说，我们才真的大家有饭吃了。

(五)没收海关及驱逐领事情形

龙州工农兵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红军以后，法帝国主义即吓得屁急尿流。一方面即实行封锁〔镇〕南关；一方面即照会广西反动政府。广西反动政府竟将此项照会转到前对汛督办署。其照会内容略谓：20日，龙州市面，正当圩会之时，新填地忽发现数十暴民，高举红旗，集会讲演，竟公开宣传实行共产……查龙州与越南相接壤，此种邪说，与越南治安殊有影响。本领事为维持边境治安起见，特照会贵政府，应即设法制止。否则本领事唯有转报越南政府派武装兵百数人、机关枪数挺，开入龙州境内，以资镇慑，诚以此等暴民否认一切治权，断不能容其滋扰也……云云。我们得到此项消息即公开在报上登出，并作评论，主张以群众的力量来答复帝国主义的威吓。群众见报，均极为愤激。各团体即召集会议，即日发出通电，反对法帝国主义无理干涉，并决定了要求革命委员会立即没收海关、教堂及帝国主义在龙州一切财产和企业。于2月19日，召集反帝运动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由农协常委谢玉芳主席，经各团体代表演说后，即整队出发。拥护革命委员会，先到法领事馆，即将法帝走狗领事加伦夫妇捉获。次到海关，该处管理人各帝国〔主义〕走狗均逃避一空，由革命委员会将海关及各教堂、法帝国商店均一律没收，并由群众将加伦夫妇押赴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共产党，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等口号，沿途高叫，革命

情绪极为热烈。这次运动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伟大的意义，实现了共产党的政纲，证明了革命的胜利。此次反帝示威大会，即用无线电发出通电，扩大反帝的影响。此次各群众团体、各机关在没收海关及领事馆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获得很多帝国主义的胜利品。如法最好的红葡萄酒以及西装、食品等甚多，一般群众莫不大喝特喝高叫痛饮黄龙。至海关、领事馆所存现款财产，共计4铁箱，有3个铁箱，是被群众击破，法光〔？〕累累，大家发了一点洋财。其实是几个红军的坏军官发了洋财，没有统计。只有一个铁箱是由革命委员会开的，据说只有2500余元。此外各项用具均分给各机关、各团体使用，群众也搬走了些。在领事馆夺获机关枪1架，搜获炸弹24枚。又两日农民因法帝国主义时时派飞机来左江威吓，一般群众即召集开会反对，正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之时，法帝飞机跌下一架，被农民拿获，两老番（土语）一跌死，一被农民杀死。飞机中并有重机关枪一架，飞机是被农民拆分，机关枪交由农会保管。

四、地方党部情形

（一）特委组织之经过

在左江过去是没有地方党部组织的，虽然有〔几〕个同志，都在军委组织之下而做地方群众工作，如何建南、麦锦汉等。后省委派王逸、林礼两同志前往。在蒙志仁叛变、俞再次入龙州后，大约是去年12月间，才组织龙州县委，

书记为王逸，（委员有：）林礼（组委）、苏文灿（工委）、何建南（农委）、王兼宣委、麦锦汉。在这时有同志16人，分为3个支部，后发展24人，分为4个支部。在转变时，龙州县委为应付左江工作起见，又拟改组为左江工作委员会，但未实行。是时（2月1日），适省委派我到龙州，即以龙州县委改为左江特委，仍以王逸为书记。苏文灿因早赴养利工作，以麦锦江汉同志为工委，林、何照原，我参加宣委，并兼《工兵日报》总编辑。后邓斌同志到龙，又改我兼书记，余照原。

（二）特委成立后的情形

特委成立后，一般特委因同时是革委，除我没参加革命（委）外，都忙于建立革委的机关工作，对于党的内部工作，简直无暇顾及。除（特）委本身和军委时常开会以外，各支部会议差不多有两星期之久没有开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党在群众中当然不能起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高潮虽然起来，群众都十二分的热烈，而党与群众成了脱离现象。一切的工作，只有上层号召，而没有下层的发动，一（以）致一切党的政策、政纲，都不能十分深入群众，所以左江的党，不知不觉的是走上了机会主义的路线。我在特委会议中及对一般同志谈话中，极力的指出，非马上纠正不可。后来邓斌同志到龙，改要我担任书记，但整个的特委是非常不健全，只是凭着一个人的力量去干。同时语言又不通，工作上仍是很多困难，所以仍然做得不好。整个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虽然时常下通告，召集支部会议，详细解释，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一点也不能执行。仍多是天天跑机

关，而不能跑到群众中去，特别革委会的同志，连党团会也不开了。革委的常会、全体会都不开，一切问题，都是由主席包办，甚至包而不办，十足的官僚化了。无论如何的督促。但他们又都同时是党的领导人，所以好象党也官僚化了。在这样情形之下，以致一切的工作，都做不起来。但，在各支部的情形比较以前好些，能照常开会。党的发展虽然是极不充分，但统计已由24发展到90余人，若能执行党的发动群众的路线，那自然是更有伟大的发展。

(三)各级支部与党员数目及成分

1.龙州由特委直接指挥，支部3个，工人支部14人，分2小组，赤卫队支部12人，分2小组，农民支部7人。

2.上金特支——支部3个，都是农村支部，党员共32人。

3.下冻特支——支部2个，都是农村支部，党员共36人。

4.凭祥特支——支部1个（混合支部），党员7人。

统计——特支3个，支部9个，党员98人。

成分——14%工人，70%农民，16%知识分子。此外尚有些地方有同志的工作，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在崇善、雷平、养利已有支部组织，但因无详细报告来，故不知组织情形如何。

(四)会议

1.特委会——常会每星期两次。临时会遇有事件即召集，差不多天天都有会开。

2.支部会议——每星期1次。

3. 支书联席会——每星期 1 次。

4. 活动分子会，在龙州召集 3 次，每次群众大会时，讨论及分配群众组织宣传队工作。

5. 全体党员会，在龙州召集过 1 次，报告政治及党的策略。

6. 特委、特支联席会，召集过 1 次，讨论各地党的进行工作和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计划。

(五) 宣传鼓动工作

1. 《工农兵日报》每日出 1 小张，约 3000 余字，自己办有铅印机，每日发行 5000 份，已经出版 36 期。

2. 《红旗周报》每星期出版两面的 1 小张，约 7000 余字，专解释党的策略及对政治、地方生活分析与纪述。每次发行 2000 份，已出版 4 期。

3. 宣传大纲。每次群众大会及重要事件，均编发宣传大纲。

4. 标语传单。各街市墙壁标语，均满布全城。每遇群众大会及重要事件发生，印发传单、告广西民众书、告工人书、告兵士书，均经常的预备印好。凡宣传队下乡时或红军出发游击，即交给散发。

(六) 准备离开龙州前的工作布置

在决定离开龙州时，党的方面，一般同志多是在龙州公开做工作，势非随军离开不可，因此必须另行建立秘密的特委和支部组织。遂由前特联席会决定以谢玉芳、张兆梅、周和平、谢一泓、杨春秀五同志为特委，并指定谢玉芳同志为书记，于 3 月 18 日召集新特第一次会议，决定特

委机关设在下冻乡村，即将各项文件移交清楚。关于龙州工作，即决定组织一秘密特支，并设秘密交通机关，但，正在进行，20日反动军队即到龙州，一般同志都在慌乱中随红军退出龙州。在龙州同志，有的散去无迹。有的是回了下冻去，龙州的秘密机关，以后是否能再行建立，尚不得知。现在有随军出发、军队收编、以致来港的同志五人，省委决定加以训练，仍派回龙州，设法秘密恢复龙州工作。

五、职工运动

(一)工人组织状况（限于龙州市）

龙州工人在过去即曾有9个工会的组织，后来自国民党清党，龙州工会负责人即逃至各处，工会无形停顿。迨俞到龙州，即恢复了9个工会的组织，但加入人数不多。以后经过我们派人工作，在龙州县委时发展到13个工会，会员统计2000人。转变后，经过召集全市代表大会、反帝、增资的斗争，渐次发展到22个工会，会员统计约5000人。属于龙州总工会的工会如下：泥木、车缝、菇苏、民船、理发、小贩、苦力、伕力、杂务（即杂差）、机器（轮船、电灯、汽车工人混合组织）、音乐（即吹鼓手）、香料、印务、厨司、旅业、铜业、药业、洋杂业、革履、苏杭、药材、首饰。以上22个工会，以小贩工会人数多，在1500人以上。其余各工会数目，记不清楚。这些工会，也有工会支部和小组。组织以苦力、伕力、印务、理发、车缝、泥木、革履、首饰、药材9个工会为严密，其他各业的店员工会都

极涣散。

(二)工人代表大会情形

龙州各工会，于转变后，即召集工人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参加工会13个，出席代表150余人。在开幕时曾召集全体工人群众大会，报告此次大会的意义，并游行示威，表示拥护代表大会。会议凡3日，第1日由邓斌同志报告政治(代表政治部参加)，王逸同志报告全国工人运动概况，并经各工会代表报告了各工会及工人生活状况。第2日讨论各代表提案。第3日选举总工会执行委员、纪律裁判委员。在此次会议中，重要议案为政治报〔告〕决议案及赤色工会章程、斗争纲领等。关于增加工资标准，规定5元以上加1倍，10元以上加5/10，20元以上加2/10。并规定开除工人须经工会许可，否则须给两个月的生活费。闭会后，召集各分工会报告，并讨论执行办法。

(三)工人武装

有赤卫一大队，有枪百余支，梭标数十捍〔杆〕，共有队兵百60余人，均是由各工会派来或介绍失业工人充当，并经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其枪枝来源，系缴自黄飞虎的，由革委交给工会。此一赤卫队，后来退出龙州，改编为红军。

(四)工人斗争情形

在转变后的龙州工人，斗争情绪剧烈。除增资的斗争，资方无条件的接受外，对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工人均自动的起来干，差不多在龙州的反动分子都被工人捉获，交到革命委员会。在初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工人方面就觉得他们占的委员太少，只有两个，还不是他们选出来的，颇

不满意。这一件事本是很严重的值得注意的。但当时负责党的人，就是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只是要何建南同志在他们面前解释：“这一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性质，将来成立苏维埃时，再由你们选举，你们可以多占几个。”就把他们和缓下去，而并不能马上召集工农兵的代表大会，来改组革命委员会，成立苏维埃。这也是受了左江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所以龙州工人群众虽然有很热烈斗争的情绪，但，实际的斗争，是没有做到。龙州的工会，表面是赤色的，实际不但〔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仍然带了黄色性质。增加工资是由总工会规定标准，而不是由各工会自己根据群众的要求；是由政治的力量，资方不敢不服从，而不是由群众向资方斗争。所以可以说，群众是需要斗争，而我们却不领导斗争，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五）失业工人的统计

失业工人没有精密的调查过，据说是在龙州有失业工人二三百人，都是游手偷闲，在赌场中过生活。但首饰工人失业70余人，均加入赤卫队。

六、农民运动

（一）农民的组织与活动

左江农民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的，除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如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5县外，上思、思乐、明江、宁明、雷平、左县、龙茗、靖西8县，都有农协的组织（共计13县）。其区、乡农协与会员数目，概未得

过当地的报告，无从知到〔道〕。各县区、乡农协，其活动大概都是做抗捐、抗税的运动，反对豪绅，抵制土匪。在龙州转变，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各县的县长通都跑了，都是由农协执行政权，对一切苛捐杂税，都实行取消了。但靖西城仍是在郑超手里，苛捐杂税抽得非常重，一般农民都纷纷派代表来欢迎红军去打靖西。

（二）农民武装组织的状况

农民武装，各县都有（至少的都有百余条枪，惟多不能集中，都散藏在乡村。迂〔遇〕有土匪来，就拿枪来和他抵抗）。已经集中成立赤卫队的，龙州的下冻一大队，分二中队，有枪200余枝。后备赤卫队400多，均有枪。凭祥赤卫队130多杆，上金180杆，崇善200多杆，养利160多杆，上思500多杆，靖西3000多杆。其余各县都没有组织，惟左县驮芦系由冯飞彪统率，平时集中的二三百杆，有事时立时可集中3000多枪，均系农民，但在冯个人领导之下。

（三）反动武装组织与活动

左江反动武〔装〕组织，都是叫做民团，有些在城市的就是商团，也有靖卫团。各县能够集中的至少有百余杆枪，崇善豪绅武装有时可集中1000余枪，靖西豪绅反动武装最多约可集中5000余枪，而且枪枝很好。思乐、上思联络可集中3000，但都是土枪，无战斗力。还有些土匪，如钟八有枪2000余枝，盘据在思乐一带（以前和俞也有过联络，但纪律甚坏，也无战斗力）。黄廷仪有枪五六百，出没安南边境及凭祥等处。下冻的黄飞虎、周建鼎虽迭被红军赤卫队击溃，但仍集合有三四百枪。一般的说来，反动武装是

很多的，不过都缺乏战斗力，和军队打仗则不够，压迫农民则有余。

七、龙州失败情形

龙州是于3月20日上午10时许，白军李伯云率兵两团，由太平开来。当到达龙州城下，枪声已响，犹以为是土匪，仓卒应战，军事上可谓疏忽已极。是时，在龙州红军只二纵之一部（一纵早开赴靖西，由邓斌同志带赴右江），只有枪360余杆，连同赤卫队百余人（因前一日已派1连入军校学生赴下冻，1连赴凭祥办米），力量上当然是敌不过白军。尽力抵抗约3小时，结果北门线被敌冲破，不能支持，遂下令退却，由东门过铁桥，向凭祥方面而退。至20余里，即办收容，损失战斗兵约2/10，都是二营的（即宛营），当时即将赤卫队百余人编入二营。这次并打死连长何述休、贺华昌两同志，排长也死2人，都是同志。事后据一般人说，何、贺两同志是一营营长刘贵廷指使人打死的。因为何、贺都是刘营的连长，刘系旧军官，对我们同志向来有仇视，乘机谋害，自是意中事。迨至大连城，原拟退下冻。但因路途险窄，只能通1人，有黄飞虎阻碍，恐难通过，乃径退凭祥。次早到达凭祥，拟在此休息1日，稍事整理。当经前委开会讨论退却路线，一致都认为应向平而关出靖西，与一纵汇合，转入右江。但，一般旧军官均反对，谓向平而关路途非常险峻，要穿过一山洞，倘有敌军截击，就要全军复没。倘要走这条路线，他们就不能跟

着跑。这是何、俞两同志在军事会议中旧军官发表的意见，后来经他们互相讨论，决定向两明的路线，并在凭祥休息1日。至次早10时许，正在召集官兵训话，而敌军又追至，又是和在龙州一样的情形，一点也没有警戒，乃即退出登山，与敌应战二三十分钟，即向镇南关退却。这次损失战斗兵又在2/10，宛旦平同志就在这次战争中带了20多条枪及赤卫队40人向他处跑了，不知下落。在此，还需补述一件事，就是前派赴下冻之一连学生兵，是由林礼、唐克同志统率去的。当白军攻龙州时，他们因为不知消息，刚好于是时回到龙州，与敌接战，当然是众寡不敌。但唐、林奋勇冲出，结果带了50余枪跑到龙州附近一个山上去了。这是根据同他们去的手枪兵冲出来跟上这边队伍的人说的，大概是可以靠得住。我们自凭祥败退，即由俞率队由镇南关向越南边出到思乐，昼夜行走，大概走了三四日，没有消息，又跑得快，又走夜路，大家跟着跑也不知要跑那处。到了思乐，俞、何才告诉我，是要由十万大山，出扶南之苏墟，因为到了那里，马上可以求得子弹、枪枝的补充。稍事整理，并可影响南宁杨腾辉部，使他的部下（与他有旧的关系）可以变一两团过来。但另有一路可走左县，是与冯飞龙联络而进到靖西与右江汇合。他们是认为出苏墟更好，因为稍事整理补充，即可由广东边境灵山出横县、贵县以至郁林。郁林是俞的老家乡，马上可以集合2000好枪，大可以纵横广西，扩大政治影响。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即问是不是需要讨论，还是已经你们决定？他们即问我的意见。我说：走左县可以与右江汇合，我是赞成走左县，

不同意走苏墟、走郁林，因为这边不是我们原来的路线。结果他们未置可否，仍是照着他们意见向苏墟路线前进。又是很快的跑，马不停蹄的跑，跑过十万大山，大约又是走了四五天，到了苏墟。但苏墟的豪绅是架了炮准备攻打，说如果要在这里停留，他们就要开枪。结果是饭也没有吃，就拔队向那陈而跑。到了那陈，俞、何为临时抱佛脚计，又委刘贵廷为第二纵队队长，要我做政治委员，以便抓住刘贵廷，使他不得动摇，又演了一套纵队长和政治委员就职的把戏。到第二天，到了大塘，黄明堂已派人到了此地，与刘贵廷接洽收编，而刘贵廷即同机关枪连长王介，请俞、何下台，由他们向黄明堂收编。理由是灵山、贵县一带满张桂军，到郁林的路线带大队是走不通的，四面都是敌人，除了归黄明堂收编，无路可走。他们是暂时和军阀敷衍，俟俞、何到郁林，他们仍设法带队到郁林，旗帜虽换，精神始终不变，说得如骗小孩子一样天花乱坠。但在此俞、何是再也没有办法了，明知道刘贵廷是有计划的退向这里来，但还是得说没有此事，他们是迫于环境，不是叛他。这时俞、何召集我商量，即是开前委会，讨论此事应如何对付，何主张硬干，将刘贵廷、王介驱逐出队，我亦赞成，不(过)更主张号召兵士起来实行变兵，我们带得几多就带几多跑！我估量群众是有把握的，因为有100多赤卫队做基础，而且很多兵士都是随俞多年，就在旧的关系上也要比刘好些，况且受了我们政治影响不小，又有同志在内活动。当时俞是非常犹豫，硬要说刘不是叛。经再三讨论，决定实行分化，带得几多跑就带几多跑。但到了次日，南宁方

面又派了学生兵一队和当地民团来追，听说只离10里，马上就到广东边境，由黄明堂派来的人引路，带到一个距广东边境60里路的山上，叫做马鞍山。是夜，俞、何即与刘商量妥协，带手枪兵30余枪化装出走，各事均已准备好了，才向我宣布。当时我即极力反对，说这种脱离群众的投降，是最可耻没有的事，于政治影响很坏。他们即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领导兵士兵变，就是好办法。他们说，就是带到这些兵士，兵士也要逃跑，决带不了。我说从斗争中带来的兵士是有认识的，而且有赤卫队的基础，他们没得话说，只是不顾一切的不理。我即时召集各政治工作同志和其他负军事责任的同志开会，说明此事，大家虽同意我的意见，只是俞、何不听，很迅速就带着30条枪跑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刘到了大寺。刘经收编，委为团长，统计尚有长枪280余杆，机关枪4樽〔挺〕，手枪七八十杆。我们因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当然不能立足，虽然刘还是很客气的对待，说你们放心，军长把你们交给我，决不会有害你们的事，怎样对得住军长。但，我们不是他害不害的问题，而在这里的工作，只没有办法，因〔而〕我和二营连长张燊同志密商，要发动兵变。我亲耳听着好些士兵都很情激的说：“掉他妈！投降军阀。”发动兵变是很可能的。但是张燊同志不敢做，而我又不懂军事，不是带兵官，不懂本地话，而在此是没有作用，其他政治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因此大家决定离开，走到黄福田，坐民船到北海。留在队伍中，仍有士兵同志10余人，连长张燊同志一人，组织支部。迟早此项军队，仍是可以发动兵变而成为我们

势力的，但刘贵廷转变过来是鬼话。后来我们到了省委，省委召集我们开过一次会，由我们将上项情形报告，并由各人发表意见，经省委作结论，大意如下：

1. 龙州红军建立，组织了革命政权，于政治的影响是扩大，特别是没收海关、教堂和帝国主义财产，驱逐法帝国主义出境，是在中国革命史有伟大的意义，实现了本党的反帝政纲，在全国的政治影响确是不小。这些意义，决不能因龙州失败而减少其意义。

2. 龙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一贯的工作路线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不能发动群众，执行斗争，因此不能发展党的组织，这是值得注意的宝贵教训。

3. 右江红军，应本此教训，坚决的肃清机会主义的倾向。应向柳州方向进攻转入小北江。红军只有在集中进攻条件〔下〕，才能扩大与存在。

4. 俞作豫、何世昌同志负主要责任的人，竟脱离群众逃跑，这是最可耻不过的十足的机会主义，应执行党的纪律裁制。

5. 龙州工作，必更加因白色恐怖而更加激怒群众，而使革命的空气更加紧张，革命的条件更加成熟，必须很快派人回去恢复工作。

八、几个意见

对代表大会的几个意见是：

1. 红军应该成立全国集中指挥机关，集中力量，计划

夺取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

2. 中央应选派重要的政治人员，去各地工作，以作政治的中心。

3. 各地军事、政治干部人材，均异常缺乏，凡在苏维埃区域内，必须设立养成此项人材的学校。

4. 领导兵变的工作，仍是做得不充分，应多选派工农同志去白军中工作，领导兵变。

大会成功万岁！

（这是涂振农于1930年9月给党中央的报告。涂又名涂镜吾，曾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1942年“南委”事件后被捕叛变。）

雷经天自传（节录）

1928年1月，党派我去广西工作。

在广州起义后，广西全省戒严，交通封闭。我同一个人交通谢生桦同志，转由海道经北海、钦州，步行进入广西。因旅费用尽，只得装成乞丐，沿途讨吃。自国民党“清党”后，广西我党的组织已被破坏，只有一些脱党的党、团员，星散隐匿，关系都已隔绝。谢生桦同志是同正县人，就先到同正。潜在乡村小学活动，建立党团组织。后转到我自己的家乡南宁，利用社会关系，更好活动，很快就过去失了关系的党团员找到，了解情况，经过审查，很快即把党、团的下层组织恢复起来，继续发展组织。在一些工人群众里面，当时有不少参加广州起义的工人到南宁来做工，分头派人到近郊的农村和几个中等学校，都建立有党团组织的据点。同时去宾阳、武鸣及右江各县找过去关系，进行工作，各地党、团的组织也陆续恢复建立起来。我将工作情况报告南方局，因南方局已撤销，即由广东省委派来交通联系，并决定在6月初在贵县召开广西全省党代会^①。广东省委派恽代英同志出席指导，成立广西

^① 应是广西特委扩大会议。

省委，^①书记是朱锡昂同志，机关设在梧州。我是省委常委之一，派驻南宁，领导上游各地工作。9月曾到省委汇报一次，12月省委召开会议，因叛徒昌景林告密，省委机关被破坏。我到梧州时，适遇省立第二中学的一个团员同志来知道，即转去香港广东省委报告。1929年初，广东省委派文沛同志为广西省委书记，同我一起去南宁，重新设立省委机关。不久蒋桂军阀战争爆发，文沛同志回广东省委去请示工作，指定我代省委书记。当时南宁团的组织被一个刚混入团的奸细（女师学生）告密破坏，团市委及在学校里的团员大部被捕，其中有一个省立第一中学的团员潘海璠叛变自首，他知道我住过的地方（解放后潘自己坦白我才知道），告诉敌人。敌人在夜间派兵围我的住处，但我已先离开幸得脱险。敌人对我虽搜捕很急，因工作关系，但我仍潜在南宁坚持一直到6月。桂系李、白失败，俞作柏、李明瑞投降蒋介石，率部进入广西。因俞作柏在香港与我党广东省委有联系。即派党员同志到广西俞、李的部队中进行工作。党中央派贺昌、邓斌两同志来广西指导，指示广西省委于8月初在南宁召开第二次省党代会^②，开展广西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准备在广西创立苏维埃政权区域，组织工农红军。在当时，广西已具备有相当的条件，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里面，有两个警备大队已为我党张云逸、俞作豫两同志所掌握，右江各县有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的基础，经过武装斗争。会后，贺昌、邓斌

① 应是广西特委。

② 应是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

两同志即决定派我先到右江布置工作，担任右江特委书记。我到右江不久，俞、李又进行反蒋，结果失败；张云逸同志率部到右江，俞作豫同志率部到左江。于10月27日^①，我率领右江农民武装与张云逸同志率领的部队配合，在百色到平马一带沿江城市，同时实行武装起义，解除驻在右江各县的反动武装，同时清扫各地的地主民团武装。建立各地革命委员会。到12月11日，右江23个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宣告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我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党中央委张云逸同志为红七军军长，邓斌同志为政治委员。

1930年初，桂系军阀黄绍竑派兵进攻右江苏区，红七军转到贵州地区游击，我与红七军廿一师师长韦拔群同志留在右江坚持。下半年，红七军才回师右江恢复苏区。但不久，中央派邓岗同志来右江传达立三路线，指示红七军猛烈的扩大部队，进攻中心城市，会师中央苏区，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所有右江各县的地方武装部队全部编入红七军，成立四个纵队。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大部调入军队工作。我也随军出发，由陈洪涛同志接替我的工作，与韦拔群同志一起留守右江。1930年10月，红七军在河池誓师，即向中央苏区进军。1931年4月间，红七军半年苦战，经过贵州、湖南、广东，走遍五省，才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参加粉碎蒋介石匪帮对中央苏区进行的三次“围剿”。胜利后，在会昌开辟苏区，整理部队，进行肃反，

^① 应是10月28日。

从打A B团到打国民党改组派。因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余惠有国民党改组派嫌疑被捕，在刑讯下，诬供我也是国民党改组派，我也被捕，并开除党籍，解送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经局长邓发同志亲自审查。他在广东省委时，完全知道我参加广州起义及去广西工作的情况，他的爱人陈慧清同志同我一起在南宁工作过，知道我更清楚，因此才获释放，留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审计工作，一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我也随队参加长征。

黄 一 平 自 传 (节 录)

红七军时期。

决定随俞作柏出发到桂平任县长后，10月间，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反蒋，开誓师大会。这是俞、李受到汪派的鼓动，据说我党是不同意的。誓师后一两天，他的部队驻在柳州、梧州、桂平的全部反了，还电报他们定期离开南宁。这样，我的工作也变了。当时我党在俞那里搞起了两个大队兵力，第四大队是张云逸同志任大队长，决定撤到百色去。五大队到龙州去。当时罗(少彦)也由军校调第四大队任一营指导员，叫我随他一起去百色。到百色后，经陈豪人(后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余惠(当时四大队政治部主任)和我谈话，经罗少彦同志介绍我的情况，就正式决定我恢复党籍，过组织生活。当时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并派任政治部社会股长。在百色市区和郊区作组织工会、农会工作。因有一点农运经验，努力工作，到12月，市内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百色县农会也筹备成立，郊区农会则已正式成立。

12月，纪念广州暴动日，将四大队正式成立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楚，主任陈豪人，同时成立右江苏维埃及各县苏维埃政府。当时我仍任军政治

部社会股长，及百色县苏维埃委员、肃反、财政两委员会主席。

宣布成立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后，民团、土匪纠集起三四千人进攻百色。前一天群众就报告了消息给我，使得我们有准备打退敌人进攻。我到红七军是第一次参加作战。1930年1月(27岁)军部决定进攻南宁，我随军出发，左江第五大队也改为红八军了，李明瑞任七、八两军总指挥。李带来一个特务队，无政工人员，又命我兼任该队指导员。

还未到南宁，敌人则由南宁派来四五个团进攻我们，在隆安县就打响了。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我们撤退，跟着在平马亭泗却打了一场恶仗，结果双方撤退，沿江城市和百色都给敌人占了。

3月间，军部决定第一、二纵队向外发展（当时红七军只有两个纵队即两个团）及韦拔群同志的地方部队^①；调我任第一纵队第一营指导员。我们在思想上打了一个败仗。我们营长负伤，部队由我指挥。越过贵州省苗民区突然攻击古州城，消灭敌人两个团打了大胜仗。一切得到补充，特别是子弹。我第一次得到直接参加这样激烈的攻坚战锻炼。敌人不甘失败，跟着调来5个团，进攻我们。我们拟走回右江，伤兵和物资很多，行动迟缓。我营担任后卫掩护，一连掩护5天，每天4时起床占领阵地抗击敌人，掩护主力前进。每天要在夜间12时才能宿营，这也是一大

^① 已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

锻炼。

回到右江时，原进攻右江敌人已调走一些，我们当即收复百色、平马及右江各地。我又被调回百色县专搞苏维埃工作。

到百色两天，云南军队进攻广西。有一个师经过百色，我们便退出百色，又回到部队里。军部决定：截击该敌，我们就开到思林、果化间山地埋伏。作战两昼夜，除杀伤敌人外没有收获，自己子弹消耗很多，伤亡很大，我营伤亡过半。跟着我们回到百色，云南军还有一部分地方部队驻百色没有走，包围后看不好攻，以后没有打。

9月间，中央派来代表邓岗同志（即邓拔奇）传达中央决定，要红七军出动配合中央红军夺取武汉、广州、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我们就出动了。到天峨县时李明瑞、陈豪人率我营到贵州边境接红八军一部分队伍，后编为一个团。

到河池开了全军党代表会，传达中央决定，选举军前委，我被选为前委委员。说雷经天同志不执行中央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跟着就整编部队，全军编为3个师，每个师辖2个团，我被提升为团政治指导员。红七军里有等级制，我当营指导员是少校，团指导员是上校，因为不能越级提拔，讲究形式。在任团政指前，还调我任总政治部中校秘书几天。跟着向江西前进。沿途打了不少仗，长安一仗打得最激烈，伤亡很大，无结果，后撤退。

前委又决定要打下桂林城。知道桂林城很坚固，非有

里应外合不可。决定派我去桂林城里当兵，并给我30个人，排连长也派进去当兵。待外面攻击时，要我们占领一个城门。

在12月半时候，部队进到湖南武岗附近，那一天就把我派出去了。其它干部要待我搞好交通联络地点再来。我在红七军历史就这么长。

以上文献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档案资料两栏的资料是由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

——编者

邓小平在广西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1929年7月至1931年1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广西西部地区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30年11月邓小平奉命率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湘、粤、赣四省，途中，坚决地纠正了军内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于1931年到江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百色、龙州起义、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邓小平及其他与之共同奋斗的战友们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这段历史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排除“左”的干扰 进行统战工作

1929年3月，蒋介石与广西桂系集团为了争夺地盘，在长江中游地区调兵遣将，准备展开军阀战争。双方剑拔弩张之时，蒋介石通过与桂系李、黄、白有矛盾的广西军人俞作柏，策动在武汉的桂军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拥

蒋，桂系军队全线崩溃，李宗仁、白崇禧闻讯分别从上海、北京逃到香港。6月，俞、李率部占领梧州，随即进兵南宁，迫使北伐以来一直独揽广西军政大权的黄绍竑也离桂逃港，第一次蒋桂战争随告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又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统领全省军事，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俞、李回广西主政后，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来广西工作。俞、李是广西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俞作柏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曾在桂系军队中任过要职，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军校）校长等职，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与我广西党组织早有联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李、黄、白排挤，寄居香港，当时广西籍的共产党员陈勉恕等也同住俞处。在港的国民党广西左派人士与中共党员共同组织了广西肃反委员会，以俞作柏为主席，共产党员邓拔奇、黄启滔等为委员，该委员会曾发表宣言，声讨黄绍竑。我党广东省委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也常与俞联系。俞作柏准备拥蒋倒桂时，曾和杨殷商量过。俞的胞弟俞作豫是共产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对俞的思想影响很大。李明瑞是俞作柏的姑表弟，参加过讨伐旧桂系军阀和驱逐滇系军阀的战役，在俞作柏部任团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配合叶挺独立团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他对我党有好感，同情革命。这次他们回桂主政，感到广西的党、政、军系统蒋、桂势力需要

清除，部队需要改造，施政需要人才，而他们自己力量不足，地位也还不巩固。因此，愿与我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我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一批同志进广西，到俞、李的政府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派陈豪人、张云逸、龚饮冰、龚鹤村等来广西协助小平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还陆续派了40多名干部于七八月间分别到达南宁，进入政府机关和军队工作。当时，领导广西党的工作的特委属广东省委领导，被派到广西的同志，由广东省委介绍到南宁与广西特委接上组织关系，然后按照党的安排，到军政机关任职，以公开的身份，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张云逸到南宁后，任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南宁市警察局长，余惠、袁任远、王展、阎伯衡、何世昌等或任教导总队教官，或任连排长。

邓小平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情况，然后到南宁。邓小平在南宁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的工作，同时领导整个广西党的工作。当时我党虽然能在南宁半公开的活动，但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党员之间只能单线联系。邓小平的身份，只有少数干部知道。邓小平对工作的指示，是通过陈豪人等几个同志去传达的，其他党员干部受陈豪人的单线领导。

张云逸是通过国民党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介绍到广西俞、李政府“谋事”的，俞、李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为了不暴露他的党员身份，邓小平也没有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张云逸虽知道邓小平到南宁已两个多月，但彼此并没有见过面，只是从陈豪人那里听取邓小平的指示来进行工作。

邓小平到南宁后，知道我党有一批干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捕还被关在狱中，即通过关系向俞、李提议释放这批人并加以任用。俞作柏欣然同意这个提议，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通通释放并让他们在政府机关中任职。罗少彦、何健南、甘湛泽、莫文骅、吴西等就是这时被放出来的，这对于恢复广西地方党组织起了很好的作用。邓小平还提议，要清除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的蒋、桂势力，换上拥护新政府的人，这自然也是符合俞、李心愿的。俞作柏即以省主席的名义通令解散国民党各级党部，并对恶迹昭彰的国民党“清党”委员和反动分子加以逮捕，使广西的反动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我党推荐，俞、李任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如在大革命时期搞过海员工会工作的张子宪，在邕宁搞农运的莫俊峰，开设进步书店的赵子美，以及陈立亚、梁天梦等，分别被任命为县长、公安局长或省政府的科长。但这项人事上的除旧布新工作还做得不彻底，蒋、桂留下的势力一时未能完全清除，蒋介石派驻广西的坐探郑介民还留在省政府任委员，这成了后来破坏俞、李反蒋的隐患。当时，在邓小平等我党同志的推动下，俞、李还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扶助农工”和“必须唤起民众”的宗旨，开放工农

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的农民自卫军。给韦拔群的东风农军发了步枪200多枝，组成1营农军，在南宁进行训练。

与此同时，邓小平指示张云逸和俞作豫在我们担任领导的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中，抓紧开展兵运工作。为了加强教导总队党的力量，邓小平将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大部分分配到教导总队去。张云逸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把三个政治上反动的营长调到训练处去，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然后，派我们的干部去任营长，9个连的干部都换上了共产党员。同时，在各个连队都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紧发展党员工作，两个多月内发展了300多名学兵入党，从而把这支部队牢牢地掌握到我们党的手里。张云逸、李谦担任正、副大队长的警备第四大队，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编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组建起来的。邓小平指示张云逸和李谦：改造这支队伍一定要彻底，先发动群众撤换营连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再改造部队的成份。张云逸便从教导总队调来100多名党员和干部担任第四大队的营、连、排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组织，并从社会上招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1000多人充实部队，把一些成份不好表现差的调去教导总队学习，改造不过来的调到别的部队去。这样，这支部队也掌握到我们党的手里。在俞作豫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造，但对邓小平的指示执行得不彻底，俞作豫早年曾在这支部队任过职，对旧部属没有下决心撤换，致留下了隐患。

邓小平到南宁两个多月，对俞、李做了许多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为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中央和广东省委受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的影响，对邓小平在广西与俞、李合作发展革命力量的做法，不相信也不放心。几次发来指示信，都强调俞、李仍是军阀政府，说他们与桂系李、黄、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最多只是个急进的改良主义者，只是欺骗宣传，不管他们对我党的倾向与表示如何，我们都不应对他们抱幻想，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邓小平坚持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他认为，俞、李虽然是国民党军人，不免仍有国民党旧军人的气味，而 they 与蒋、桂的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所采取的一切进步措施，我们应该欢迎、支持，我们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都应发展，继续做好俞、李的工作。实践证明，邓小平这段工作是做得对的，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的一些批评是错误的。

正确决策 领导起义

1929年9月，广西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上贯彻了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任务，但大会按照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南宁、柳州、梧州三城市的职工运动上。

省党代会后，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改组派头子汪

精卫策动在湖北的张发奎反蒋，企图南下进攻广东军阀陈济棠，夺取广东地盘作反蒋基地。汪感到张的兵力单薄，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表示同意，准备出兵反蒋。面临突变的紧张局势，我党在部队的领导同志有主张随俞、李去打陈济棠的，有主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的，有主张在南宁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陈豪人来向大家传达邓小平的意见：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应当劝俞、李不要匆忙反蒋，我党继续在南宁开展兵运，准备武装暴动。如俞、李不听，即把部队拉出去，但不是到蒋、桂、俞驻有重兵的柳、梧方向去，因我们的力量还弱；也不能在南宁举行暴动，而是到韦拔群等已经工作多年、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力量难及的左右江山区去，同韦拔群的农军结合起来，做好准备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俞、李要调动我们掌握的部队去打陈济棠，就说部队未训练好，不能拉出去打仗。同志们听了都点头称是，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随即分头去作应变准备。这时，邓小平找到俞、李，同他们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回广西主政不到3个月，政府和军内的蒋介石和李、黄、白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清除，政权未稳，经济困难，兵力不足，不应仓促反蒋，不要上改组派的当。俞、李认为，张发奎已经出兵，若不响应，张发奎就有被蒋介石部队歼灭的危险，怎能置之不顾？其实，俞、李急于反蒋，也是形势所迫。因为蒋介石对俞、李回桂主政早就不放心，派郑介民等一批特务监视俞、李的行动。当发现俞、李采取有利于我党的措施，蒋介石即命

俞作柏晋京，企图将俞扣留起来。俞警觉，以奔母丧为名拒绝赴京。时间一长，俞、李企图反蒋，蒋要消灭俞、李的图谋，彼此都心照不宣。同时，俞、李也想一举打下广东，占据更多地盘扩充势力，解决广西当时的经济困难。因而表示：他们攻粤反蒋的决心已下，叫邓小平不要再劝说了。邓小平见劝说无效，即提出：出兵广东，南宁不能全部空虚，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还没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应留守南宁，由张云逸任南宁警备司令。开始，俞、李感觉为难，谈来谈去，终于同意这几支部队留下，但要从教导总队抽调一批干部回各师去充实领导，邓小平表示同意。后来，从教导总队抽出300多名非党干部回到各师。

9月27日，俞、李通电反蒋，蒋介石于9月28日、31日两次打电报给李明瑞，威胁他不要“效尤李、白，重蹈张逆（发奎）自绝党国之复辙”。李明瑞置之不理。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大会，誓师反蒋，宣布由俞作柏任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出发攻粤。

俞、李的部队出发后，邓小平迅即调遣部队作应变准备：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左江地区；派雷经天等一批同志去右江。派何健南等一批同志去左江，加强党的领导，发动群众，打好起义的基础。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舶，以备一旦有变，即把军械库的几千枪枝和弹药装船外运。令在南宁受训的韦拔群的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

划。

俞、李出发攻粤的部队刚到桂平，他的3个师全部叛变投降。蒋介石任命广东的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任命在梧州的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与粤军联合讨伐俞、李。俞、李出兵反蒋，前后只有十多天就彻底失败了，最后，身边只剩几个马弁，黯然返回南宁。

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了骚动。在教导总队，从俞、李3个师调来学习的学兵，闻知部队倒戈反俞、李，即闹着要回去。反动的总队长许廷杰乘机拉人投蒋。共产党员、教官李朴、袁任远、冯达飞等决定逮捕许，被许发觉，半夜起来集合学兵企图拉队逃跑。李朴当众揭露许的阴谋，并向许开枪。一时枪声大作，许在混乱中逃跑。邓小平得到消息，指示张云逸立即赶去稳定局势，在群众中揭露投蒋阴谋，尽量争取愿革命者，把队伍稳住，争取不了的送走。张云逸连夜到教导总队召集党组织会议，传达邓小平指示，党员连夜分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把还坚决要走的100多人送走，把队伍拉到郊区西乡塘去整顿，准备开往右江，这是南宁兵变的开始。

根据邓小平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研究决定，10月14日，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出发去龙州，俞作柏、李明瑞跟着前往。到达龙州后俞作柏出越南去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继续与我党合作。10月17日，邓小平、陈豪人等党的领导同志和部分干部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装满军械的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

路掩护前进。袁任远等许多干部在南宁虽然知道是邓小平领导他们工作，但都没有见过面，这次同乘一条船，才第一次见邓小平。大家感到邓小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健谈、诙谐，都愿意和他接近。他与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船行四天，到了恩隆县平马镇。张云逸率领的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也到了。经叶季壮介绍，张云逸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张云逸一把握住邓小平的手，不禁欢呼起来：“哦，你就是小平同志！”几个月来，张云逸经常得到邓小平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张云逸的手。同志的感情充满心间，使大家一时忘记了说话。这时，雷经天和右江特委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见了邓小平都很激动、兴奋，欢快地谈笑，对即将展开的一场新的战斗充满了胜利的信心。邓小平随即召集领导同志研究，提出部队部署和武器弹药存放安排的建议：部队领导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明天启程去百色，大部分军械也随带去，暂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运往东兰、恩隆七里山区存放。第四大队留1个营驻恩隆，1个营开往恩阳那坡，1个营驻果德。同志们都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次日，大家分头出发。10月23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驻百色。

10月23日，邓小平召开部队党的委员会议（后来改为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整顿、补充部队，宣传发动群众，掌握政权，筹集经费，准备起义。会后，邓小平、张云逸亲自给部队讲课，宣讲党的“六大”决议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通过宣传发动，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把部队中

的反动分子和兵痞流氓清除出去，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之后，又把部队分到各县，对各县的警备队进行改造。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恶霸的枪枝武装自己。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使部队迅速得到扩大。

邓小平和张云逸还到省立第五中学给全校师生宣讲共产党的主张，号召他们参加革命。五中学生受到很大鼓舞，主动组织宣传队，到城郊那毕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组织农会。以后有不少学生参军，参加革命，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邓小平还派黄一平去发动工人群众，在百色城成立了各行业工会和县总工会、百色工人赤卫营，部队给他们发了武器弹药。同时，按照部队党委决议，张云逸以右江督办名义召集各县长开会，叫他们交出武器和公产，由各县农会接管旧政权。农会改称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关。

武装起义的积极准备，引起地主豪绅一片惊慌。他们勾结驻在恩阳、恩隆一带由熊镛带领的警备第三大队，妄图以接防第四大队为名，抢占百色地盘。不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将严重影响武装起义的进行。陈豪人与张云逸交换意见时，一是主张强攻，一是主张智取，征求邓小平意见。邓说：智取与强攻并用；可以商谈接防为名，请熊镛到百色来，一举擒下；同时，命令雷经天指挥在恩隆的部队和农军，将其驻平马的1个营包围缴械；命令驻那坡的第四大队二营包围其驻那坡的1个营。陈豪人与张云逸认为这个计划很完善，便马上分头执行。百色和平马收缴第三大队武装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在那坡的行动却被敌人发觉，

双方展开了激战。邓小平即派张云逸亲自带教导总队的两个连，连夜赶到那坡指挥。结果，敌人除逃跑1个连外，其余两个连都缴了械。消灭第三大队的战斗，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枝，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1月初，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的龚饮冰回到百色，传达中央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要求“迅速转变”，尽快起义。并批准建立前委，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前委委员7人，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中央还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两军的领导干部。起义前夕，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对起义工作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会议决定：

1. 按红军建制改编部队为3个纵队；
2. 拟定政纲，印刷宣传品，向群众开展宣传；
3. 掌握动态，控制局势；
4. 决定在广州起义二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

会后，龚饮冰被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为了进一步做好龙州起义准备工作，邓小平决定先到龙州，然后再赴上海。

11月中旬，邓小平带袁任远和余惠去龙州检查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走到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时，恰逢从龙州来的李明瑞。李是想趁卷土重来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粤军在粤桂边争斗，南宁兵力空虚之机，到百色联络第四大队打南宁的。邓小平得知李明瑞的来意

后，便和他坐下来，耐心地同他分析形势。邓小平指出，目前南宁虽空虚，但我们两个大队的人马也是不易打进去的，即使打进去也守不住。劝他不要打南宁，参加革命，一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听了，表示还要考虑。为做好他的转变工作，邓小平与他一道返回百色。在百色，邓小平和张云逸又同他交谈。肯定他在北伐战争中为革命立了功，这次主政广西又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劝他与我党一道打起红旗革命到底。经耐心谈话，终于说服了李明瑞同意放弃攻打南宁的计划，他表示愿意参加革命。3人遂一起研究龙州的工作。邓小平举了许多例子，强调改造旧军队的重要性，叫李回到龙州后一定亲自做好这个工作。李明瑞回龙州时，恰遇蒙志仁叛乱，便同俞作豫指挥部队平息了叛乱。李明瑞深感到邓小平关于改造部队的指示重要，对这位年轻的有胆有识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由衷敬佩。李明瑞同俞作豫一起认真抓了部队的整顿工作，为起义作准备。12月初，邓小平带严敏、何世昌、袁振武等到达龙州，和李明瑞、俞作豫等研究了龙州起义计划，部署了各项工作。又召开党员干部会，讲明建立红军，举行起义的意义，介绍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和策略。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举行武装起义。之后，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作一次长谈，指出：我党目前虽然困难，但我党基础好，主义正确，革命是人心所向，一定会胜利的。李明瑞表示坚决革命到底。不久，李明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此后，他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革命的熔炉中，成为我党一名英勇的红军指

挥员。

12月上旬，邓小平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了“补充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对广西准备起义工作中几个关键的问题作了扼要的说明。他说：“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动起来……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要有准备地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动。”二是布置了龙州起义的工作。他说：“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等20余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已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的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三是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工作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十分注意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和改造旧军队工作，使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举行武装起义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得以顺利进行。

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部署，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我党领导驻百色和龙州的部队顺利地宣布起义，百色的部队成立红七军，龙州的部队成立红八军，同时产

生了红色政权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

发动群众致力于根据地建设

邓小平回中央期间，陈豪人主持前委工作，调动红七军大部向右江下游移动，红八军主力到崇左县集中，请李明瑞到右江共同指挥，想趁粤桂战争之机会师攻南宁。1930年2月4日，红七军与桂系4个团在南宁西北之隆安发生战斗，激战3日，双方伤亡很大。红七军撤出隆安，后退到盘阳（今属巴马县）休整。之后，七军前委派出第一、第二纵队去外线打游击，以补充给养和弹药。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听了留守龙州的宛旦平汇报，知道红八军及左江工作的大致情况。根据中央关于不打南宁的决定，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电告红七军停止攻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电报发出后3天，收到七军复电报告隆安之战失利。

红八军撤回龙州后，邓小平召开左江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建立了八军临时前委。会议讨论了八军及左江的工作，决定充分发动群众，打好群众基础，机关所有党员都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分派部队到龙州附近几个县游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及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等群众组织；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迅速解决反动武装；开展反法帝国主义的斗争。

此时，红七军已退出右江，为了扫除左右江之间的障碍，以备八军向右江推进，经临时前委研究，决定由邓小

平亲自带八军第一纵队迅速打下靖西。2月28日，邓小平到八军第一纵队驻地雷平县宝圩，鉴于第一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党员，纵队还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情况，便召开党员会议，帮助第一纵队建立了第一纵队党总支委员会，由纵队参谋长袁振武担任书记。邓小平向全体党员指出：党的委员会是部队最高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才能执行。并把这一决定，公开向非党员纵队司令何家荣等作了交代，嘱咐他们要尊重纵队党的领导。一纵队由于建立了党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第一纵队单独转战在桂、滇、黔边的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甚至在纵队司令离队的情况下，全队仍能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终于与红七军胜利会师。一纵队的指战员们后来回忆这段历程时，深深感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一纵在危难中赖以转危为安的根本保证。

3月7日，邓小平率一纵队围攻靖西县城。10日，右江向都县委书记陈鼓涛前来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里，可以过江。邓小平决定即去右江传达中央指示，纵队领导派一连人护送。临行，邓小平指示纵队领导：一定攻下靖西，随时注意龙州方面情况。并向龙州发电报，告诉八军要按前决定进行工作，加紧发动群众，待地方政权有了基础，八军即向右江靠拢。可惜八军领导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致遭失败。

1930年3月10日夜，邓小平一行离靖西，3月17日晚过右江。因等待东兰消息，在思林县兰芳村住了近半个月，

4月5日到达东兰武篆。沿途，只要有机会，邓小平都要找干部谈话，开群众会作宣传。在向都县南区和北区都找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的干部研究布置工作，指示他们依靠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巩固革命政权。在兰芳，开办了农民赤卫军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给他们上课，讲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还召开群众大会，赞扬他们革命工作搞得好，鼓励他们革命到底。当年听过邓小平讲话的群众，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说邓小平同群众讲话，十分亲切，振奋人心，许多青年听了讲话，受到教育参加了革命。

邓小平到武篆后，知红七军主力已向庆远方面游击，随即赶到河池。当时，七军一、二纵队已远去桂黔边，乃转回武篆，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同志一起，领导东兰、凤山的工作，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邓小平在武篆，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红四军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实践和东兰、凤山试点的经验，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名义，分别在5月1日和15日颁布。5月，东兰、凤山大多数乡村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了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在武篆的旧州屯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兼教员）等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东兰、凤山县委及部分区乡的党员干部，共100多人，课程多数是由邓小平讲。训练班将结束时，将讲稿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大家，计有：《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在武篆

期间，邓小平经常深入基层，访问群众，还同韦拔群到善学村（今巴学村）红军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这里住着隆安、亭泗战斗中负伤的几百名伤员），询问他们有何困难，检查医院的设备，劝慰伤员安心养伤，伤好后再上前线多杀敌人。由于当时经济十分困难，伤员的生活很艰苦，邓小平指示管理部门给每个伤员发一块光洋，伤员深受感动。

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立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面。大家见面十分兴奋。接着，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今后行动问题。根据中央要红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的指示和红七军面临的形势，大家认为：湖南现在驻有敌人重兵，红七军不宜立即向湘粤边发展，且右江自红军去后，群众有失败情绪，需要七军回去开展工作以巩固右江根据地。同时，回百色还可补充兵员，解决服装经济问题。会议决定红七军回右江一个短时期，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红七军回师右江后，即收复了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

红七军收复右江各县仅10天，与过路滇军在果化打了一仗，激战5日，敌军损失很大，七军亦有伤亡。双方撤出战斗后，滇军仍占领百色。红七军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邓小平把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作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来抓，亲自在平马西街办了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培训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干部100多人。培训后，学员便回本区、乡，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发

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7月下旬，红七军集中平马整训。这期间，邓小平、陈豪人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地方工作。邓小平和雷经天特地到思林县那叭村看望伏击滇军战斗中的伤病员，察看他们的伤势，询问他们的病情。每到部队，都要询问干部战士的生活状况；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抽时间访问群众。右江一带当年见过邓小平的革命老人和红七军的干部战士都说邓小平爱兵爱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红七军经过三个月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党的工作也有加强，又补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右江赤卫营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全军发展8000多人，整个部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平马会议和河池整编

平马整训后，大家又提出按原计划向湘粤边出发的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和保护右江根据地的秋收，以免快要成熟的粮食被地主豪绅抢去，红七军决定在10月1日出发。出发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即邓岗）赶到，要传达中央指示，又推迟了出发日期。

10月2日，邓小平在平马主持开红七军前委会，由邓拔奇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

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这个指示是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虽然在1930年9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纠正，但当时红七军还不知道。前委讨论时，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虽然提出红七军力量不足，无法完成中央下达任务的意见，但邓拔奇、陈豪人则表示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去打大城市。会议最后仍决定按中央指示执行，部队到河池集中。

10月4日，红七军一、二纵队离开右江，绕道凌云，向河池出发。10月6日，邓小平和邓拔奇途经燕垌街时（今巴马县），在燕垌召开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0多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4点指示：1. 整顿、扩大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2. 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 抢收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4. 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工作，防备反动军队反扑。经与会同志讨论，对红七军离开后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会后，邓小平同邓拔奇到东兰武篆，与韦拔群率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11月初，红七军7000多人集结河池，红八军一纵队300多人在袁振武（袁也烈）率领下，也到达河池，编入红七军建制。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凤仪小学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6月指示，通过了决议：

1. 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桂林、广州；
2. 整编红七军为3个师，第十九、二十师出发，二十一师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重建；

3.改选前委，邓小平仍任书记；

……

大会提出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陈豪人为兵委书记。

柳州、桂林、广州，蒋、桂军阀驻有重兵，红七军去打数倍于己的敌人，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特别是打柳州困难更大，邓小平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减少部队损失，他在会上建议先打桂林，不打柳州，他的意见得到李明瑞、张云逸的支持。但邓拔奇、陈豪人表示不能改变打柳州的决定。

会后，前委即着手整编部队，把3个纵队改编为3个师。11月9日，全体指战员集合在河池三里亭前举行整编大会，军首长宣读各师干部委任令，授予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旗帜，最后，军首长检阅了部队，并进行北上动员。

摆脱立三错误路线

率领红七军转战粤、桂、湘

11月10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

踏上征途后，邓小平始终不主张硬打攻坚。原来准备经庆远向柳州前进，占领怀远后。发生了是否攻庆远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中央指示集中攻坚，应攻庆远；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固守，邓小平反对攻庆远，主张及时渡江向桂林出发。李明瑞、张云逸等都同意不攻庆远。

次日在天河县（今罗城）四把与敌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

遭遇，发生了激烈战斗，与敌相持3日之久。红七军撤至三防。在三防休整数日。指挥部决定放弃攻打柳州计划。邓小平等决定攻打长安，以筹措冬衣。长安久攻不下，红七军乃退到富禄渡江，向古宜（今三江县）前进。原打算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有敌军教导师驻守，无法过河。又闻柳、庆之敌已移师桂林布防，乃放弃打桂林计划，改走湘桂边。进入湖南的绥宁，后进攻武冈不克，即经新宁，过资源，突袭桂北的全州。

红七军自离开右江之后，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李明瑞、张云逸团结一致，坚持正确主张，沿途不断与坚持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未得到克服，部队仍然受到很大的损失。红七军经过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但敌众我寡，没能攻下一座大城市，而且长期行军和频繁战斗，部队减员1/3以上。1931年1月2日进占全州时，官兵失败情绪甚深，指战员们怀疑中央命令是否行得通，迫切要求解答部队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全州，邓小平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邓小平提出：1. 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2. 改变硬打攻坚战略；3. 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前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部队开往湘粤赣边界，到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会后，邓拔奇和陈豪人说要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前委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将4个团改为3个团，把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充实到下层去，变为战斗人员，对伤兵也作了安置。

1月5日部队从全州出发，经永安关到湖南的道州（今道县）向江华进军。从道州到江华百里的行军途中，突然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战士穿的还是从河池出发时的单衣、草鞋，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为了御寒，战士们把在全州得的布拿来盖在身上，顶风冒雪，忍着饥饿，行进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有些体弱的战士实在走不动，到路边休息，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牺牲了。到江华时，部队疲惫之极，军部决定休息两天，解决迫在眉睫的被服问题，突击治疗冻伤。前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决定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开展工作，站稳脚跟，再图发展。会后，由于敌人要来，时间紧迫，没收、征收和买来的棉花布匹还来不及做成衣服就发给大家。部队还进行了轻装，将大炮等笨重的东西掩埋起来。第三天，翻越桂、粤、湘三省交界的老苗山，回到广西贺县的桂岭。

在桂岭，邓小平召集前委会议，根据部队减员只剩4000多人的情况，决定缩编为2个团。部队取消师的建制，缩编为五十五团、五十八团，李明瑞兼五十五团团团长，龚鹤村兼五十八团团团长。部队在桂岭休整3天。缩编后，经过教育和鼓动，又得到休息和补充，冬衣也准备好了，战士的斗志又旺盛起来。

1931年1月中旬，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的率领下，离开广西，进入广东的连县。后经乳源县境到达乐昌县的梅花村，与来犯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损失很大，遂甩掉敌人，强渡乐昌河（即武水）。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渡过东昌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崇义。崇义

县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到崇义不久，部队与中共赣南行委取得联系。邓小平统一领导该县党组织和当地红军，在那里做了20多天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了4个区工农民主政权；培训党员，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拨出枪枝，加强了地方部队。1931年2月，把崇义的工作安排好后，经团委（当时军前委改为团委）研究决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将了解到的“富田事变”情况带去中央。临行前已近春节，邓小平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与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同时慰问在杰坝治疗的红七军伤病员，然后离开队伍去中央。

红七军五十五团2月中旬离开崇义到遂川的大汾，向永新前进。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避开乐昌县，到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3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第三团汇合。然后两支部队南下资兴、汝城，寻找五十五团。随后北上，在茶陵打了一个胜仗，歼敌300多人，以后转到永新的天河。1931年3月下旬，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终于在天河汇合了。4月底在永新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选出了新的前委。后来与红二十军、湘赣独立一师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第二次反“围剿”，在安福大胜蒋介石的韩德勤师，连克茶陵、攸县、安仁、酃县、遂川五县，军威大震。1931年7月，中央将红七军、红二十军调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连续参加第三、第四次反“围剿”，英勇善战，屡战屡胜。

红七军离开右江后，转战桂、湘、粤、赣，历时9个多月，行程7000余里，到与中央红军汇合时，红七军的老战士尚有2000多人。红七军转战4省，历尽艰辛，能够把这批骨干力量保存下来，是与邓小平等同志排除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红七军的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前仆后继，坚毅顽强，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卢 行执笔)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和张云逸、李明瑞、陈豪人（又名陈导民）、雷经天、韦拔群、俞作豫等分别发动和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威震南疆的英勇的武装起义。他们领导创建的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当时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南部边陲。北与贵州省交界，西和西南面分别与云南省和法属殖民地越南毗连。它包括了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的百色、恩阳（今属田阳县）、奉议（今属田阳县）、恩隆（今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东兰、凤山^①、凌云、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镇结（今属天等县）、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宁明、崇善（今属崇左县）、左县（今属崇左县）、雷平（今属大新县）、养利（今属大新县）、思乐（今属宁明县）、明江（今属宁明县）、龙茗（今属天等县）等24个县，和都安、那马

^① 当时的百色、东兰、凤山、恩隆等县有一部分地区现属巴马瑶族自治县。

(今属马山县)、隆山(今属马山县)、天保(今属德保县)、万承(今属大新县)等县部分地区,及河池、邕宁等县部分游击区。根据地面积约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根据地极盛时期,有正规红军两个军,10000人左右,地方脱产工农赤卫队有八九千人。根据地里的红军和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在我党领导下,以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有着自己的不同特点和实践意义,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我党对俞、李的统战工作和南宁兵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全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在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军阀混战连年不断。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军阀混战,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有利的时机。

同年4月,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于同年6月委派俞作柏和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7月,俞、李开始在广西主政。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协助工作。我党中央早已有利用蒋、桂矛盾发展广西革命工作的计划,因此,便及时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化名龚楚,后叛变)、叶

季壮、袁任远、徐冠英(又名徐开先)、史书元(又名史遽然,后被开除党籍)、许进、李谦、袁振武(即袁也烈)、胡斌、沈静斋、冯达飞、何世昌、李朴、许卓、余惠、宛旦平、钟鼎、章健、张翼、李干辉、王逸(后被开除党籍)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来到广西。与原先参加过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于同年7月到达南宁后,以非凡的胆略,一方面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与广西掌握省一级政权的国民党左派建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担负着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中共广西特委)的重任。

俞作柏和李明瑞两人是亲姑表兄弟,原在新桂系军队中担任要职,大革命时期,他们深受我党和工农运动的影响,靠近我党,倾向进步,立过战功。后遭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首领的排斥和打击,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新桂系的羁绊。他们主桂后,踌躇满志,想干一番称雄中国的大事业,但蒋介石对他们并不放心,派出了郑介民、卢奕农等一批亲信到俞、李政权中和军队中担任要职,暗中监视。新桂系军阀的旧部势力也不甘心失败,妄图从内部破坏和发难。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也派人到广西插手活动。在军事上,李明瑞从湖北带回广西的部队只有两个师,基本上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成份极为复杂。再加上群众基础薄弱,政权很不稳固。当时,邓小平等同志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广西的政治形势出

发，正确分析俞、李主桂前后对我党的政治态度和主桂后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不囿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决议中对待中间阶级的错误分析，而采取了正确策略：既把俞作柏和李明瑞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带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广西新政权与国民党右派相区别，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与他们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事；又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对新桂系中的顽固右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则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邓小平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亲自做俞作柏、李明瑞等广西上层人物的工作。这段时间，我党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通过党的内部活动，把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安插到俞、李的军政部门任职。陈豪人到省府担任机要秘书；龚鹤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调任南宁市公安局长；徐冠英担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张云逸、史书元、石迟锋等到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担任要职。同时，俞、李还同意释放“四·一二”政变时被桂系新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起用他们到政府和军队部门工作，并破格委任一批进步青年到各县担任县长。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

（二）、积极开展兵运工作，迅速发展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以此作为工作重点：

当时，俞作柏、李明瑞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注

重扩建军队，以充实其军事力量。我党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由张云逸负责领导，并得到了同意。该总队设3个营9个连。学员共1000多人，主要来自李明瑞部队中的班、排长和从地方招募来的进步青年。从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和广西地方党组织选送来的100多名工人、学生党员，也安插到教导总队的各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党员则安排到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等工作。对政治上反动的旧教官，则采取“调虎离山”和“明升暗降”的办法，让他们担任较高职位的军事训练工作，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指挥实权。当时，9个连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各连队都秘密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的工作秘密而又迅速地进行着，仅两个月时间，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同时，总队加强了对学员的政治宣传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并通过各连队的党员，密切联系学员，宣传、教育、争取学员群众，使连队的政治气氛较为浓厚。这些学员训练后分配到各部队去，便成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

当时驻守南宁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除一部分是李明瑞在广州招募的广西籍青年和俞作豫从北流带来的青年农民外，大部分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容的民团、土匪和散兵游勇，成份复杂，军纪较坏。很需有丰富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的军事干部去帮助整顿。对此，我党便通过内部关系先后派俞作豫和史书元担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派张云逸和李谦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和副大队长。这两个大队编制均为3个营9个连，各1000多人。张

云逸、俞作豫等到这两个大队工作后，按照党的指示，以合法的身份，有效地开展士兵民主运动和改造部队工作。首先是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广大士兵群众中，除了少数是兵痞、流氓外，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被迫抓去当兵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豪绅的压榨，当兵后又受着反动军官的虐待，往往是敢怒不敢言。经过耐心启发教育，宣传我党的主张，他们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在此基础上，发动广大士兵群众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等罪行。接着，抓住士兵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有利时机，迅速、果断地撤换那些为广大士兵所痛恨的一批反动军官，另派一些党员干部到各营、连、排中担任领导工作。对连以下的旧军官，则多数送到教导总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这样，使这两支军队都“已带了红色”，领导权很快掌握在我党手里。在此同时，大力发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军，迅速增加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并在连队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把士兵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来，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积极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经我党的建议和内部活动，俞、李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各地工会和农协会组织，选派一部分青年与农运干部，到各县去工作，并以‘二五’减租为号召。

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我党于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了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雷经天为省农协会筹备会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会议期间，

经过党的活动和安排，俞作柏会见了韦拔群，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批武器、装备。会后，我党又推荐一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骨干，进一步推动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此同时，我党在南宁也派干部到酱园、轮船、汽车等工会活动，并在汽车工会中建立了1个党支部，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四）、迅速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

当时，广西各地党组织非常零乱。有一半党组织失去与广西特委的联系，“特委及各县指导机关多不健全”。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和贺昌等在抓紧兵运工作的同时，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党的恢复、发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的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并与省特委取得了联系。省特委曾于8月初在南宁开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有十六七人参加学习，学习有关“政治、职工、土地、组织、C Y五课”等内容。同时，还出版了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以加强对党员的宣传教育工作。

为了传达贯彻党“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邓小平和贺昌同志指示中共广西特委于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①，贺昌在会上作了详细的政治报告。会议根据“六大”和二中全会

^① 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的精神，认真总结广西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大会最后选举产生新的省特委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9个文件。在《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出“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正确主张，这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至此，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支有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县；南宁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全省党员共420人，团员130人^①。全省革命形势有较快的发展。当时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曾这样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省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人到南宁游说俞、李反蒋。另外，当时蒋介石发觉俞、李与我党的关系，欲解决俞、李，故俞、李便决定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共同反蒋。我党接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不到半年，立足未稳，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将打乱我党原来的工作部署。因此，我党一方面向俞、李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说他们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作出应变的决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群众基础较好的左

^① 1929年10月20日《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

右江地区农村，把我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到左右江地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此，邓小平和贺昌立即与中共广西特委商议，专门召开了左右江地区工作会议。会后，立即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和担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派严敏、钟鼎、陈洪涛、徐达生、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向都等县领导农运和筹建县党委；派何建南、麦锦汉、苏文灿等前往龙州县领导农民运动，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何建南担任主任委员。这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9月下旬，俞、李不听我党劝告，决定通电反蒋。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后，即出兵沿西江进攻广东。我党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五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建议把这些部队留守南宁，俞、李同意我党建议，并同意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机关。当俞、李率兵离开南宁后，我党便抓紧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在加强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和改造工作的同时，把所有汽船集中在邕江岸边待命，以便随时调遣。

不出我党所料，俞、李出兵反蒋后不到10天就失败了。俞、李部下的第十五师师长吕焕炎，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和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旅长黄权都被蒋介石以重金收买后倒戈投蒋。粤军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即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个师入桂逼近南宁。这引起南宁

极大的骚动，一些反动分子于10月6日捣毁、破坏省农协机关^①。教导总队中没有改造好的反动军官趁机煽动学员离开队伍去投蒋。俞、李在南宁也想撤换教导总队中的一些长官，提防我党把教导队带走。对此，教导总队中的党组织连夜召集各支部领导成员会议，决定分组发动广大学员群众对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揭露他们的投蒋反动本质，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经过一天的宣传教育，争取了大部份学员，使他们认清了是非，站到革命方面来。

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当时军阀混战形势下，广西党组织必须加强对群众日常斗争和军队士兵运动的领导，“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这些指示是正确的。但指示信中对广西的工作作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批评和指示，仍要广西特委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根据广西形势的变化，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当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时，在革命形势突变的关键时刻，他们当机立断，沉着地按照原定的决策和计划，把我党掌握的武装拉出南宁，挺进左右江地区，并把南宁军械库里存放的五六千枝步枪和大批弹药、物资装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船运往左右江地区。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和护送俞作柏、李明瑞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接着，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

^① 1929年10月20日《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

和地方机关干部，指挥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等则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从陆路沿右江掩护军械船前进。俞作柏到龙州后取道越南去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后参加了革命。从此，广西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的右江地区，是广西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它聚居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一半以上。该地区虽然比较贫瘠、偏僻、交通阻塞，经济落后，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在地理环境上，境内多是大石山和丘陵山区，山高林密，峰峦起伏，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战略要地。在政治上，由于该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豪绅地主的残酷压榨（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仍残留农奴制式的土司制度），加上连年兵灾匪祸，生活极端困苦。但广西人民敢于斗争，有着光荣革命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该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便开始在东兰、凤山一带领导各族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曾3次攻打东兰县城。1925年至1927年，韦拔群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先后在东兰县举办了3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了500多名农运骨干，传播革命火种。1926年，余少杰、黄治峰、陆炳堂（陆玗章）、黄书祥等也在恩隆、奉议、思林、那马等

一带领导农民武装斗争。1927年2月和平马镇成立了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整个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过，农军曾攻占了果德、向都、思林、那马四个县城。在长期斗争风暴中涌现了一批象韦拔群那样叱咤风云的、有威望的优秀的农民运动领袖，这里的群众基础是比较深厚的。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等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到达了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百色山城。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与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他们立即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制定了斗争的策略和措施。并决定暂时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利用旧督办机构，宣布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指挥各县地方政权，通令各县上缴税款，保存文书档案，以便稳定各县局势。

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他们在一个多月内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集会（如十月革命节纪念会）和新创办的《右江日报》、《士兵之友》等刊物，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党的“六大”精神和“十大纲领”。部队经常举行士兵会，每天给战士上课一至二小时，同时，每个连队还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农村或街道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宣布废除

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工农群众负担。

(二)继续整顿、改造部队。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 在南宁时，虽经我党进行了初步改造，但由于时间短促，改造尚未彻底，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仍十分严重，有的甚至窃款潜逃，或造谣惑众，图谋不轨。老兵的风纪也不大好。根据这些情况，我党在官兵中着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通过个别谈话、上课学习、早晚点名等活动，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同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作斗争，实行官兵平等。对那些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则进行组织上的处理，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曾严惩一个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深为士兵痛恨的反动营长。在整顿部队同时，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共吸收了1000多名新战士。这不仅壮大了部队力量，而且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比重。

(三)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他们坚持与当地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到右江地区，便通过地方党组织，立即把从南宁运来的5000多枝步枪，分发给恩隆、奉议、东兰、凤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军和百色工人赤卫队，增强其武器装备，并派出军事干部到东兰等县帮助训练。各地工农武装领到这些武器后，如虎添翼，更加猛烈向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展斗争。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县、凤山县农军在正规部队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攻占了东兰县城和凤山县城。同年11月初，黄治峰也指挥恩奉农军数百人攻打奉议县韦宁村土豪黄曹山的反动

民团据点，双方激战五昼夜。后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派迫击炮连支援，终于攻破了这一据点，消灭了这股反动民团武装。

在工运方面，部队党委先后派出7位政工干部到百色，负责指导工运工作。经过宣传、发动，百色先后成立了12个行业工会，会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百色县工会联合会。平马、奉议、恩阳和果德县的果化区也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和行业工会。同时，各县总工会还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共有1000多人，整个右江地区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军政干部。当时，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力量仍比较薄弱，有的部队机关单位，连一个党员也没有。为此，在部队中采取派党员分单位负责“包干”的办法，从新入队的工农战士、老兵和下级军官中积极发展新党员，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至武装起义前，每个连队和大队部的机关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地方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也叫右江特委）。恩隆、奉议、百色、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建立了县委。果德、向都等县成立了县特支，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地方党员五六百人^①。

为了培训党政军干部，军队党委决定，开办了新的教导队和军事政治训练所，吸收部队干部和地方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训练，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此外，还请

^① 1931年3月9日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

军事教官讲战略战术，讲游击战、教骑马等。这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干部条件。

(五)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扫清武装起义的障碍。该大队原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有1000多人枪，大队长熊镐极其反动。他听命于新桂系军阀，打着俞、李旗号，跟随警备第四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平马、那坡(今属田阳县)等地后，与当地豪绅地主相勾结，成为右江反动势力的支柱。他们图谋火并警备第四大队，镇压革命。邓小平和张云逸得到这一情报后，便与雷经天、韦拔群、黄治峰等地方同志秘密进行周密部署，决定10月28日共同行动，围歼第三大队。那一天，张云逸在百色指挥智擒了第三大队长熊镐。同一天，雷经天率领恩隆、思林、奉议等县300多名农军，紧密配合驻平马的第四大队第一营，包围平马的第三大队队部及其营地，守敌全部被缴械。第三大队驻那坡的部队，除了少数逃跑外，也于第二天被警备第四大队缴械。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名，缴枪1000多支。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党和军事的指挥。通知中还指示退往左右江的第四、五大队及教导队，立即开始在左右江实行游击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运动。

11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广东省委并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了百色。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颁给在左

右江地区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并任命了红七军、红八军的领导干部。

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原中央要求十月革命纪念节那天举行起义，因准备工作尚未充分，因而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宣布举行武装起义。

会后，前委又派龚饮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准备武装起义和贯彻中央指示的情况。龚饮冰出发后不久，党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汇报工作。这时，邓小平和张云逸对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邓小平便带领几位干部出发前往龙州，拟向左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和部署工作后再去上海。但途中遇李明瑞从龙州来百色，邓小平便偕同李明瑞返回到百色。李明瑞来百色的目的是要警备第四大队与警备第五大队一起配合张发奎反蒋，攻打南宁和广东钦廉。邓小平和张云逸耐心劝说他放弃参加军阀混战的打算，启发、教育他打起红旗，参加革命队伍。不久，李明瑞回到龙州，与俞作豫一起，指挥平息蒙志仁叛乱。邓小平于12月初从百色途经龙州往上海汇报工作时，一方面对左江地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检查和部署，另一方面进一步找李明瑞谈心，指出其革命前途和出路，并以前委名义，面允成立红七、八军后，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这位在旧军队有较高威望的猛将李明瑞，在我党的教育、帮助下，加上他亲眼看到左右江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各族工农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戴，终于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

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邓小平离开百色后，前委工作由陈豪人（陈导民）负责。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原来的部署，决定以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为底子和骨干，以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军为主体，组编成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以原第四大队2个营为基础扩编而成，约1000多人；第二纵队由原部分教导总队、原第四大队1个营和恩隆、奉议、思林、凌云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约1000多人；第三纵队由东兰、百色、凤山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也约1000多人。全军共4000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2/3左右，壮族约占半数以上。这些编制，尚未公开宣布，但已在部队中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与此同时，前委组织起草和印刷有关武装起义的布告、标语、口号、实施政纲和其他宣传品等。至此，起义准备工作已宣告完成。

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百色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会议。会上，大家热烈拥护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决定。当天晚上，前委又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我党成立红军和苏维埃的意义、政策，为避免泄密便暂时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把军政机关中的反动分子和应回避的人员也控制起来，并于当夜收缴了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体的枪枝共300多支。此时，右江地区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

楼”之势。

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一面镶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头冉冉升起。这一天，秀丽的百色山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大街小巷贴满红纸写的革命标语，家家户户悬挂起鲜红的红旗或五色纸旗。数千各族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市民热烈集会庆祝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担任军长，邓小平担任军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委），陈豪人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长。军部和前委设在百色粤东会馆里。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有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的农民代表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5个镇的工会代表以及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等共80多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担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担任委员^①。在11名政府领导成员中，壮族和瑶族的委员占了6名。这是右江各族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标志。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前委提出的目前实施政纲和有关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

12月12日，在平马镇举行有10000多群众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庆祝红七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云逸军长代表前委出席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盛大

^① 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

示威游行，晚上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利。

随着右江地区各县的相继解放，在红七军的帮助下，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恩阳、凌云、那马、都安、那地等14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都安、那马、隆山等县部份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政权。后来河池县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立即公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行政纲》和《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公开申明我党我军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和革命主张。实行政纲主要内容是：“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改良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这些主张基本符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符合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是当时建设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纲领和政策。

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妄想卷土重来，曾在百色起义后的第7天于12月下旬，纠集了2000多豪绅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乘我红军主力在田州、平马、果德之

机，两次偷袭百色。妄图把红七军和新生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所击退。接着，红七军又与各县农民武装相配合，肃清各地反动武装，先后消灭了恩隆县大土豪谭典章、那地的匪营长韦锦成，百色属大所的大地主罗肇修、罗肇高等反动武装，保卫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1月，粤桂军阀在粤北江和桂北一带混战。红七军前委认为桂系军阀的主力被粤军牵制在柳州、桂林一带，无暇顾及南宁，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便作出进攻南宁的决定。约定红七、八军主力于2月8日到达南宁附近会合，然后夺取南宁。但是当时的粤桂战争仅仅杀成“隔江对峙之局”，加上红七军在进军南宁前，过早公开进攻南宁的口号，事先惊动了敌人，新桂系军阀立即改变战略，决定以南宁和左右江地区为后方，然后再攻钦廉粤军。便命令熟悉右江地形的师长李画新（李琪）为总指挥，率4个团的兵力，“自梧浔线转邕”，先向右江根据地的前哨隆安县城大举进攻。开始，红七军驻守隆安的只有300多人，战斗开始后增援部队才陆续到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与敌激战4昼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后，被迫撤出战斗，向平马一带撤退。在平马赤卫军配合下，袭击了驻平马城外马鞍山的敌军据点，曾追敌至平马城下，又主动撤出战斗，向根据地大后方的东兰、凤山方面转移。当撤到恩隆县北部的亭泗村（今属巴马县）时，又遭到敌蒙志仁团的截击。双方经过3个小时激战后，敌人溃逃，红七军顺利进入凤山县盘阳区赐福

乡（今属巴马县）休整。前委在盘阳举行了会议。会议根据当前新的形势，决定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议，第一、二纵队则由总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率领，出发到黔、桂边界开展游击战争，以扩大政治影响，避开敌人注意力，解决军需供给问题。

红七军主力出发后不久，邓小平恰从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右江地区，于4月初到达东兰县武篆区。这时，右江沿岸各县城已被敌占领，红七军一、二纵队已转战到黔桂边。邓小平便决定留在武篆，与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一起，着手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

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根据井岗山土地法和东兰土地革命的试点经验，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5月15日，又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发了《共耕条例》。在《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原则，对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对发展农业、商业的措施和税收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准则。对于《共耕条例》，只要求在群众政治觉悟高、干部力量强的乡村试行，并强调“各乡得按照实际情况执行”。

在此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把各县农民赤卫军编成4个直属常备营，成立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由黄治峰担任总指挥。其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并在敌人占领的地方进行游击战争。

张云逸、李明瑞率领军部及一、二纵队3000多人从盘阳出发后，经南丹八步，于同年4月初到达河池，在河池

帮助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和县革命委员会。后经怀远、思恩，进入贵州边界，4月30日到达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榕江县城下。经过一天激战，攻占县城，歼敌1个团，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5月1日，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宣传我党主张，并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随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从贵州回师河池。邓小平闻讯立即前往河池与李明瑞、张云逸等会面。在河池召集了一次党员大会，传达从上海带回的中央指示精神，讨论红七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一、二纵队回师右江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然后再向外发展。此时已是6月初。会后，邓小平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第一、二纵队收复了百色重镇。接着，挥师东进，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城，与东兰、凤山、凌云等县连成一片。7月初，当滇军奉蒋介石之命假道右江地区去进攻南宁的桂军时，被我军在果化鹧鸪坳伏击，这一仗虽然不利于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去打击当前主要敌人，但也打击了滇军盛气凌人的嚣张气焰。

这时，根据地形势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红七军前委便集中精力，在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等方面的建设。

(一)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就根据党“六大”提出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的精神，先后通过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行政纲》、《中国红军

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文件和印发《土地革命》等宣传小册子，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邓小平在东兰县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后，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根据各族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军前委按照这两个条例（主要是第一个条例）和东兰县的做法，在右江地区各县条件成熟的乡村，普遍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前委在平马开办一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各县党政干部50多人，邓小平曾亲自给学员讲课。右江地区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分配方式一是“平分”、一是“共耕”。这两种办法，由各乡在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结果，除东兰、凤山两县个别乡试行共耕外，其余多是采取平分土地的办法。

在党的领导下，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果德等县的部分乡村都进行了普查土地、烧毁土地契约、废除债务、没收地主豪绅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工作。广大各族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扬眉吐气，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更加热爱红军和新生政权。但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开展早一点，分了地当年就获得好收成，不少地方由于开展较迟，刚分配完土地或尚未分配土地，红七军主力便离开了根据地，不久敌人来进犯，土地又被地主豪绅夺回去。

（二）加强军事建设

为了总结红七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整顿组织，提高全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红七军前委于同年7月至9月集中在平马、奉议一带进行全军整训。同时，前委在平马组建了军部教导队，培训各纵队连排干部。通过3个月时间的整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般士兵觉悟也相当提高。党的工作也建立了相当基础”。部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各级设有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同时，扩大、补充了部队。据1930年8月统计，仅东兰、凤山两县农军加入红军的就有6000人左右^①。当时，每连队均补充八九十人，并新组建了第四纵队，由黄治峰担任纵队长。至此，全军共发展到8000人左右，成为全国一支令人瞩目的人民军队。

为了保证红军军需供给，红七军在东兰县武篆勉蛾屯、思林县兰芳村、果德县四岸等地开办了小型工厂；在平马等地开办了红军被服厂和铸银手工场。

此外，红七军还派干部帮助各县整顿、训练赤卫军。在红七军帮助下，各县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东兰县各区乡均有“农民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妇女赤卫军（以后男女均编为农民赤卫队，没有妇女单独的军事组织）的组织，全县的农民群众均已参加军事组织。”^②至1930年10月，整个右江地区的地方武装发展到近万人^③。

（三）加强党、政建设

① ② 1931年8月1日邓拔奇给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通讯。

③ 1960年3月《张云逸同志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

红七军前委为加强对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在百色起义后不久，军前委便于1929年12月20日发出了《红七军前委通告（第2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对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健全支部生活、实行党内民主化、培训党的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但因战事繁忙，军队和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尚较薄弱，加上当时的党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存在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红七军回师右江后，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工作，先后发出了“前委通告”第六号，第七号，指出当时右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为此，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努力发展党组织的同时，通过举办训练班和支部活动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前委印发的《党员须知》，以此为中心内容，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除了前委于1930年七八月间在平马举办的党政训练班外，各级党组织也举办了短期的训练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党员干部的素质也有较大的提高。据统计，至同年11月河池整编前，地方党员共有1500人，军队党员有500人。在前委领导下，各纵队设有队委，各营设有营委，各连设有支部。“一般同志革命情绪甚高，对革命前途颇抱乐观”。

在政权建设方面，既以中央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榜样，建立、健全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又根据右江地区的实际，充分发挥壮、汉、瑶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选拔和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红色政权的管理工作。根据地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中，除了少数是外来干部外，多数是本地壮、汉、瑶等族干部。部队中的连排干部，大多数也是本地各族干部。通过实际斗争锻炼，一批土生土长的各族党政干部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各级政权中，发挥了党与各族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作用。

在加强党政建设的同时，右江革命根据地还注意加强群众组织（包括工会组织、农民协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儿童团组织、妇女会组织、赤色救济会组织等）的建设，发动和组织广大各族群众参加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四）加强文化教育建设

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方针是：“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①“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②。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各县苏维埃政府内设立文化委员会，区和乡苏维埃政府设立文化委员，专人管理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有条件的地方都创立各级劳动学校和农民夜校。如百色县曾把省立第五中学改为广西劳动第一中学，由百色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中共党员杨柳溪担任校长；还把百色模

① 《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

② 《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范小学改为百色县劳动第一小学。东兰县城创办了高级劳动小学，由中共党员白汉云担任校长。各类劳动学校，面向工农子弟，不收学费。为了帮助文化比较落后的瑶族地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曾拨出专门经费，在西山16个乡办起初级劳动小学，8岁至16岁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得免费入学。教师由县苏维埃政府派出，学校经费全部由县供给。各校课本一律采用右江苏维埃政府编印的教材，如《工农兵识字课本》等。

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演唱队，运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粤曲等形式。大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又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三、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包括左江（又名丽水）流域的龙州、上金、崇善、左县、雷平、养利、万承、明江、思乐、凭祥、宁明、龙茗、同正、扶南等10多个县。它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东及南宁、钦州，北连镇结、隆安、向都，南靠十万大山。境内多是贫瘠的山地和丘陵，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居住着以壮族为主的包括壮、汉、苗、瑶等各族人民。作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龙州，是桂西南边陲的重镇和战略要地，1885年中法战争后，被开辟为帝国主义的商埠。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曾发迹于此。旧桂系垮台后，新桂系又接着经营，因此，这里的反动基础比较深

厚。但各族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传统。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左江地区各族人民便参加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进行抗法斗争。1907年，孙中山在镇南关发动起义时，凭祥等县人民也起而响应。1922年，壮族进步青年高孤雁等人在龙州下冻小学任教时，曾热情向学校师生和农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为该地区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启蒙工作。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陈霁、易挽澜等被派到该地区领导农民运动，成立了“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县的农民武装仍坚持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29年10月中旬，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后，也同右江地区一样，积极地进行军事暴动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他们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和左江地区的实际，先后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如下的工作：

（一）打着俞作柏、李明瑞的旗号，由俞作豫就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接管督办公署事务，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个武装巡缉队和原留守在龙州的新桂系吕焕炎师部教导队400人。并在邕宁、宁明、明江、龙州、凭祥等县新招募一批新兵，分别编为警备第五大队第四、五、六营，使原来警备第五大队的3个营1000多人扩大到6个营2000多人。此外，对当地土匪武装采取剿抚并重的政策，先后收编了龙州的黄飞虎部和养利的冯飞龙部，分别改编为第一、二路游击支队，委任冯飞龙、黄飞虎为第一、二游击支队司令。同时，以对汛督办公署名义，先后委任了龙茗、万承、宁明、明江、养利等县县长，这为稳定和发

展左江地区的革命形势打下了基础。

(二)在收编、扩大部队的同时，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农村、城镇，宣传、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在第五大队的帮助和何建南领导下，龙州县下冻区东、西、南、北四乡的农民协会很快恢复发展起来，会员共有2000多人。在组建农协会基础上，每乡组建了一支有100多人枪的农民赤卫军连，下冻区成立农民赤卫军大队，共500多人枪，由何建南兼任大队长。接着，龙州县城在14个行业工会相继成立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工人联合总会和龙州县工人赤卫队，后又以龙州县工人赤卫队为基础组建成左江工农赤卫大队，共有1000多人枪。由何建南任大队长，邓生为副大队长。其它各县的工农群众运动也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龙州起义前，共有1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约30000人。部分县建立了工会，仅龙州工会会员便有2000人。各县共建立工农赤卫军武装五六千人。为了加强地方工农武装的装备力量，第五大队曾把从南宁运去的部分武器和取出吕焕炎留在龙州军械仓库的武器弹药，一起分发给龙州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使他们后来成为龙州起义中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工农武装。

(三)平定蒙志仁叛乱。1930年11月中旬，李明瑞与俞作豫商议决定：趁粤桂军阀混战桂平、贵县一带，南宁守敌空虚之机，由俞作豫率部队攻打南宁，李明瑞则前往右江联络第四大队会攻。当俞作豫率第一营为先头部队乘船东下到达驮芦时，警备第五大队副蒙志仁被桂系军阀所收

买，竟胁迫从陆路前进的第二、四营等后续部队退回龙州，实行叛变。当时留守龙州的只有新编的第六营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已而退出龙州。俞作豫获悉后，立即放弃进攻南宁计划，率队从陆路日夜兼程回师平叛。29日，俞作豫率队抵达距龙州县城20多华里的上龙乡水窿村时，恰遇见李明瑞率卫士队和一个步兵连从右江回来。他们立即召开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分析敌我形势，决定发动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助战，合围龙州城，并断绝叛军的粮草。当晚，连夜分兵四路进攻县城，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毙叛军营长潘益和参谋长王国连等官兵100多人，蒙率残部溃逃南宁。12月4日，收复龙州城。

平定蒙志仁的叛乱后几天，邓小平率领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党员干部从百色来到龙州，传达中央关于建立红八军的指示和最近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精神，分析、研究龙州的形势，与他们共同制订发动龙州起义和起义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前委原要求龙州于12月11日与百色一起同时举行武装起义，因龙州发生蒙志仁叛乱，而决定推迟起义日期。小平同志部署好工作后，便从龙州经越南、香港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吸取蒙志仁叛变的教训和借鉴右江地区改造警备第四大队经验，加紧整顿改造部队工作。当时，第五大队的编制不健全，原来6个营只存下第一营和新编第五、六营的一部分。他们便以第一营为基础，加上新编进来的部分农民赤卫队和边防巡缉队，合编为1

个旅，番号改为“讨蒋南路军第一军第二旅”，李明瑞为总指挥，俞作豫为旅长。下设2个团6个营。原第一、二路游击支队的番号和组织不变。党组织先后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部队和游击支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左江军委（后改为中共红八军军委），先后由徐开先、宛旦平、何世昌负责。

在改编部队的同时，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改造工作，开展革命的宣传教育和民主运动，成立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揭发和批判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对个别坚持反动立场和军阀作风的旧军官（如第一团团团长何凤川），则采取挖基倒墙、赶虎出山的办法，礼送出境。这对纯洁组织内部、团结教育广大官兵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干部力量薄弱，对部队的整顿工作仍不彻底。

为了加强对左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王逸（龙州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林礼（后牺牲）等同志到龙州负责党的组织工作，12月15日建立中共龙州县委会；由王逸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发展了几批新党员，党员人数由7人增至34人。接着，派党员到凭祥、崇善、养利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

1930年2月1日，威震中外的龙州武装起义胜利举行。它与百色起义相呼应，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南疆边陲各族人民。

当天，龙州古城，张灯结彩，红旗飘扬，10000多军民在新填地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庄严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政委

邓小平(兼)，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参谋长宛旦平，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逸。同时宣布李明瑞同志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八军以原警备第五大队（后改为讨蒋南路第一军第二旅）为基础扩编而成，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俞作豫分别担任或兼任第一、二纵队长。全军共3000多人。

当天晚上，红八军党委和龙州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中共龙州县委改为中共广西左江特委，由王逸担任书记，加强党对地方的领导。

随着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龙州、凭祥、上金、养利、崇善、龙茗等县革命委员会也在2月中旬前相继成立。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均有少数民族的干部担任委员。如左江革命委员会中，便有何建南、杨春秀、周和平、张兆梅、张明珠(女)、陈振华(女)等壮族干部担任委员，发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

红八军成立后，向各族群众公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主要内容是：“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工农兵联合行动，以阶级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苏维埃政府，建立乡村苏维埃，彻底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村苏维埃处理，发给土地使用证，分配土地给农民”。此外，还颁布了劳动法22条、土地法26条。这些政纲和法令体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和“六大”精神，指导和推动了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2月7日，邓小平从中央回到龙州。他在龙州召开了红八军军委和左江特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分析龙州形势，制订龙州起义后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邓小平离开龙州后由何世昌代理），并决定由涂镜吾接替王逸担任特委书记，以加强党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在此同时，邓小平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指示和敌我力量情况，立即电令红七军、红八军停止进攻南宁（电令发出时，红七军已在隆安失利），指示红八军迅速向右江革命根据地靠拢。由于龙州起义严重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在左江地区的势力，故法帝国主义者对龙州起义极端仇视，又是造谣、诬蔑，又是多次发出照会，甚至派出飞机入侵左江地区，利用领事馆和天主教堂，明目张胆窝藏龙州反动地主豪绅的大批武器和金银财物，干涉中国内政。这更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无比愤慨。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2月19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了有10000多军民参加的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大会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告民众书郑重地提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四项正义声明，并用英、法两种文字电告全世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没收了洋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天主教堂内的豪绅地主财产，驱逐了七八个违法的帝国主义分子出境。崇善、凭祥等县也采取了行动，与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直接斗争。当时，党中央高

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左江军民的反帝斗争，1930年2月12日发出92号“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声援广西的反帝斗争。3月22日，中共中央出版的刊物《红旗》，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红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号召“全中国的革命群众，起来援助龙州的苏维埃，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国民党军阀”。这给左江地区各族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红八军在开展反帝斗争的同时，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立即派出主力部队，分赴各地游击、剿匪，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第一纵队先后到崇善、雷平、靖西等县游击，在雷平太平镇，发动群众清算当地土皇帝李昭和李德普的罪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并根据群众要求，枪毙了李德普，为群众伸冤除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第二纵队到凭祥、宁明、明江等县游击，攻下了土匪占据的宁明县城，枪毙了勾结土匪的明江县反动县长。俞作豫亲自率领一营红军到上金、龙州下冻剿匪，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为了培训军政干部，红八军在龙州县城开办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军事政治训练学校”。俞作豫任校长，宛旦平任教育长，甘湛泽任总队长。甘湛泽带领该校100多名学员到下冻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工作。当时，正值春耕季节，为了不误春耕生产，学员们一面配合农协会干部丈量、登记土地，一面组织群众实行共耕。在他们的宣传

发动下，下冻区的河渡、坡目、农招、那造、那城等村都相继实行了土地共耕。后因敌人进犯，土地革命未普遍开展。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2月上旬，龙州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50多人。邓小平参加了大会，并给大会作政治报告，号召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资方的斗争，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龙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赶回右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便于2月下旬离开龙州。途经雷平县城宝圩时，帮助正在那里休整的第一纵队组建党委会，并率该纵队攻打盘踞在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以便打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通道。邓小平在攻城战斗开始后前往右江地区。当第一纵队经过7天激战，正准备竹梯爬城歼敌时，纵队部与龙州军部的电话联系突然中断，估计龙州出了问题，便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挥师回援龙州。

原来，新桂系军阀得悉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游击，龙州城防薄弱，便趁机命令其驻南宁的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玘率4个团兵力，并勾结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多人，分两路沿邕龙公路和左江北岸向龙州进犯。3月20日，龙州新填地广场上正举行追悼革命烈士何建南的群众大会。红八军对敌人的偷袭行动事前毫无察觉，当敌人直逼龙州城下、枪声大作时，才仓促应战。红八军驻守龙州只有军部卫士队、二纵队一个半营，加上农军、赤卫队，不足2000人。战斗发生后，俞作豫军长率领卫士队巡视各个阵地指挥抗敌。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一纵队未能赶到，我军浴血奋战一天，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龙州终于失守。

俞作豫率领军部和第二纵队突围撤出龙州，转战凭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绥渌、扶南、邕宁、钦县（现钦州市）等地。到达钦县县属的南间圩时，俞作豫迫于形势，决定自己率30多名党员政工干部离开部队，把军权交给刘定西，部队由刘定西指挥。后刘定西带着留下的几百名官兵，接受了军阀的改编。俞作豫辗转钦县、邕宁后赴香港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时，在香港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被敌诱捕，同年9月6日在广州壮烈牺牲。

红八军第一纵队从靖西赶到雷平，便接到龙州失陷的消息。这时，敌人已把主要力量指向第一纵队。在四面受敌的严重情况下，纵队党委决定按邓小平的指示，转移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但当时与红七军尚未取得联系，情况不明，不能从正面冲过去，便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攻击，从雷平绕道沿中越、桂滇边境北上前进。路经靖西的岳圩、云南富宁县的田蓬、板仓、剥隘、田林县的利周、凌云县的彩架、贵州省望谟县的蔗香圩、凌云县的讲肥村等地，前后苦战行程约7000里，历时半年，终于在1930年10月下旬，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与前来迎接的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胜利会师。之后到河池县编入红七军，成为红七军的一支劲旅。

四、红七军主力北上与右江革命根据地 军民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等人

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久，李立三等人又作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先后命令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一军、红十军、红七军分别去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幻想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同年9月底，红七军前委正拟向外游击发展，这时，中央派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的平马镇，于10月2日，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要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命令。同时，邓岗还传达中央对右江工作的批评，说右江的土地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显然，这个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当时“左”倾错误思想的反映。

红七军前委成员听了邓岗传达后，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邓小平和张云逸等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以红七军现有几千人的力量，去执行那样大的任务是困难的。邓岗、陈豪人、龚鹤村则坚决主张执行中央的命令。为避免内部分裂，前委会议终于接受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计划，决定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并准备在河池召开全军党代会，贯彻中央指示精神。

会后，邓小平和邓岗于10月6日从平马出发，不久在恩隆县北部的燕峒召集百色、奉议、恩隆、恩阳、思林、果德等县、区负责干部70多人的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和平马前委会议精神。指出红七军主力离开后，根据地斗争的

艰苦性、复杂性，要求各地要抓紧整顿党组织，纯洁内部；整顿、扩大赤卫军，迅速建立县、区常备武装部队，并加强军事训练；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坚定革命到底的胜利信心；组织群众抢收农作物，收藏好粮食，防备敌人进犯。邓小平和邓岗将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工作部署以后，便前往东兰县，与韦拔群同志一起，率领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11月初，红七军4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分别集结于河池。途中各纵队抓紧进行党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各级党组织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行动方针；选举出席全军党代会的代表，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大会主要议事日程是：一、中央代表邓岗作政治报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二、红七军前委作过去工作报告；三、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四、选举前委（邓斌、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李朝纲、黄一平为前委委员，龚鹤村、胡鹤林、杨英为候补委员）。大会决定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中央交给的任务。这次党代会，为部队整编、远征打下了思想基础，对加强部队党组织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因接受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又给红七军的前途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二天，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师团制。主要领导人是：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前委书记兼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

下设三个师：以第一、三纵队合编为第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小平（兼），下设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以二、四纵队和红八军余部合编为第二十师，师长李谦，政委陈豪人（兼），副师长黄治峰，下设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第二十一师（待新组建）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黄松坚）。全军共7000多人（不含二十一师）。前委决定：第十九、二十师出发执行中央任务，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

部队整编、检阅后，韦拔群率几十名老弱战士返回东兰，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十九、二十师于11月9日从河池出发，踏上艰苦的征途。出征后，因庆远守敌有防备，绕道渡过龙江在罗城四把又遭顽敌阻击，激战后撤往三防。在三防稍事休整后，指挥部决定放弃攻打柳州计划，拟经融县（今融安县）过融江攻打桂林。12月5日，红七军攻打融县长安镇，没有攻下，撤往桂黔边的三江县富禄镇，得悉柳州、庆远的敌人已移师桂林布防，便转向湖南的通道、绥宁进发。这时，已是雪花纷飞的寒冬，广大指战员穿着单衣、草鞋，忍饿挨冻，翻山越岭。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攻打湖南武冈县城，未克，即向广西全州撤退。1931年1月初，前委在全州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的命令是否行得通和部队去向问题。会议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的努力下，通过总结离开根据地以来艰苦转战的教训，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拟将部队开往湘粤边，到江西汇合中央红军。会后，邓岗和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

李明瑞、张云逸便率队向湖南江华进发，发现湘军已在宁远、蓝山一带布防截击，便离开江华，在敌人夹缝中大踏步前进。在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广西桂岭圩休整，把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后，挺进广东的连县、乳源县（今乐昌县）。拟在乳源县一带建立根据地。但红七军到达乳源县梅花村第二天，遭敌3个团围攻，被迫与敌人血战5小时后退出战斗，此战伤亡很大，遂决定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1931年2月5日，红七军在粤北的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被敌截为两部：邓小平与李明瑞等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渡过河后，向江西崇义前进，在崇义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和武装，进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张云逸率领未能过河的其余部队，转到坪石以北渡过武水，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与湘赣独立师三团会合。1931年4月，李明瑞和张云逸分别率领的红七军两部分部队在江西永新县重新会合。旋即与红二十师、独立一师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先后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几个大胜仗，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7月，红七军到达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在这漫长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后行程近7000里，历经桂、湘、粤、赣四省，时间10个月。英勇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编入红三军团序列。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不久，适值滇军在南宁败退，桂系军阀在追击沿右江溃退的滇军时，乘机侵

占了右江沿岸的果德、思林、恩隆、恩阳、奉议、百色等县县城，并准备把其反革命锋芒指向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东兰、凤山两县。

韦拔群从河池到东兰后，立即在武篆向陈洪涛、黄明春等同志传达河池党代会和部队整编精神，商量组建二十一师和坚持根据地革命斗争问题，决定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二十一师来。并对各团的组建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韦拔群和黄明春在东兰组建了六十一团；黄明春到凤山组建了六十三团；陈洪涛到恩隆、奉议组建了六十二团；黄书祥到果德组建了独立团。在上述各团组建成的同时，各县又新建赤卫军常备营，区、乡建立赤卫队。1930年冬，韦拔群等在恩隆县七里区乙圩（今属巴马县羌圩）举行廿一师成立庆祝大会。到会各族军民5000多人，韦拔群和陈洪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保卫革命根据地，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

会后，新组建成的二十一师，立即投入保卫、巩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韦拔群抓住敌人未进犯的时机，一方面指挥部队扫荡各地残余反动武装，巩固内部；另一方面，举办军政训练班、地雷训练班等，培训各种军事政治技术干部，准备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在此同时，各县党政机关和赤卫军转移到山区农村活动。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迁到恩隆县七里山区的那拔村（现属巴马县那桃乡）办公。

（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初，粤桂军阀混战暂时停火，滇军也已退出广西，新桂系军阀在广西的统治暂趋稳定。为了解决其“内患”，镇压革命，便趁红七军主力远征后右江革命根据地力量空虚之机，于1931年2月，调派廖磊（先任第七军十九师师长，后任第七军副军长、军长）指挥10000兵力，分三路从东、西、北面大举进犯东兰、凤山根据地：敌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三十六两团从田州经七里山区，向东兰进攻；由百色民团指挥官岑建英指挥在凌云被桂军收编的黔军王海平两个团和当地民团从凌云向凤山进攻；由庆远区“剿匪司令”石化龙率领其所属各县民团2000多人从河池向东兰集结，以封锁红水河东岸，切断红军退路。廖磊则亲率军部特务营1个连和第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2个营等从百色直到东兰县城坐镇，居中指挥。敌人摆下大包围圈的阵势，采取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并命令东兰、凤山、凌云等县民团给予配合，妄图在东兰、凤山消灭我军，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中共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的领导成员决定动员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锋芒，运用“敌少我打，敌多我盘旋打圈子”的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抗击进犯敌人。并根据各路进犯敌人的兵力强弱，作了部署。韦拔群和陈洪涛等即率领师部工作人员和特务营，将师部、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峰峦重迭、地势险要的东兰与凤山边界的西山，以此为基地，指挥各地反“围剿”斗争。

韦拔群在东兰武篆召开各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会议，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配合红军打击敌人，坚持革命斗争到底，并制订了惩处动摇、变节分子的十二条法令。

3月中下旬，敌人攻占东兰县城。3月23日，召开军事会议，制订“分途搜剿”的计划，确定以西山、中山和东山为“搜剿”重点。接着，廖磊带指挥所在武篆，指挥3个正规团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中心的西山、中山和东山进犯。敌人所到之处，兽性大发，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洞就搜，见水就放毒，见农作物就放马踏毁。原来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在敌人的残暴践踏蹂躏之下，变得满目疮痍，残破不堪。

韦拔群和陈洪涛获悉敌人重点“搜剿”“三山”的消息后，便在西山弄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动员各族军民，坚壁清野；内线坚守、扰敌，外线游击，歼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一方面抓紧进行春耕生产，一面做好坚壁清野和转移群众工作，使敌人每到一处，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要菜无菜，而迎接敌人的是使敌人胆颤心惊的土地雷和一张张《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工农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仅被地雷炸死、炸伤的官兵不下千余人。而红军神出鬼没，侦探准确、耳聪目明。敌人在西山不仅到处扑空，而且时常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4月初，石化龙指挥民团1000多人进犯东兰县都邑区

板升乡。韦拔群决定消灭这股兵力较弱的敌人，便由韦汉超率领六十三团第三营和地方赤卫队，先用少量兵力把敌人诱到该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弄肖屯，然后集中兵力把敌人包围起来。经过18个昼夜的围攻，消灭敌人200多人，石化龙负伤后率残部退回河池。

在此同时，驻守凤山的我六十三团红军在隆山寨猛烈打击黔军王海平部后，又利用黔军与桂军的矛盾，展开政治攻势，运用离间计，使黔军两个团哗变。当黔军与桂军互相撕打时，我军乘机袭击黔军和攻占凤山县城，黔军只剩下二三百人，狼狈逃回贵州，解除了北面敌人的包围。

战斗在右江沿岸的红六十二团和独立团，与广大各族群众一起，也英勇袭击进犯敌人。1931年2月，敌人疯狂进犯东兰、凤山。滕国栋率领六十二团，在七里山区配合六十一团牵制和阻击了两个团的敌军。4月，六十二团又击退了恩隆县民团几百人的进攻。7月，黄书祥指挥独立团和向都县赤卫军1000多人，攻占了向都县城。赶走了反动县长，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青年和群众。当时南宁的报纸，曾惊叹右江沿岸的田州、平马、思林、果德、向都城镇，“均已陷入于严重的状态中”。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东兰、凤山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5月，因军阀战争继起，新桂系军阀为了向外发展，命令廖磊率队撤出东兰、凤山。至此，敌人对东兰、凤山的第一次“围剿”宣告破产。

廖磊撤离前，在东兰县组织了“东风剿匪司令部”，委东兰县长黄汉杰兼司令。并留下敌第七军六十一团（罗活

为团长)和新派来的韩彩凤师的余剑鸣团在东兰、凤山驻防,把对根据地的“围剿”策略暂改为“围困”策略。

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来到右江地区,传达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整编红军和地方政权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指示,中共右江特委在兰泗区泗孟乡丘板屯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把红七军二十一师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师领导成员和下属3个团的番号不改变;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担任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也改为县革命委员会。同时,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决定抓紧时间整顿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游击,粉碎敌人的围困阴谋。

会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明春和陈道生率师部直属队和六十一团(团长、政治指导员分别由韦拔群和黄明春兼)800多名战士从西山经中山到东山的苏托、苏邦、麻品峒一带进行整训。六十二团(后独立团并入该团)团长滕国栋、指导员黄书祥和六十三团团团长韦国英、指导员兰志仁等也率该部队回原地整训。通过整训,传达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9月底,韦拔群率领六十一团经东山弄沙峒东渡红水河,向都安、河池边区游击。先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在那里进行短时间休整和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后,又接着攻打都安县九顿圩

(现大兴)蒙元彩团局，缴获一批枪枝、弹药和其他物资。韩彩凤和石化龙闻讯派重兵赶来围攻，妄图把我军赶到红河东岸，逼我背水作战，以便一举歼灭。但韦拔群已率部队作紧急撤退，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然后趁东兰县城守敌空虚，又率部队和赤卫军突然袭击东兰县城。给守敌骚扰后，即撤离城郊，迅速渡过红水河，捣毁了荫圩、凤凰团局，回师西山。红军这些军事行动，虽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敌人的围困和封锁，但打乱了敌人的围困部署，补充了红军的部份给养，进一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二)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同年11月，新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调集敌第四军3个团、第七军1个团加特务营和各县民团共7000多人，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进攻重点，仍是西山和中山、东山。敌人的军事部署是：第七军的罗活团在河池、南丹、凤山、东兰等县民团的配合下，进攻东兰县红水河以东地区；敌第四军的余剑鸣团进攻凤山县；沈玖成团与余剑鸣团相配合，重点对西山进行“搜剿”；韩彩凤团封锁西山、中山、东山与外面的联系；罗活团还派1个营配合河池、南丹、凤山等县民团进攻那地、巴暮地区。我红军仍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利用西山的有利地形，时而据险伏击，时而主动出击，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敌人在西山仍找不到我红军的主力，屡屡扑空，不能“奏功”。

同年12月底，进犯的敌军有两个团被调离东兰、凤山，但根据地仍遭受围困，加上敌人长期来对革命根据地的“搜

剿”、摧残，我军的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减员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艰苦。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1月，中共右江特委会和中共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西山弄索召开特别常委会，决定缩编红军队伍，化整为零；取消团、营、连编制，把枪枝集中埋藏起来，把骨干分子组成10个杀奸团，每团30人左右。这些精悍的杀奸团和独立营，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4月，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三师党委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保存党的干部力量，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抽调黄明春、黄举平、黄大权等30多位干部，分两路到外线的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去开辟游击新区。会后，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率15名干部到达黔桂边，会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韦国英等，先后建立了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领导南丹、凌云和贵州省罗甸一带人民的斗争。黄明春和黄大权率领20多位干部到达右江下游后，会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原六十二团领导人滕国栋和黄书祥等，先后建立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后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和右江下游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右江下游军民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1934年，黄明春又带领精干的红军小分队，挺进滇桂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扩建了1支有1000多人枪的武装部队，开辟了云南省富宁县七村九弄的游击据点。

此外，还派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带领一批干部到都安

一带活动，打通都安与右江下游的交通线。这些外线游击据点，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敌人对西山的压力。

同年6月1日，中共右江特委发出《为时局告群众书》，指出“右江革命虽暂时受挫折了，但是全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还是向前发展。”号召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坚决奋斗到底！”

在这段时间里，右江下游的黄书祥与陈鼓涛（中共向都县委书记，后牺牲）等，率领红军和农民赤卫军在平治、果德、那马和向都一带与敌周旋，伺机打击敌人。

（三）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8月，蒋桂军阀矛盾暂处缓和，新桂系军阀决心彻底消除其心腹之患，便又增派近10000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反革命“围剿”。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了专门军政会议，制订“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敌人采取“缩网收鱼”的狠毒策略，步步为营，节节搜索前进。同时，为了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敌人除了继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铲光，掳光的“血洗政策”外，还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群众分别到各个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但是，与红军血肉相连的各族群众，为了支援红军，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给山洞里的红军送粮、送盐、送情报。正是有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才能这样一天天坚持下来。

廖磊在派七路重兵“搜剿”西山的同时，还派罗活指挥

1个正规团和凌云、东兰、凤山、河池等县民团5000多人，气势汹汹地进犯巴暮地区。当时，我坚守巴暮的红军和赤卫队只有400多人，他们分5个防线，英勇抗击十倍于我、装备精良的敌人。但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各防地的联系先后被切断。退守在甘孟山上的80多名红军战士，经过与敌人三昼夜的激烈战斗，只剩下十几人。他们宁死不屈，子弹和石头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抱着敌人一起跳下悬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英雄赞歌。

巴暮根据地丧失后不久，白崇禧亲自从百色赶到东兰，密商围捕韦拔群、陈洪涛的毒辣计策和组织“东风善后委员会”等事宜。韦拔群和陈洪涛深感形势的严重和危急。他们正研究准备暂时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时，不幸，韦拔群于10月19日被叛徒杀害。韦拔群牺牲后不久，陈洪涛也不幸被捕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书记黄明春（后又担任中共滇黔桂边委书记）和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后又担任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主席）等同志，继续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任务，先后建立了东兰中心县委、田向中心县委和那马中心县委等组织，不断恢复发展革命力量。英雄的右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坚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直至广西全境解放。

在左江地区，由于红八军撤离该地区，左江革命根据地已宣告丧失。各地党组织和工会、农会组织遭受严重破

坏，无数革命群众遭受敌人惨杀，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广大各族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并没有屈服，留下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赤卫队员，转移到山上或中越边境，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反抗敌人的疯狂“围剿”。龙州县下冻区的中共左江特委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谢玉芳（又名谢匡，后叛变）、周和平（后牺牲），便把当地农民赤卫军集合起来，并联合上金县原受过红八军收编的黄立忠部队，组成“左江游击队”，这支拥有200多人枪的农民游击武装，以中越边境的科甲、陇罕、武德、陇海的深山密林为据点，活跃在龙州县西部与上金县南部交界的山区，坚持与敌人斗争达半年之久。

原红八军游击大队长唐光天，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继续率领500多名农民武装队伍，在十万大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至1936年。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播到少数民族聚居的祖国南疆，策应和配合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其伟大意义，正如1930年3月2日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所指出的：它“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各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但他在全国政治同样有极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

（陈欣德执笔）

绥远和平解放和起义部队的改造

高 克 林

大 势 所 趋

1948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共歼敌军150余万。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的解放事业迅猛地向前发展。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完全陷于孤立的绝境。

绥远位于现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1949年初，绥远有人口202万，耕地面积1938万亩。我绥远的人民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个骑兵师，2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团，约30000多人。已解放了集宁、凉城、兴和、陶林、丰镇等10个县、4个旗。解放区的人口达80万，耕地761万亩。国民党绥远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是绥远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到绥远军政最高统帅，均是傅作义一手提拔。他对傅作义言听计从，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卖国求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有不满，对共产党的统

一战线极表关注。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何去何从，董其武正在徘徊犹豫。1月21日晚，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对傅作义选择弃暗投明的道路表示同情，但对“绥远该如何办”却忧心忡忡。他第二天上午乘专机向傅作义请示。傅作义与他畅谈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绥远今后的打算，使他逐渐明确和坚定了走人民道路的决心。

和平解放绥远，是绥远人心之所向。当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归绥时，国民党上层人士张钦、于存灏以及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人发起了“绥远和平促进会”。积极赞助绥远和平解放。傅作义关于政治立场声明的通电发出后，绥远各界中，上层人士举行了座谈会。大部分人认定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和平解放绥远势在必行。

绥远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基地。根据1949年底原绥远指挥所统计，绥远国民党军队共86000人。这支军队组织庞杂，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傅作义、董其武的基本部队约30000人。其中独立第七师装备良好，战斗力较强。这些部队主要将领都一直追随傅作义和董其武，是支持和拥护走人民道路的主要支柱。二是原属西北邓宝珊部队二十军的2个师，约10000人。由于邓宝珊起义的影响和授意，这支部队也积极支持绥远起义。三是地方杂牌部队，约20000人。他们有的原是坐山为王的土匪；有的是日本的皇协军；还有地方还乡团。这些部队“兵匪不分”，是起义的阻力。四是孙兰峰的十一兵团（由张家口溃逃的残部）、刘万春一一军一部、鄂友山的骑兵团等约10000人，对和平解放绥

远持反对态度。

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提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关注。

艰难的和谈

1949年元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我绥蒙军区“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进攻”，发出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信号。元月31日，我前线部队停止进攻。2月1日，又命令我部队由旗下营后撤60里，并要停止对董部瓦解工作，停止报纸广播对董部的攻击，改称董部为友军。同一时间，傅作义亦派人到归绥传达他关于停战的意见。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李井泉在卓资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在干部和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我们也经过了一个由不甚理解到理解的过程。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采取“绥远方式”，许多干部和战士思想转不过弯。长期以来，绥远

人民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涂炭；在同反动军队对垒厮杀中，我们的战士流血牺牲。他们复仇的思想十分强烈。特别是我部队主动后撤，把浴血奋战夺来的阵地又让给了对方。一些长期埋伏在傅、董部队内部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在即将组织哗变的时候受到了制止。为了保证起义的完整性，要他们放弃“功亏一篑”的工作，不能没有巨大的思想阻力。为此，我们区党委向全党、全军和全区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克服了各种阻力，使“绥远方式”得以顺利实施。

为了保证“绥远方式”的顺利实施，我们一方面把前半年扩军任务从15000人减少到6000人，停止武装进攻，并使我们工作重点转移到剿匪减租、发展生产上。这样，减少了对傅作义的压力，造成和谈气氛。另一方面，我们仍不放松战斗准备，揭露顽固派“借水养鱼”伺机反扑的反动阴谋，打消他们东山再起的幻想，促使他们走光明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代表就提出和平解放绥远的要求，傅作义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但双方都有和平的愿望，一直保持着接触。由于蒋介石频繁的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绥远方式”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毛主席找傅作义谈了7次话，其中1次谈了一天一夜。傅作义曾经问毛主席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说：“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路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

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以看看你的旧部队。对董其武的经济困难，你去了也可替他解决解决。”毛主席为绥远国民党的官兵指明了一条光明道路，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处理傅作义提出的具体问题。耐心而诚恳的开导，使傅作义同意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方式。在傅作义的周旋下，董其武也走上了光明的道路。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次谈判。我方代表是李井泉（晋绥军区政委）和潘纪文（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傅方代表是周北峰（原绥远厅长）和阎又文（原《奋斗日报》社总编）。在谈判开始，傅方拿不出停战分界方案，我方求之过急。故谈判进展甚微。针对我们这种思想，周副主席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要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又要积极工作。否则，就不成其‘绥远方式’了。”

4月26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的情况下，双方又开始了谈判。这时，李井泉已经离京。我方又派张友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哲仁（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参加谈判。在谈判中，傅方提出每月要发23万元大洋的军费，还要在天津开设贸易机构。为划分临时分界线、伪金元券兑换等问题，双方争执几天也未达成协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知悉谈判又陷于僵局时，即令我方代表答应傅方一切条件，马上达成协议。5月28日，双方派代表在《绥远和平协议》书上签了字。

《绥远和平协议》的要点是：划定双方分界线，停止敌

对活动，剿除土匪，保护群众利益；平绥铁路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其武将军所属军政公用运输予以特殊照顾；双方互设贸易机构，互相依法进行自由贸易；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方区域得以自由流通；我方在归绥设立联络处，董方得保证安全；解放区书报在董方自由流通；董方停止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令其离绥。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主席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在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联络处进驻归绥

为了适应绥远和平解放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从1949年4月1日起，把绥蒙区划归华北局管辖。1949年6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绥蒙区改为绥远省。原绥蒙区党委改为绥远省委，原绥蒙人民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蒙军区和野战军第八军合编为绥远省军区。我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苏谦益任省委副书记，杨植林任省政府主席，奎璧任副主席，姚喆任军区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省委和省政府设

在丰镇，省军区移驻集宁。三套组织积极工作，准备绥远的和平解放。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组成驻归绥联络处。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何树声、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20余人。潘纪文同志任联络处长。鲁志浩同志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工作组，郎觉民任组长；银行工作组，张光任组长。联络组的任务是：协助董其武贯彻执行“协议”，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进步人士，团结广大群众，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蒋介石、阎锡山的特务，尽快实现和平解放。

6月底，我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率部分人员先期到达归绥。驻归绥的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以“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对联络处人员生命没有保证”为由，百般刁难，拒绝我联络处进驻归绥。7月10日，何树声在傅作义派员陪同下到归绥同董其武商谈。刘万春又提出，“绥东来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他保管，“并不许随便上街”。最后，董其武答应了刘万春关于我联络处工作人员“少在归绥城活动”的条件。联络处遂于7月20日进驻归绥。联络处驻在新城西落凤街6号，银行工作组设在省银行，铁路工作组设在市火车站。当我们的干部出现在街头时，人们奔走相告，传信报喜。国民党反动派恐惶万状，顿生杀机。8月上旬一天，我铁路工作组的几个同志从旧城回火车站时，遭到一一一军某部六连20余名士兵的突然袭击，打死了工作组秘书王士鑫。事件发生后，归绥城顿处紧张的气氛之中。我

联络处同志义愤填膺。董其武焦虑不安，亲赴联络处慰问，表示要严追杀人凶手。消息传到我绥东解放区后，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抬尸游行，撤回联络处，消灭反动派。归绥和绥东顿时出现剑拔弩张之势，和平的天空又出现了阴云。

党中央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毛主席一方面给傅作义做工作，另一方面给我们做工作。毛主席对傅作义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其武先生多加注意。”同时，毛主席又召见我和杨植林、潘纪文。薄一波用车把我们送到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又询问了各自的情况。毛主席说：我们和傅作义打了多年仗。尽管我们处于胜利态势，但采取“绥远方式”对人民有利。只要我们宽大为怀，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绥远方式”就一定能实现。毛主席还说：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管理绥远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傅作义当主席，你当副的。因为他们人多。毛主席笑着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不是为当官。我过去连当乡长都没想过。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当副职也能作主，绥远还是你要负责的。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联络处不撤出归绥，继续促使绥远局势好转；给王士鑫烈士召开追悼会，但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街；“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到中午吃饭时，毛主席留我们三人吃了饭。

我们在解放区广泛宣传毛主席的指示，用党中央的思

想统一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我驻归绥联络处邀请国民党绥远政府厅局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一步表明中央坚持和平解放绥远的一贯立场，解除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很快稳定了形势。此后，联络处的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召开座谈会，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董其武也主动到联络处商谈工作。这样，绥远和平解放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九 一 九”起 义

“绥远方式”确定以后，在我党积极影响和促进下，董其武进行一系列进步改革，为和平解放绥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创办革新学院，教育干部转变思想；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刷洗顽固势力；改进报纸宣传，制造和平舆论等。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千方百计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华北特务头子张庆恩网罗从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逃到绥远的特务和顽固分子，组织所谓“绥远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建立中心据点，大搞破坏活动。他们砸毁《奋斗日报》社，在包头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狂呼乱喊：“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7月份。张庆恩、潘秀仁在包头召集十一兵团司令、一一一军军长和师长鄂友三3人秘密开会，策划武装冲突，煽动部队西逃。董其武立即命令独立第七师由归绥调至包头以西准备阻击。同时，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到绥远封

官许愿，金钱收买，分裂部队，以达到破坏绥远起义的目的。随后，蒋介石又送去1900两黄金，并晋升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委任原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晋升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妄图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架空董其武。董其武识破了阴谋诡计，不仅没有交出兵权，还派可靠人员加强了对第九兵团的控制。

为了加速起义进程，党中央派傅作义和邓宝珊亲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8月28日，潘纪文陪同傅作义一行乘专列从北平出发。火车到丰镇时，我们驻丰镇的绥远省委负责同志到车站迎送傅作义一行，我们又派鲁志浩陪送傅作义一行到归绥。车至集宁，我绥远军区姚喆等领导同志登车会见傅作义。到归绥后，傅作义检阅了部队，发放了慰问金，分别传见了军政干部和各界代表。9月10日，董其武随傅作义到包头市。在这里，他又分别向军、师、旅级干部讲形势，指方向，阐明共产党“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政策，解除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又乘飞机来到包头，企图把傅作义接到广州。傅作义义正词严予以拒绝，使蒋介石破坏和平解放的阴谋最后破产。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通电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绥远国民党8万官兵走向光明，绥远国民党占领区的120万人民获得了新生。9月20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绥远起义的官兵发了复电。电文写道：“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

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与此同时，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也发了复电，勉励起义官兵“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各党派、地区、民族、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等45个单位的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华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两人。我作为华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

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之后，我留北京又参加了华北局常委扩大会。这次会中心是研究绥远问题。10月25日，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绥远省政府领导人选基本确定。

绥远军政委员会怎样开展工作？我们和绥远旧政权人员怎样合作？怎样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这些极为复杂和特殊的问题，都摆在我们省委面前。

10月26日晚10时半，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了我们。我和姚喆、裴周玉乘车来到中南海。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首先接见了我们。半小时后，薄一波、聂荣臻也相继来了。周总理把我们5人带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和我们亲切握手，交谈绥远情况。过了一会儿，傅作义也到了。毛主席握着傅作义的手，指着我们3个人说：“这是绥远的3个同志，过去都同你打过仗。你见过他们吗？”傅作义和我们3人都笑着回答说：“见过了。”随后，毛主席说：“过去互相打仗是敌人，现在成了姑表亲家。我找你们见见面，大家共同谈谈。”接着，毛主席对绥远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具体的指示。他说：绥远问题已谈了多半年。他们9月19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们也发了回电。现在算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合作问题。你们回去开个干部会，使同志们了解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合作的好处。先做思想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按傅先生提出的4个原则（坚持团结；肃清特务；整顿纪律；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3个步骤（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恢复交通，包括通商、通邮和人民的来往；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工作）办，做出大成绩给全国人民看。毛主席就合作中的工作方法也进行了强调。他说，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要告诉同志们，一年办到算好，没有战争不能快。急了会出问题。部队参加生产可以改造人的思想，改变官兵关系。师以下暂不派政治工作人员。派去的同志要研究新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要下细雨，不能下大雨。要

考虑人家能接受的程度，不要强迫命令。只要做好事，不做坏事，人家就会欢迎。要团结他们，不要把人挤得没处去，没饭吃。不要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的政协会开的好，各方面都满意。主要原因是小心谨慎，协商办事，各方有利。绥远有两个方面，注意处理好关系。打破关门主义，不能有见外心理。凡愿意和有可能争取进步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同他们很好合作。对那些坚决反对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以争取团结多数。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和平改造的方式一定能成功，但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甚至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先把傅作义送出二门，把我们送到办公室外。

毛主席的耐心开导和教诲，使我们明确了绥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增强了建设新绥远的信心和力量。10月29日，省委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我传达了全国政协会议和华北局会议精神，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绥远工作的重要指示，决心使党的路线成为群众的行动。

建立新政权

“九一九”起义后，在以董其武为首进步势力推动下，绥远旧政府也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造。如宣布解散国民党省、县党部及一切反动组织；报纸全部转载新华社的消息与文章。支持群众的各种革命活动；原国民党地方政府已换上人民政府的牌子，原国民党军队也改换为解放军的番号和

军徽。但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止，绥远省委仍未进驻归绥。在特务的煽动和破坏下，再加新旧交替引起的必然动荡，归绥城仍处于一定的混乱之中。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姚喆、潘纪文、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奎璧、杨叶澎、刘万春等16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为副主席，苏谦益、张如岗、李维中等22人为委员。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12月17日，归绥市广大市民、部队、机关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搞卫生，张贴彩色标语，迎接绥远省委和省军区的同志。下午2时，我和苏谦益、姚喆、杨植霖、奎璧带领党政军和群众团体1000多名干部抵达归绥。董其武、孙兰峰率领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近万人到火车站迎接。我们检阅了欢迎部队。随后，在车站广场举行了欢迎大会。董其武致欢迎词后，我讲了话，对他们盛情欢迎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为建设新绥远共同奋斗。

进归绥后，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建立友谊。第二天，我和杨植霖、姚喆等同志拜会了在绥远起义中作了重要贡献的董其武、孙兰

峰、张钦、荣祥等先生和地方知名人士，第三天，我们又邀请70多位知名人士在联谊社举行茶话会。我和姚喆、杨植霖等讲了话。董其武、孙兰峰等10多位先生也相继发言，畅谈思想收获，表示革命决心。茶话会充满团结和愉快的气氛。第四天，我军区又专门组织各部门负责同志走访了原国民党“剿总”驻绥远指挥部、绥远保安司令部、三十二兵站等机关。董其武、孙兰峰等先生也对我方人员进行了回访和看望。

12月21日，傅作义从北京来到归绥。24日，我和傅作义协商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事项。傅作义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大半。干部问题要靠你。共产党决定的我们执行。”我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以你为首，这是毛主席封的。你要事先决策，发号施令。我们保证执行。”在干部问题上，我们基本采取不升不降的原则，分别合并了军政办公机关，妥善安排了3200多名起义干部，使双方都比较满意。12月27日下午1时，绥远军政委员会在归绥市麻花板举行成立大会。傅作义、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和全体委员、省人民政府、省军区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共127人参加了大会。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也列席了会议。傅作义首先宣布中央任命的绥远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我们十多人先后讲了话。我讲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四项任务和一个目的：“一是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法令，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决定绥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具体政策，并适时检查工作执行情况，总结工作经验；二是负责对旧部队的整编和训练，逐步确立人民解放军的

各种制度；三是采取坚决团结与耐心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绥远旧军政人员学习进步，使其安心为人民服务；四是指挥绥远境内部队，肃清匪特，巩固革命秩序。一个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人民的新绥远。”

12月31日，绥远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省人民政府把归绥和包头定为省辖市，并把归绥定为省会。为了使绥远真正实现“解放区化”。省政府制定了八项施政方针：“（一）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二）建立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实行二五减租，并准备土地改革；（四）组织并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并使之成为各项建设有力的可靠支柱；（五）经济建设遵照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六）整理财政税收，增加收入，精简节约，以达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目的；（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八）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政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防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巩固蒙、汉、回各族团结。实行民族自治，发展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同时，省政府还废除了保甲制，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

1950年的元旦，是绥远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归绥市4万多部队和群众隆重庆祝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省政府和绥远军区的成立。我和傅作义等都致了贺词。大会号召绥远各族军民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会后，军区

文工团、各机关、学校、玉厂的秧歌队走上街头，载歌载舞。人们跳呀，唱呀，笑呀，共同庆祝绥远的新生。

合 并 整 编

绥远和平解放以后，我以主要精力搞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

为了实现部队解放军化，首先必须合并两方不同性质的军事指挥机关，组成解放军绥远军区。为此，经过双方协商成立了机关合并领导小组。姚喆任组长。成员有刘华香、裴周玉、张升初、李振智。董方参加的成员有袁庆荣（原军长）、孟昭弟（保安副司令）、李子俊（政工处长）等。

机关合并的原则是：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物资财产移交不催不逼，交多少接多少；部队借用群众的住房都不移交。军事机关合并的方案是：原国民党华北“剿总”驻绥远指挥所和保安司令部同解放军绥远军区司令部合并；原国民党绥远指挥所政工处同解放军绥远军区政治部合并；原国民党三十二兵站和医院分别同解放军绥远军区供给部和卫生部合并。这次合并，既考虑到了起义部队的特点，又照顾了干部本人工作能力；既体现了“团结改造”的政策，又照顾了干部本人的愿望。所以双方都比较满意。尤其是起义干部，原来怕遣送回家，现在看到仍分配了工作，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许多起义干部家属向我们写信或打电话，表示感谢。

经中央军委批准，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两个军，一个

骑兵师。为了保证整编顺利进行，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元月17日至2月26日，举办了军队高级干部研究班。参加研究班学习的有各军、师、旅正副长官和将去这些部队的政委、主任等60余人。研究班主要学习毛主席对绥远问题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各种制度。学习的方式是：领导报告，大家讨论，畅所欲言，消除隔阂。我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作了辅导讲话。我针对起义干部的思想实际，还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实现解放军化有没有条件？二是有没有困难？对这两个问题，我都进行了肯定的回答。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我讲了4个有利条件：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政治保证；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有利形势；士兵、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可靠基础；大部分高级干部有进步的愿望和决心，这也是实现解放军化的重要条件。在讲实现解放军化的困难时，我也讲了4个不利因素。我这样讲，目的是为了提高了大家实现解放军化的勇气和决心，和使大家对遇到的困难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讨论中，大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人民解放军是否国家化的军队？”“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等问题。在第二次辅导讲话中，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但是，在学习中，有的人怕算老帐，过不了关；有的人怕剥夺军权，身败名裂；有的白天讨论不发言，晚上枕枪睡觉。为了解除这些人的思想顾虑，我们一方面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还做了几项规定。一是讨论中说错了话不追究，不记录。二是不勉强检查思想。三是

允许会客、打电话、上街、看望亲友等。这样，大家学习情绪高涨了，学习态度更加积极，和我们的感情也更加融洽。许多学员积极要求政治干部到部队中开展工作，迫切要求部队实现解放军化。

从2月下旬开始，我们因势利导，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原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六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奕折桂任参谋长，李骥程任副参谋长。下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3个师，1个直属暂编骑兵旅。三十七军是新颁布的番号，以独立第七师为基础扩建而成。原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晋升为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化博知任参谋长，下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3个师，1个直属暂编骑兵旅。原骑兵整编第十二旅（鄂友三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强自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任副主任。下辖1个独立骑兵旅，4个团。

学 习 运 动

组织改编起义部队，不等于原有反动性和封建性的消失。只有通过换思想的学习运动，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军化。

原国民党绥远部队编制庞杂，思想混乱。其中除一部分正规师外，多是地方保安团队、地主武装。其成员大部

分是抓来的老百姓，另有不少特务、惯匪、恶霸、地主、散兵及遣散俘虏。其组织派系复杂，有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同善社、青红帮、龙华圣教会、宗门圣教会、天主教、基督教、秘密教、同志会、革新社、情报组、军统等，又有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后流散逃亡的反革命特务。这些政治派系中，有内外之分，“大圈套小圈”，明争暗斗，培植私人势力。起义之后，少数反动军官还扬言“只换帽徽，不变心”；“要象水萝卜，不象胡萝卜”（外红内不红）；“保存实力，借水养鱼”；“只能整体进步，反对个人突出”。有的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甚至还开办“训练班”，培养私人干将。一些士兵长期受反动封建思想毒害，赌博吸毒。有的强行要挟群众给部队赠送慰劳品，说“老子是解放军还不慰劳？”有的开枪打死群众牛马羊，说“这是草原的野物”。有的奸污妇女，说“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驻安北三团的一个排长居然抢劫合作社的财产，群众说他们兵匪不分。

人民解放军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义部队与解放军的思想有差距，只能通过思想教育来提高。为此，军政委员会在全省组织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统一制定计划，组织领导学习运动。各部队、机关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同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军政干部学习团，分期轮训军政干部（包括不在职的），先后3期共轮训干部4881人。此外，还责成起义部队自行举办轮训队。共轮训连排干部两千余人。省政府在行政干部学校也轮训

了县旗干部1000余人。所有军政机关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有计划地学习时事、理论和政策。

在学习运动中，军政委员会重点抓军政干部学习团。军政委员会设立了无职干部招待所，登记收容了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回绥的无职干部3604人，除安排生产和留用的1000多人以外，均分别送学习团和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军政干部学习团第一期于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教材有《社会发展简史》、《政协文件》、《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少校以下干部上大灶，中校以上干部上中灶，将级干部上小灶。在这期开学典礼上，我和傅作义、董其武都讲了话。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学员们对共产党有了一定了解，思想压力减少了，学习自觉性提高了，开始认识到劳动光荣，有的高干敢于在街上拾东西。有10%的人敢于正视自己，批判过去。但还有10%的人进步比较慢。这少数人中，有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存在着惧怕和幻想。或者认为有靠山，学不学回去照样当长官，或者对共产党心怀成见，一时难于改变。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于2月20日给学员们又讲了话。我分析了学习的状况，肯定了成绩。同时，对阻碍学习的“整体进步，反对个人突出”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我党的土改政策、干部政策等不理解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对国民党能否反攻、第三次世界大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今后的工作部署进行了说明。通过学习，学员们的政治觉悟普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一期学员有现职干部1270余人，无职干部1460余人。

原定现职干部学习1个半月，无职干部学习3个月。由于工作急需干部，学习两个月后就分配了1500余人。经过学习的无职干部，愿回原籍的发给路费，其余除留绥工作外，分别按职安插到山西、河北、山东等地。

1950年6月，我参加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整风的伟大号召。在省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会上，我代表省委作了《更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绥远人民，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7个月来学习的成绩：“在部队解放军化方面，完成了初步的整编工作，连队以上初步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正在有步骤地开始士兵群众工作，及时地平息了反革命和特务所制造的少数部队的叛乱。学习团、政干校已整训完毕或正在培训的起义军政干部有七八千人，各机关建立起在职干部的正规学习制度，均在思想改造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工作中也存在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在我们领导机关中，在某些工作部门和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十分有害于人民事业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错误，在团结改造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某些迁就主义，以及极少数干部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省委号召全体干部在整风学习中克服自身缺点和错误，更好带领绥远人民不断前进。随后，全省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学习运动。

团 结 改 造

1950年元月，华北军区给绥远军区选派1900多名政治

工作干部，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这些同志到绥远后，经过短期培训，于2月下旬陆续分到各部队工作。

政工干部深入部队之后，广泛接触群众，采用个别交谈，开座谈会，上政治课等形式，疏通关系，联络感情，逐步开展工作。首先，在军、师、旅成立政治工作机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行使政治工作职权。第二步组建团政治处。派到各营、连的政治干部由团统一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逐步建立了营和连的政治工作制度。为了实现集体领导制度，在军、师、旅、团建立了军政委员会，在营、连设立了军政领导小组。军政委员会成员由同级军政首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处)长，与下级军政一把手组成。主任分别由同级的军、师、旅、团长担任，政委担任副主任。营、连军政领导小组的组长分别由营、连长担任，副组长分别由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担任。军政委员会和军政领导小组分别为同级部队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命令和指示，讨论决定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干部升调及工作计划等。集体领导的新制度代替了旧制度，旧部队一长制的制度宣告废除。同时，团以上普遍建立了生产委员会，部分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营以下建立了学习小组、生产经济小组、纪律检查小组等组织，并建立了汇报、点名、请假、查哨等制度。各级政工干部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和制度的作用，诚心诚意为士兵服务。如组织伙食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搞好士兵的伙食；废除打骂制度，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传统教育，改善官兵关系；军、师两级分别

成立了戒烟所，收容吸食毒品的官兵，进行学习教育，根治不良嗜好。这些都得到了广大士兵的拥护和支持。

1950年，中央军委号召“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在生产建设中，我们把生产劳动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取得了生产和思想双丰收。据当时统计，部队种地23万亩，其中新开荒地21万亩；完成黄河培堤工程土方115万立方，完成渠道工程土方478000立方，名列全华北之首。

在团结改造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曾遇到少数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的干扰和破坏。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的政治干部开会宣传党的政策，他们无理取闹，冲散会议；政治干部上政治课和文化课时，他们命令紧急集合；他们对政治干部进行侮辱、谩骂和恫吓，甚至组织叛乱。骑兵四师二团的反革命分子公然指着团政委彭志超同志叫喊：“当心葬送了你的小命！”彭志超同志大义凛然，严正答道：“共产党员怕死就不到这里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广大士兵的利益，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反革命分子用乱枪打死了他，并组织了叛乱。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先后策动武装叛变56起，参加官兵3270人，杀害政工干部14人。我们对煽动叛乱的头目进行了坚决镇压，对胁从者加强改造，对进步分子团结鼓励。奉军委命令，又于1950年11月依法逮捕了与国民党保持秘密联系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第三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张璞，骑兵四师师长鄂友三和旅长乔汉魁4人，挖出了祸根，基本制止了叛乱。

在改造部队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

的鼓励和支持。1950年4月，我和董其武奉命到北京汇报工作。我们先后向华北局和政务院汇报后，受到了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的赞扬。周总理指示《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发表我们的报告。4月18日，《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第一版全文刊登。毛主席看到这一报道后，于4月23日晚7时接见了我和董其武。在场的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薄一波。毛主席表扬了绥远的工作。他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蒋介石与人共事是讲权术，搞宗派。因蒋介石为私，我们为公。毛主席谈古论今，和我们畅谈了二三个小时。最后，他勉励我们过好“三关”，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5月12日至25日，我们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总结交流改造部队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落实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绥远起义一周年之际，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发来贺电，赞扬起义部队“一年来由于贯彻毛主席团结进步的方针，由于党、政、军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的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部队政治觉悟水平逐步提高，使军队和地方间、官兵间以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间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并在整训部队、参加生产和肃清匪特等重大任务中取得了成绩。”1951年1月26日，毛主席在我们总结报告上写道：“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易地整顿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广大指战员保家卫国的决心书和请战书象雪片飞向绥远军区。我们把部队这种革命热情报告给党中央和华北局。傅作义也向毛主席建议起义部队参战，为人民立新功。这样，不仅有利于部队实现解放军化，而且对绥远实现解放区化更为有利。毛主席批准了这一建议。1950年11月24日，绥远军区的军、师、旅长奉命到北京接受任务，受到华北局、华北军区和政务院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向我们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易地整顿，准备赴朝参战。

12月10日，傅作义从北京来绥远。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部队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作为抗美援朝的第二线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边章武兼参谋长，袁庆荣为副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为后勤部长，潘瑞征为副部长。各军、师受命后，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层层传达动员，准备出发前工作。各团级单位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拟定行军计划，移交财产，安置伤员。12月22日，董其武和我下达了出发命令。

三十六军于12月23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三十七军于12月23日从陕坝乘汽车或徒步行军至包头集结，25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骑四师从武川县乘汽车到归绥，12月29日从归绥乘火车出发。我和董其武率领兵团机关于12月31日下午5时乘火车离归绥。

部队驻在沧州地区衡水、景县一带，司令部设在景县龙华镇。1951年元月8日，兵团成立了党委。我任兵团党委书记，边章武、姚喆、裴周玉为常委。同时，兵团还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董其武任主席，我任副主席，姚喆、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等为委员。元月11日，在龙华镇召开兵团机关成立大会。我和董其武分别讲了话。

元月20日，我和董其武、裴周玉到北京参加华北军区高干会议。会上，听取了薄一波和刘澜涛的报告。元月30日，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了华北军区会议精神，讨论了1951年兵团工作任务。2月19日，华北军区又电令我和董其武到京接受任务，要求兵团半年完成入朝前的整顿工作。我们回到龙华后，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指示，落实措施，保证完成各项整训任务。

从2月中旬开始，部队首先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特务、反革命分子，自我教育为内容的民主运动。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进行，我们制定了有关政策规定，以便分清界限；组织试点，借以正确指导运动。运动中，我们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新旧对比，讨论为谁当兵，提高阶级觉悟；控诉揭发反动阶级的罪行，肃清部队反革命分子。有的同志脱下自己的衣服，露出被毒打的伤痕，控诉军阀

的罪行；有的拿出母亲的青丝和姐姐的遗书，控诉地主老财的罪行；有的揭发反动军官勾结土匪特务杀害政治干部的罪行。一个战士拿出一件血衣，控诉特务把一个逃亡士兵刺了37刀，并掏出肝肺叫死者父亲吃。这个战士哭得泣不成声，当场昏倒在地。在场群众无不悲痛，愤怒高呼：“打倒军阀主义！”“为阶级兄弟报仇！”在这一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有1600多人受到表扬奖励或立功，有100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800多人提拔为干部。同时，还揭发检举出反革命分子1905人，参加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1924人，交出私藏长短枪133支。对这些人，我们都本着团结改造的方针分别进行了处理：对血债累累、起义后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少数人，以法惩处；对年老体弱的进行转业安置；其余的或留部队工作，以功赎罪，或调入教导大队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

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华北军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制定了部队参战的整编方案。部队整编的基本原则是：保存傅作义老部队的底子，适当照顾各个山头，以体现团结合作政策；年老体弱转地方工作，编余干部参加学习，生活待遇不变；反对强迫命令，做好骑兵下马工作。

3月底，我和董其武、边章武、裴周玉联合签发了兵团整编命令。兵团辖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三十六军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3个师；三十七军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3个师；撤销原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四师独立骑兵旅、三十六军骑兵旅、三十七军骑兵旅，骑兵下马，部队分别并入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的步兵师内；一一一

师部队编入一〇六师，后为空架子师；一〇八师也是空架子师，负责接收管理留后编余人员。部队整编后，战斗力增强了，但缺员相当严重。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河南、江苏征集了两万名新兵，给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也改变了部队的成份比例。新兵入伍后，全兵团又掀起了练兵热潮。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完全成为解放军化的新型军队。

赴 朝 参 战

1951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边章伍、姚喆任副司令员，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王克俊任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升初任后勤部长。并要求我们于8月底完成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1日，毛主席命令我兵团于9月3日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3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同时，还命令姚喆同志率必要的参谋人员于9月2日乘飞机到安东，与空军联司进行会商，联系入朝具体任务。接到命令后，兵团军政委员会即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并派袁庆荣率先遣队提前到安东，筹备部队驻房与入朝前的物资补充问题。9月3日，三十六军乘火车出发；9月5日，三十七军乘火车出发；9月8日，兵团直属队乘火车出发。我们离开驻地时，受到河北省委、政府、军区领导同志和

驻地群众的热烈欢送。当我们路过天津、沈阳时，还受到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沿途所经之处，群众端茶送水，手持彩旗，挥舞鲜花，表达对志愿军的敬爱之情。

9月8日14时，我们兵团直属队到达安东。当天晚上，姚喆同志介绍了入朝的具体工作。第二天早晨，我到镇江公园鸟瞰全市：安市与朝鲜一江之隔，三面环山，一面面临鸭绿江；城市已被美机炸得房倒屋塌。鸭绿江铁桥已摇摇欲坠；远处有10多架轰炸机隆隆作响。全市处于紧张的临战状态。9月10日上午7时，在镇江公园我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会。我作了战前动员报告。上午10时兵团党委召开了会议。会议强调做好团结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防奸防空工作，减少伤亡；严格执行纪律，部队和群众分开居住；加强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与苏军和朝军搞好关系等。同时，军政委员会还向各部队下达了任务，确定了入朝路线。三十六军率一〇六师及一〇七师的三一九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云山，进入价川郡院里，担任院里机场的修建任务；三十七军率一一〇师及一〇九师的三二五团，经朔州、清城镇，进入龟城郡南市郊，担任南市机场的修建任务；兵团率兵直及一〇七(缺三一九团)、一〇九师(缺三二五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龟城，进入泰川郡，担任泰川机场的修建任务。

9月9日下午5时，兵团先头部队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9月11日3时，我们兵团直属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之后，由于路线生疏，道路坎坷，敌机干扰，

夜行晓宿，行军十分困难。11月4时从新义州出发后，我的司机因过度疲劳，吉普车不幸碰到山嘴。我的头部受伤。右眼出血，经急救才脱险。9月18日前，各部队分别都达到施工地点。

为了统一集中领导，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修建委员会。董其武任修建委员会主任，我任政治委员，姚喆和空军司令部后勤部政委杨尚儒、朝鲜检阅相金元凤任副主任。9月16日，修建委员会在泰川郡山城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司令部对修建机场的指示及要求，并确定成立各机场修建委员会分会。价川郡院里机场为第一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一分会，王建业任分会主任，张惠源任副主任，康健民任政治委员；龟城郡近郊南市机场为第二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二分会，张世珍任分会主任，卫景林、冯梓任副主任，帅荣任政治委员；泰川郡的泰川机场为第三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三分会，王克俊任分会主任，工程大队长王连峰、泰川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得兰任副主任。各分会设指挥部、政治部、工程部，材料运输部，分别贯彻执行上级施工计划，保证施工质量和物资供应等。

在施工中，广大指战员以战斗的姿态，不怕流血牺牲，克服各种困难。天寒地冻：战士们提出“心热不怕寒冷，困难挡不住英雄”的豪迈口号。兵团战勤队刘双喜，一天装卸水泥20顿，超过定额两倍；后勤部司机何泽民连续出车7昼夜；炊事员1人做35人的饭，还亲自打柴，送水送饭。缺少工具：战士们提出“劳动和技术相结合，克服困难就是

胜利”，自造工具6744件，大大提高了工效。采石工效提高了84%，运石工效提高了5倍半。在修建中，敌机日夜轰炸，投弹6850多枚，其中定时炸弹1900多枚，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出“敌人能炸，我们能修”，“敌人有钢铁，我们有石头”，在敌机轰炸下坚持施工，并冒着生命危险共起挖定时炸弹900多颗，尽管有的定时炸弹竟深埋三四米。起挖炸弹时，有几十个同志献出了生命。战士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以更高的热情忘我施工，用加快工程进度的实际行动为死难烈士报仇。10月20日，南市机场完工。10月29日，泰川机场完工。11月4日，院里机场完工。3个机场都提前完成修建任务。全兵团共投工107万个，修建宽60公尺跑道共6000公尺，滑行道、联络道共9437公尺，飞机掩体193个，停机坪8个，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

1951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分别向我们发来贺电。中央军委的贺电是：“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干扰下，终于超计划地完成了任务，甚好。”华北军区的电文是：“部队经过此次修建任务的锻炼与考验，涌现了许多英雄，情绪更加旺盛，斗志更加坚强，部队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觉悟有显著提高。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各种工作有了成效。对全体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胜利完成任务，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在修建中牺牲的烈士致以哀悼；对负伤的同志，致诚挚的慰问。望在部队中很好宣传这一胜利，并做好评功工作，以激昂斗志。对牺牲烈士做好登记，转知地方政府及其家属；对伤员病

员做好慰问工作，为部队进一步提高，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同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还授予我、董其武、姚喆、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6人各1枚自由独立二级勋章，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是全兵团的光荣，是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成果。

修建机场任务完成后，正当我们准备开赴朝鲜东海岸参战时，战局已发生了有利我方的重大变化，美帝被迫进行板门店谈判。11月30日，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调回国内整训。12月下旬，部队达到河北定县。在这里，我们发动群众进行评功、庆功，总结抗美援朝参战经验。全兵团共评出立功者2600多人，发展了1000多个党团员。从1952年元月到4月，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安排，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5月，兵团党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关于部队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总结报告》后，我就离开了部队，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岗位。

进 军 四 川

——和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一次决战

杜 义 德

进军四川是向西南进军的组成部分。刘伯承元帅精辟地概括：“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有部署，被动作战。在政策上，尤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①

1949年5月，京沪杭战役后，7月18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作战指示。19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又发出了向川、黔进军的命令。为贯彻前委的指示和刘、邓首长的命令，我第三兵团于6月底奉命自浙赣线之金华、兰溪等地北移，至7月上旬先后抵达芜湖（兵团部）、安庆（十军）、宣城（十一军）、当涂（十二军）等地整训待命。其间，我三兵团在南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了进军的部署和作战方案。刘司令员在会上作了动员

^① 这是刘伯承给二野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

报告。他指出，我们向西南进军，要贯彻军委毛主席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然后回打的作战方针。这不是一般地迂回，是战略迂回，是层层迂回包围。陈赓指挥的第四兵团占领广州后直出云南，封锁国境线；杨勇指挥的第五兵团直捣贵州，占领贵阳后主力向北兜击；三兵团从湘西向重庆、遵义迂回进击。这样，就可以把撤退集中在我国西南的敌人全部歼灭，这叫“关起门打狗”。刘司令员要求我们干部精心策划，不怕吃苦，不怕疲劳，打好最后这一大战役。听了刘司令讲话，我们都很振奋，对这次战役的认识更明确了。向大西南进军是我们在大陆上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最后的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就三兵团来说，除渡江作战有过千余里的追击之外，这是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一次连续追击战。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最后，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作了总结。我和王近山在会上也表了态。当时，我和王近山都是兵团副司令，我兼十军军长，王兼十二军军长，曾绍山是十一军军长。会议确定十军为三兵团之先头部队，到达湘西集结后准时西进突破敌黔东防线直取遵义、娄山关要地，然后向四川迂回进击。十一军、十二军由酉阳、秀山向重庆进击。

一、从安庆到遵义

8月7日，我们十军在安庆市召开了干部大会。我和王维纲政委在会上作了进军动员报告，号召全军指战员坚

决完成这一光荣的进军任务，为解放大西南7000万人民立新功！

1949年8月下旬，十军军直和各师等，分别由安庆、桐城、青阳出发，到合肥乘火车经蚌埠、徐州、郑州到汉口，然后步行经长沙到达湘西的桃源地区集结。为了顺利到达集结地，我和王维纲政委以及二十八师师长陈中民、二十九师师长周发田、三十师师长马忠全率部分随员先行，检查落实部队沿途乘车、吃、住等问题。赵晓舟副参谋长、许梦侠主任指挥军直和部队车运跟进。为了保密，部队在向西南的进军中，以四野部队的面目出现。

我们到了汉口，受到了中南局和四野部队的热情欢迎。9月下旬，部队到达长沙后，四野副司令员兼十二兵团司令肖劲光同志又设宴招待我们。四野部队给我们腾房子、烧开水做饭，并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充分显示了兄弟部队的亲密无间。湖南党、政、军、民不仅妥善地为我们部队解决了吃、住问题，还送来大批慰问信、慰问袋，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10月上旬，我十军经益阳、常德等地，先后到达湘西之桃源地区集结休整。军和各师都以开展爱兵运动为主题召开了党的代表会和党代表大会，总结了前一段进军中的工作，提出进一步发扬三大民主，爱兵尊干，互助互帮，胜利完成下一步的进军任务。10月底前后，部队普遍穿上了新棉衣，准备向四川迂回前进。

11月7日，十军奉命由桃源地区出发，向遵义、桐梓一线进击。与此同时，五兵团由邵阳地区出发，开始向贵

阳进击。我十军配合五兵团向西急进，迅速突破国民党第十九兵团何绍周布防的黔东防线，突入贵州地区，先后占领和解放了凤凰、铜仁、江口、石矸、思南、印江、松桃、湄潭等地，抢渡乌江天险。21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五兵团占领贵阳。从而，与友军一起割断了从川陕甘边南撤川境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与广西白崇禧集团的联系，斩断了国民党赖以苟延残喘的所谓大西南防线，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等川陕甘地区数十万残余国民党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胜利地打开了二野大迂回、大包围的通道，为最后围歼国民党军于川西平原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为了把川陕甘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消灭在川西，十军解放遵义后随即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踏上解放四川的艰苦征程。

二、奔袭川南，不让敌人逃窜黔、滇

人民解放军在川陕甘边、湘鄂川黔边同时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势，使国民党军在宽大绵长的战场上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特别是我军突破川东、黔东国民党防线，大量歼灭宋希濂集团和何绍周兵团，解放川黔大片地区后，国民党整个西南防线面临土崩瓦解。北线，我有强大的华北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南、甘南南攻；东线和南线，我有强大的二野三兵团、五兵团及四野之四十七军西进，川北、川东，敌人无路可逃，从贵州往滇桂的道路已经被堵死，唯有川西、川南是敌人逃逸的道路。为此，蒋

介石急令位于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集团南撤，位于万县地区的孙元良兵团、重庆地区的罗广文兵团及宋希濂集团残部，在迟滞我军前进以后，亦纷纷西窜。刘邓首长洞察入微，在西南战役发起不久就发现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及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目的，并为此而制定了周密的部署。我记得，就在十军挺进贵州的途中，刘邓首长就曾指示五兵团和十军，在川黔敌人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隔断宋希濂4个军和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予以歼灭，是战役的中心。并指示十军，在占领遵义以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五兵团毕节、筠连两路，“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在十军攻占遵义的当天，即11月21日，刘邓首长指出：“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纂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西退之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计算时间，十六军28日可达毕节，12月2日左右可达叙永或盐津，十八军比十六军迟3天，十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纂江到泸县约4天行程，由纂江到叙永约7天行程，由纂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于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可达盐津。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保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兵团亦指示我军，一定要按刘邓首长规定的时限占领川南泸州

地区，完成迂回作战任务。

后来，战局的发展完全如刘邓首长指示的那样，罗广文主力被十一军和四野四十七军压迫在南川以北地区，一触即溃，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刘邓首长电令：“以歼灭罗广文3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达成渡江包围或相推攻占重庆为目的，决以十军左翼与贵阳五兵团主力并策于遵义、桐梓之线西出合江、泸县。”根据刘邓首长的电示，十军进行了部署。决定以二十八师为军的左路纵队，经枫香坝，过赤水，在太安场附近渡长江，然后向泸县挺进；三十师为军的右路纵队，由桐梓开进，取道川黔边的合江县，从合江北渡长江，向川南军事战略要地泸州攻击前进。军直和二十九师随左路纵队跟进。兵贵神速，按预定时间走到就能抓住敌人、堵住敌人，就是战役迂回的最大胜利。于是，我们决定部队在遵义、桐梓休整三两天以后即刻出发。

黔北到川南，数百里内重峦迭嶂，道路崎岖曲折，行军十分困难。为了争取时间，25日，左路纵队即由遵义出发，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翻山越岭、奋勇前进。当日即在枫香坝打了一仗，俘敌保安团300余人。12月1日解放赤水，守敌七十二军一团自赤水河逃窜。二十八师渡过赤水河，沿江攻击前进。此时我们获悉，右翼友邻十二军已于11月30日攻占川东军事重镇、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据此，估计敌部署已乱，其西逃计划可能会提前和加速。为此，我命令各师继续急进。当时，天不作美，细雨霏霏、崎岖险峻的山路又泥泞难行。但部队士气一直很高。

战士们说：“我们快走一步，四川人民就能早一天解放，少受一天痛苦！”工兵为炮兵开道，常常要炸平崎岖路径上的石头。部队过悬岩时，常常遇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涧。上山时大家一个拉着另一个的手向上爬，下山时就蹲着往下溜，不少战士滚成泥人。在多山多雨的川黔地带，部队爬山涉水，无论在黑夜或在风雨中行军，每天行程从未少过80里。二十八师各部队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兼程前进，很快抵近长江南岸。12月3日，八十四团以半个小时的战斗，占领江岸要点太安场，并立即组织渡江。滚滚奔驰的长江，波涛澎湃。部队指战员此时的心情如波涛起伏的江水，难以平静。一个月来长途行军及作战的疲劳，仿佛顿时消失。部队渡江后，分两路向泸县方向前进。16时许占领泸县县府所在地小市，将国民党守军二十一军留守处歼灭。国民党七十二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泸县宣告解放。我右路纵队三十师27日由贵州遵义北之桐梓出发，随即遇到与左路纵队一样难走的路程。在狭隘奇险的黔北道上，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在陡峭的山路上，有的同志拽着马尾前进。有的战马偶一失蹄就跌下深涧而粉身碎骨。三十师经6天艰苦的行军、追击，于12月2日抵合江，将敌截击于合江、泸县交界的五通场以北地区，歼敌1个团。部队随即渡过长江，进入泸县县境。至此，追击北逃守军、向川南实施兜击的作战迂回任务胜利完成。与此同时，左邻五兵团之十六军、十八军经黔西、毕节，进占川南叙永、古宋、纳溪、江安等地，从而封闭了四川境内之敌从川南逸逃云南的道路。

三、追击前进，继续完成迂回任务

重庆及川南广大地区解放后，蒋介石一面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之敌，利用有利地形迟滞我军的同时向成都方向撤离，一面急令胡宗南集团加速南撤，企图收缩防线，在成都地区进行顽抗，尔后向西康、云南突围逃窜。胡宗南集团自11月中旬开始南撤，此时已撤出秦岭山地，主力进入川北地区。其位于汉中、武都之6个军在掩护主力南撤后，也仓惶南逃。孙元良、罗广文兵团被我兄弟部队沉重打击后，自东向西猬集，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部亦退回简阳及其以西地区。根据上述情势，刘邓首长于12月6日作出“继续西进，完成切断敌之退路的部署”。刘邓首长指出：“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大足、内江、荣县、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并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指示我十军和友邻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多，以3天最多5天为度”，尔后“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要我和十六军王辉球政委、尹先炳军长等“共同拟定前进计划”。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我和王政委统一指挥。并告诫我们：“由于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出充分的战斗准备。”兵团也指示我们：“合江、泸县之线，不必集结，迅即按指定方向，攻击前进。”鉴于任务重大，时间紧迫，我们决定即

刻向内江、自贡、乐山地区追击前进，西渡沱江，以卡住敌人，堵死其经上述地区逃向滇、康的道路，完成下一步迂回任务。还决定仍分左、右两路纵队前进：三十师仍为右路纵队，二十八师及军直仍为左路纵队。具体部署是：三十师沿隆昌、内江、资中方向，首先渡过沱江，追歼内江地区之敌，下一步再指向井研，西渡岷江，攻歼乐山地区之敌；二十八师沿富顺、自贡、荣县方向，追歼上述地区之敌，然后西渡岷江，与三十师取齐，和友军一起卡断敌人退路。军指挥部率二十九师，沿富顺、自贡、荣县方向跟进。

按上述部署，各师出泸县继续向西追击。部队这时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从湘西集结地出发，到迂回至川南，已经长途攻击行军一个多月，不少战士的双脚都已血泡遍布，行军十分困难。但为了截住敌人，完成任务，打好在大陆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最后一仗，他们咬着牙，向西北猛追猛插。担任前卫的八十四团二营战士们说：“只要能抓住敌人，再艰苦都没啥。”敌人在我猛烈打击下，丢弃行李、辎重、枪弹、衣物争先逃命，狼狈已极。二十八师八十四团追至敦和砦，俘守敌警备团残部140人，12月4日攻占富顺。我右路纵队先头部队攻占富顺后，八十二团发现敌人西逃，即以日行240华里的惊人速度奔袭自贡，尾敌穷追。自贡守敌已向西逃窜，伪市长率领自卫队、伪警察向我投诚。自贡解放。马路上大街上的市民，一时人山人海，鼓掌声、欢呼声、歌唱声响成一片。为了歼灭敌人，部队在自贡未作停留，乘胜连续西进。在程家场、

双石桥等歼敌一二二军三十五师500余人，6日解放荣县，奉命暂停集结。由于我们追得紧、跟得快，有的敌人作了俘虏还如梦未醒。

我右路纵队三十师在合（江）泸（县）边五通场歼敌四十四军1个团后，分两路向隆昌方向追击。12月5日22时许，八十八团进至福集场时，得知逃敌在太和场一带宿营，便忍受着急行军的饥渴，轻装追击前进。天黑如漆，八十八团以夜袭动作，经敌数道岗哨，突入敌军内部，歼敌四十四军一〇五师师部及1个团800余人，其残部1500余人在副师长率领下向三十师投诚。在八十八团歼灭一〇五师的当晚，八十九团在兴隆场歼敌四十四军军部。接着，我右路纵队解放隆昌，沿成渝公路向西北继续追击。6日，解放内江，攻占成渝线上的枢纽之地。继三十师先头部队八十八团乘车前进，7日渡过沱江，解放资中。至此，十军控制了长江以北，南起泸县，北至资中，西迄自贡，荣县广大地区，为战役迂回任务的完成跨出了新的一步。

四、西渡岷江，彻底切断敌人西逃退路

十军占领泸县、自贡、荣县一线后，与兄弟部队一起遏止了敌人的南逃，对于歼敌于成都平原，具有重要意义，但尚未完成迂回任务。因为大邑、邛崃、夹江、乐山一线仍可能成为敌人逃出围歼流窜滇、康的通路。遂决定攻占井研，西渡岷江，夺取邛崃、新津、丹棱等一线要点，

与友邻部队配合，彻底切断敌人西逃的退路，最后完成对川陕甘地区逃敌的封锁包围。

十军在荣县进行了短期整顿以后，即向部队发出“抢渡岷江，把胡匪包围于成都地区，截断最后一条逃路”的命令，分两路向井研和岷江齐头并进。二十八师、二十九师（缺八十六团）为左梯队，出荣县，指向岷江；三十师（附八十六团）为右梯队，出资中，指向井研。12月12、13两日，左梯队向荣县西进，14日即在岷江前哨阵地竹园铺与敌人接触。竹园铺位井研县南，距荣县105华里，系井研重镇，四面环山，周围多水网稻田和山坡梯田，为渡江必经要点。猬集成都、新津地区之敌，在我西进大军严重威胁下。为夺路突围、逃脱全军覆灭的厄运，以胡宗南集团二十七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进至岷江东岸井研、竹园铺地区，企图阻止我军推进、保其翼侧安全，以便争取时间布置岷江防线。九十一团系胡宗南嫡系，全为美式装备，较精锐，在南撤中未遭我军歼灭性打击。该团5日前空运至此。为了让部队官兵为其卖命，据说胡宗南给每人发了两百块大洋。该敌到达后，即积极抢修工事，构筑阵地，形成以竹园铺为中心的环形防御阵地。战斗打响前，二十八师八十二团经观山场进至观音坑、门坎山以南地区，准备侧击该敌；八十三团经来牟铺、潘家寺至高店子地区，由西向东迂回攻击；八十四团则进至来牟铺隐蔽待机。这一仗打得很苦，二十八师牺牲不少干部、战士。八十三团三营营长张德银同志、七连指导员王善修同志等，都是在这次作战中牺牲的。经14、15两日激战，全歼该敌，扫清

了渡江障碍。15日下午至16日，二十九师在慈本溪强渡岷江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阻击。与此同时，十军右梯队三十师和二十九师八十六团，12月12日从内江地区出发，亦向岷江挺进。

岷江，系四川四大江之一，江阔水深，水流湍急。胡宗南空运其主力第一军在岷江两岸及虎溪渡以东地区，占领深达10余里的险要纵深阵地，企图固守，阻我渡江，以掩护其主力向西康退却。三十师于12月14日10时许进至虎溪渡东10里处，得知敌已于一天前到达虎溪渡1个师，且已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于我军进攻不利。为了扫清渡江的障碍，三十师决定趁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寻敌防御薄弱部位进行突破，然后将守敌压缩于岷江东岸，围而歼之。15日夜，八十九团在瓦子坳、虎溪渡接连两次战斗，歼敌九十二团一部，余众逃向西岸，在岷江西岸重新组织防御，并控制了所有渡口船只。在此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如若不能按时渡江，势必延误整个右梯队的进击时间，就给敌人留下一分沿川康、川滇公路逃掉希望。使整个战役迂回任务受到影响。这时，八十九团战士乘单人橡皮船冲向敌岸，在敌人的火网下夺回渡船，渡河成功，并直插敌师部，捣其指挥中枢。敌随即全部西溃，向丹棱逃窜。我三十师遂在虎溪渡、青神两地强渡岷江。至此，敌人妄图依靠岷江天险阻我进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十军各部队渡过岷江以后，乘胜发展，三十师于17日在白马铺、东瓜场歼敌一个师。二十八师分路经新路口、吴街子、桂花场地区，向丹棱急进。追至丹棱，歼敌一〇

四师一部，一三五师向我投诚。17日，解放丹棱。19日，解放蒲江，伪自卫团700余人向我投降。二十九师于17日向眉山进击，眉山守敌一军一师溃退，我歼敌一部，解放眉山。继于18、19日推进至迴龙场、高桥、邛崃、固驿镇一线，歼敌骑一团及暂编三师各一部。三十师继白马铺、东瓜场歼敌后，进占西来场要点，先后歼敌一〇四师、一〇六师各大部。至此，我军控制了青神、眉山、丹棱地区各要点。与此同时，五兵团之十六军16日攻占乐山、夹江，17日攻占峨眉、洪雅，19日进占名山，渡过大渡河，在峨眉西南活捉南逃的宋希濂，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往康、滇的道路。

五、移师新津，围歼成都平原上的国民党军

十军胜利完成迂回任务后，调整部署，移师新津，在新津以南地区集结备战，参加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其它猬集于成都平原的国民党军。此时，刘邓率领的二野、贺龙率领的华北十八兵团及四野四十七军、一野第七军等各路大军在击溃敌人在涪江、沱江、岷江沿岸和秦岭、剑门的抵抗后，占领了成都通往西昌、彭山及成都通往雅安、邛崃公路，进到成都以南和西南之新津、双流、大邑以西指定地区。十八兵团进到合击位置绵阳、江油等地，我南北两路大军从四面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的大包围即告完成。猬集成都平原的孙元良兵团和宋希濂、罗广文残部，

撤至广汉、金堂、什邡、彭县一线，胡宗南集团之第五、第十八兵团已撤退集中在成都及其周围新都、新津、双流等地区，其第七兵团撤至成都以北之德阳、三台地区。国民党头子蒋介石在其军队被围于成都平原、濒于覆灭的困境下，将指挥权交给胡宗南，从成都乘飞机逃跑。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南突围和防我对其割裂歼灭，急速收缩，构筑工事顽抗，进行垂死挣扎。

成都及成都以南、西南之新津、双流地区，地形平坦，战场开阔，道路纵横，交通方便，便于我大兵团作战，也便于围歼敌人。因当时进军迅速，巩固地方的任务较重，陈锡联司令员、谢富治政委及王近山副司令员均留在重庆及川东。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协力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21日，刘邓首长决定由五兵团杨勇司令员和我统一指挥三、五两兵团5个军。并指示杨勇司令员率兵团指挥机构赴我处会合，召集各军领导开会，提出作战方案。刘邓首长向我们指出：我军占领乐山、青神、眉山、邛崃、大邑一线后，胡宗南集团等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提醒我们，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要严防轻敌乱碰，而必须十分慎重。又指出：“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杨勇司令员和我在仔细分析敌情以后，于12月25日对围歼胡宗南第五兵团作出如下部署：十六军四十六师、四十七师进击蒲江东北之敌，四十八师由大兴场开邛崃，配合十二

军侧击敌人；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西北出寿安场；五十三师由眉山以东向简阳西南三岔前进，配合十一军堵击可能向简阳逃跑之敌；十军除留一个师住新津外，另两个师由新津南向西南尾击敌人；十二军扼守、巩固邛崃固驿镇之阵地；十一军移集简阳及以西地区，堵击可能由成都向简阳逃跑之敌，力求在运动中将敌全歼。

各部队按指定位置集结就绪，并迅速调整好了队势。在此之前，刘文辉、邓锡侯等在彭县宣布起义，敌十六兵团于21日在金堂地区起义，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召开军以上高级军官会议。给注定要失败的部队打气，自己却于23日逃走。被围于新津、大邑等地的胡宗南第五兵团李文部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仍妄想挣扎脱逃。24日晚，趁我调整部署之际，分左、右两路沿新津河南岸和新（津）邛（崃）公路向西突围。十军决定在所担负的作战范围和方向予敌以歼击。敌人出新津以后。象一群没有领头的羊群，在川康公路上乱挤乱撞。三十师继22日、23日在新津西南狮子山给敌李文兵团以打击后，24日，以两个营的兵力突入铁溪桥。两支部队犹如锐利的两把尖刀，楔进敌人两个军中间，插进敌人心脏。我机枪连向敌人猛烈地扫射，打得敌人马翻人仰，仓惶溃散。八十八团三营机枪连长马天邦一人掌握两挺重机枪，打了4000余发。射手袁朝玉抱着机枪扫射，一人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不知所措。李文兵团开始突围后，杨勇和我命令各军于25日向敌发起全面攻击，我根据两个兵团5个军总的部署，将十军3个师分为互为掩护的3路。右路为二十九师，首

先夺取新津东飞机场，后出朝场、唐场、大邑；二十八师为左路，夺取新津后，出新津、羊场，向邛崃方向追击；三十师居中，由狮子山向西平行追击，经羊场、邛崃、固驿镇插入敌兵团部。

25日10时许，待部队发起总攻后，二十九师按预定方向西出朝场、唐场、大邑。敌人在“赶快走呀！后面追上来了！”的狂叫中，沿路到处丢下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及其它军用物资。敌人丢下的这些东西，一时成了我们勇猛追击的向导和路标。昔日所谓的国民党王牌李文兵团，此时被分割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的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来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三十师以八十八团由永兴场经羊场、固驿镇与敌齐头并进，一部插入敌兵团部，将敌人指挥系统打乱。八十九团由牟场向西来场方向插入敌背后新巷子地区，猛追猛打，俘敌5000多人。八十七团在“坚决把残匪消灭在成都平原上”的口号鼓动下，连夜追击，26日晨在冉义镇附近活捉敌九十军参谋长。俘敌数百，27日与兄弟部队将敌九十军之五十三师、三三八师包围在大邑、邛崃间，活捉九十军军长、五十三师师长，全歼九十军军部、五十三师师部及其部队。正当我在军指挥所里，既为三十师的战绩高兴，又为得不到左路二十八师的战况而焦急的时候，接到了二十八师在大堰坝以西地区全歼敌军数千人的消息：26日20时许，他们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敌九十军残部。27日晨，在大堰坝以西地区与敌五兵团接触，敌五十七军一部投降，追敌一军4个团缴械。至此，十军参加解放西南、解放四

川的作战结束。整个川西平原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除起义者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四川首府——成都回到了人民手里。

战役结束后，我向成都远眺，心潮澎湃，万分激动：今天的胜利真来之不易啊！我们从华东到湘西，从湘西到成都城外，转战7000余里，仅十军就牺牲了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郭广智以下271人。当时，我们多么想进城去看看这座解放了的天府名城，但刘邓首长命令：“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城！”真是令行禁止！二野部队一兵一卒没进成都城，同时，为了保证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到来之前，保持城里的秩序，防止敌人的破坏，我曾给市内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打电话，要他们维护城里的一切。事后证明，成都未遭破坏，一切保存完好。

我们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将战斗中缴获的大量黄金等贵重物品，用20匹骡马运到重庆。之后，我们又在江安活捉了化装潜逃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此役，从湘西桃源出发开始算起，历时59天，经过了湘西、黔北，跨越川南、川西，翻过武陵山脉、娄山山脉等大小山百余座，横渡辰水、乌江、赤水、长江、沱江、岷江等江河数十条。在刘邓首长的正确指挥和友邻的密切配合下，继解放贵州凤凰、松桃、铜仁、江口、德江、印江、思南、绥阳、石砭、湄潭、遵义、桐梓、仁怀、赤水后，又解放了四川合江、泸县、隆昌、富顺、自贡、内江、资中、威远、荣县、纳溪、丹棱、井研、蒲江、新津、眉山等

29座县城，毙、伤、俘敌九十军军长周士瀛以下官兵54000余人，并争取了数万国民党军向我起义、投诚。我们十军与兄弟部队共同完成了把敌人消灭在川西伟大的战役任务。

关于1946年6月23日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的一些回顾

刘 晓

从延安回上海，接受党中央指示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甫告胜利，我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出发，回上海主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我从延安出发时，带了一支干部队伍到晋察冀、山东、苏北等解放区和上海等大城市去参加工作。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间到达山东临沂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驻地。那时蒋介石企图撕毁国共双方代表刚刚正式签订的《双十协定》，调集80多万国民党军队和数十万日伪军，向我华东、华北、东北等解放区进犯。华东局负责同志都在紧张地部署力量，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侵犯，保卫解放区。我在临沂稍事停留，就直赴江苏淮阴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驻地。

当时上海地下党由中央直接领导，还就近由华中分局具体指导。因此，我在淮安停留了一二个月时间，为出发去上海做准备。华中分局的负责同志邓子恢、张鼎丞、谭

震林等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对政局的分析和我党的对策，并研究了上海地下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那时，全面内战的危机已不可避免。根据党中央的分析指出：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逆流达到了高潮。面对蒋介石的反动嚣张气焰，党中央决定：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坚决予以揭露、还击，不作丝毫让步；但是只要蒋介石反动派不把和平谈判的门全部关闭，我们还是要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坚决拥护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避免挑衅，积极准备，尽量争取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

对于上海地下斗争，党中央又于1946年4月指示，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在一个长时期里，国民党在上海仍将占优势，力量对比基本上是敌强我弱。因此，上海地下工作将是长期的，坚韧的；必须注意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争取中间分子，造成深厚强固的社会基础，以待决战时机。在工作作风上切忌犯急性病，只顾眼前利益。同时对国民党的各个派系要进行调查研究，利用矛盾，利用合法，采取斗智，善于斗争；必须注意隐蔽党的组织，明确秘密工作的原则。要唤醒人民注意全国局势，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46年春节刚过，我绕道从南通天生港上船回到上海。一到上海即和刘长胜、张执一老同志联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对上海工作的指示，并根据上海情况研究如何贯彻执行。这时上海分局尚未成立，中央指定我仍负责主持上海

地下党的全面领导工作。1947年1月16日中央才指示成立上海分局。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委员有刘少文、钱瑛。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成立

抗战胜利后，上海地下党在刘长胜、张执一等^①同志领导下，一面坚持长期隐蔽，一面放手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开展争取工人的生活权利、学生读书权利的斗争；又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实行独裁的运动。因而迅速地壮大了力量，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群众通过争取切身利益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大大提高了觉悟。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职工和学生组织进一步建立和扩大。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先成立开展助学运动的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简称“助学联”），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学团联”）。各行各业的职工在反对国民党包办、分裂、压迫，坚持民主团体合作的方针下，成立了沪东、沪西工厂区和闸北平民村各业工会；百货、银行、商店的职工和小学教师也都建立各种

^① 抗日战争刚胜利，党中央曾经有过解放日、伪占领的大城市的决定。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同志受命在日本表示无条件投降后就奔赴上海，准备组织群众武装起义，配合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里应外合地从日、伪手中解放上海。可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党中央决定停止执行上海武装起义的计划。

形式的联谊会。到1946年上半年，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二三百个，参加的职工有二三十万人；参加全市的“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大、中学校已有一百几十个。基本群众已组织起来，党的力量在群众运动中有很大的发展和增强。

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党对文教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派了罗叔章来上海协助我们工作，经潘汉年、张执一介绍给我。我则以上海关勒铭金笔厂董事身份出现，参与和配合做了一些统战工作。我们通过不断揭露国民党的内战、卖国独裁政策，使他们日益觉悟，并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接着我们又进一步推动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各工会、各学生团体、妇女团体、教育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及工商团体等53个单位（以后发展到91个），于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为上海人民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会上选出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沙千里、闵刚侯、沈肃文、胡厥文、孙晓村、罗叔章、盛康年、胡子婴、汤桂芬、韩武成、秦柳方、甘田、蒋学杰、叶克平、王本鸣、李传庆、彭文应、沈志远和赵家彬等29人为理事。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各项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5月的形势与周恩来指示

5月初，国民党大力部署全国性内战，百万大军进逼各解放区。何应钦、白崇禧亲自调集30余万大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进攻苏、豫、皖等地为策应。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根据中央关于积极准备，尽可能推迟全国性内战爆发时间的方针，中共代表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议协商停止中原内战，并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到宣化店去视察。5月10日在汉口军事三人小组谈判关于中原停战问题，获得协议，但国民党随即破坏，分6路进犯中原解放区。

5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取得歼敌10000余人的辉煌战果后，主动撤出四平街，并宣布以自动撤出长春的重大让步求得东北和平的实现。5月24日，民盟代表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立即停止东北内战。重庆各界人士发起签名，发表宣言，呼吁和平。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自6月6日起在东北停战15天。周恩来也发表声明同意并希望国民党变暂时休战为长期休战。但东北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并未停止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中共中央重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南京局。同月，中共代表团在上海马思南路（今思南路）筹设上海办事处，党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负责对国民党的谈判、和开展爱国民

主运动的上层统战工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亲自对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为上海地下党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阴谋，建立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面对国民党进一步扩大内战的形势，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京局几次给上海地下党以指示：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要在斗争中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千万避免提出过左的口号与行动。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重庆局^①会议上，分析内战有全面爆发的危险，同时注意到在上海我地下党有一定力量，有条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决定派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于4月份秘密来上海，进行实地视察，分析形势，总结学运经验，加强对上海的青年、学生工作的领导。我们研究了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抓住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迫切愿望，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政治斗争，以集中表达群众的要求和力量，揭露敌人，

^① 中共中央南方局1945年12月改名为中共中央重庆局，仍由周恩来任书记。重庆局的任务和管辖地区与南方局时期基本相同。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来南京。中共领导中国南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移到了南京，中共中央重庆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

壮大自己，并通过进步刊物及各种民主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6月8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阎宝航、包达三、盛丕华、叶圣陶、茅盾、巴金、许广平、周建人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以及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经过学委系统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准备，6月13日交通大学学生成立反内战救灾运动委员会，接着圣约翰大学、之江、沪江、大同等大学也纷纷成立反内战团体。各校开展了各种反内战活动。麦伦中学、启秀女中、上海女中等校也纷纷发表反内战宣言。

在反内战呼声中，6月16日召开了全市总结尊师募捐活动的联欢大会。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原在助学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敬师运动，国民党不予承认，并发起官办的“尊师运动”，学委决定贯彻统战政策和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经“学团联”通过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疏通，促成谈判，改名为上海市学生尊师运动，由教育局、“学团联”、学生总会三个单位联合举办。这样，“学团联”运用合法手段，联系的学校从98所扩大到159所，组织和发动了2万名学生上街劝募，使这次群众性的尊师运动蓬勃地开展。社会各界也都动员起来，文艺界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著名京剧、越剧演员为尊师运动举行义演，给了很大的支持。6月16日全市100多所大、中学校5000多学生在天蟾舞台举

行尊师劝募庆功联欢大会。陈鹤琴任大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要求民主，争取和平，立即停止内战，裁减军队，解决教育危机。林汉达呼吁从外人手中收回主权，希望上海学生加强团结，站在争民主、反内战的前列。陈鹤琴宣读了全体学生要求的5条意见，大会予以通过：立即停止内战，减低学费，提高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生活和职业，救济失学同学，上海学生团结起来，阻止内战，维护国家一切主权。这次大会使群众认识到教育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为发动全市同学参加全市人民争和平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作了充分思想发动和组织上的准备。

冯文彬在学委负责人陪同下坐在学生群众之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大会。学生的行动迅速地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响应。上海妇女界300人也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立即停止内战。

6月19日全市72所大、中学校发起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永久停止内战，号召全市同学开展反对内战的签名运动。之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被选为正、副主席。两天后，又有48所学校参加。同时，大同大学暨附中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反内战委员会，决定立即停课7天，延期考试，进行反内战宣传。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临大同大学加以阻挠，学生即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期间参加反内战争取和平斗争的群众，包括了工人、农民、学生、店员、公教人员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上

层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了上海市各界反美反蒋的广泛统一战线。

反内战运动高涨 与各界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

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正值东北休战即将期满，中原调停失败，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全国人民的心情都异常焦急和忧虑。中共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岗适时地向周恩来提出建议，由上海市人民选派代表团赴南京进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得到了周恩来同意。我从我们三人——刘晓、刘长胜、刘少文（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上海工委的会议）见面联系得悉了这一指示。潘汉年^①也通过张执一^②向刘长胜作了传达。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进行了讨论研究。参加会议的有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和我。我们根据中央关于“不要提过左的口号和行动的指示”，决定通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立即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欢送代表和举行游行示威，以造成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声势，扩大影响。并指定由张执一在党内担任欢送和平请愿

^① 潘汉年系统是中央情报部派驻在上海一个单独工作系统，当时潘汉年有时也参加上海工作委员会会议，而刘晓、刘长胜与潘汉年之间也建立有定期与不定期的联络点。

^② 张执一当时在潘汉年系统下工作。

团和游行示威的秘密总指挥。由张执一、张承宗负责具体组织这一工作。各界都设有联络员，张祺、陆志仁、张本、吴学谦、马飞海等参与指挥与联络工作。大概在19日，我和张承宗同志向学委张本、吴学谦、陈一鸣传达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要求在游行中以学生起带头的组织和公开的指挥作用。同时由张承宗具体布置陈一鸣（当时负责“学团联”党团的领导），由学团联党团书记黄振声联系各界与各校，组织学生纠察和游行队伍。刘长胜也向张祺等同志传达，要求工委、教委、职委等发动群众欢送代表并参加示威游行。

经过各方面的广泛协商，推选了11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这11名代表是：

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原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

黄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

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①

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纲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

雷洁琼（女、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① 胡厥文因故于次日抵宁，未与代表团同行。

吴耀宗（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

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代表）

马叙伦被推选为代表团团长，胡子婴为代表团的秘书长，罗叔章为秘书。

我们逐个研究了代表人选，认为这些代表都是各方面知名人士，有些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就一直坚持在上海，有些在抗战时期就和我党在重庆有密切的交往，他们和上海各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较大的号召力，推选他们作为上海人民的代表是适当的。

为了组织好上海人民团体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华岗还和马叙伦商谈，并推动他和上层人士去商谈。许涤新对盛丕华、张纲伯等人也进行了工作。上海工作委员会还通过上海工商界双周聚餐会的组织形式座谈形势（这双周聚餐会以前就有周公馆方面的同志参加），这一聚餐会是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包达三家中举行，周公馆方面出席参加的有董必武、李维汉、华岗、许涤新等。董老曾较多较集中的和大家讲了关于反内战、争取和平的问题。

我在张执一、罗叔章协助下也亲自做了上层工商界民主人士的工作。我曾参加了包达三和龚延芳家中的聚餐会对他们进行工作。龚延芳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我曾对龚说过：“上海很重要，你们要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龚延芳说：“我资格不够。”我说：“你是宁波人，

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么！就很有资格。”包达三说：“国民党这样卖国，中国没有共产党则不行，有爱国心的人都不主张打内战。我可以牺牲一切。”我建议大家要胆大心细，要提高警惕。我和罗叔章也参加过盛丕华、张弼伯家中举行的聚餐会，一起交谈有关反内战问题。他们都表示要坚决去南京，代表上海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吴耀宗（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还代表大家草拟了一封给马歇尔的英文信，严正表示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

“六·二三”反内战游行与下关惨案

6月23日清晨，上海各界包括大学、中学、专科学校、中学教师职业保障会、小学教师进修会、各职业工会、中纺公司所属各纺织厂工会、各大公用事业工会、百货业、西药业、新书业、银钱业等300余单位的学生、教师、工人、店员从四面八方火车站集中，欢送上海人民代表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到广场的群众有5万之多。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首先到达北站，维持北站广场秩序，贴标语，发宣言，高唱革命歌曲。紧接着百货业和上海电力公司职工会等工人队伍即到来，130多个大、中学校的学生也陆续来了。整个广场沸腾起来：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等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到车站送行。

约9时许，在车站广场举行了欢送大会，王绍鏊、黄延芳、雷洁琼、陶行知、林汉达、吴晗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相继讲了话。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共同提出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主张，代表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心意。

上海地下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和中央青委的冯文彬都到了现场。张执一、冯文彬、张承宗和上海学委张本、吴学谦、李琦涛等负责人就在车站附近的指挥点里就近指挥。代表们上车以后，张执一、冯文彬还到车厢里去看了一下。我和刘长胜也到北站，看到群众场面声势浩大，情绪激昂慷慨，我们十分高兴。

送走了代表以后，各界群众队伍以学生界带头，圣约翰大学学生队伍为前导进入市中心，又举行了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写标语、散发《上海市欢送为呼吁和平入京代表宣言》、《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为拯救国家危机呼吁和平宣言》等，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响应，无数群众纷纷自动参加了游行，形成了反内战，要和平的洪流。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游行队伍通过市区至复兴公园才解散。

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代表们就受到携带武器的特务和“路警”的监视。车到镇江时，就有一批伪装“苏北难民代表”的特务上车，对代表们无理纠缠，要求代表下车与“难民”见面。虽遭拒绝，他们仍赖着不走，使火车耽搁了约两小时，引起了旅客们的公愤，特务们才被迫下车。当火车到达南京下关，代表们下车后即遭受到埋伏在车站的大批特务凶残的围殴达五六小时之久，造成了4名代表重伤，前来采访的大公、新民诸

报记者亦遭毒手。这就是震惊中外有名的“下关惨案”。

当时周恩来正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他闻讯后，即和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邓颖超等同志赶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周恩来还在梅园新村宴请了请愿代表，向他们介绍了形势，揭露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并听取了代表们对和平的要求和愿望。毛泽东、朱德也代表中共中央致电慰问。我们是当天晚上听到了代表们被打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牵挂他们的安全。

“下关惨案”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上海人民群情激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并决心为和平而继续奋斗。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来电对代表们表示慰问。

周恩来对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及同志们安全极为关切。他通过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转给我一张纸条，询问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有没有暴露？如有暴露，应立即组织撤离。他还再次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和坚韧性，告诫我们要注意组织隐蔽，注意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检查了工作，将检查的结果向党中央和周恩来作了汇报。

罗叔章去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王炳南等，并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和平请愿工作。周恩来认为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工作是做得好的，这次来南京反内战要和平，对全国已起了很大影响，并指示代表们在南京不能久

留。

马叙伦等人民和平请愿代表6月29日下午离开南京时，在机场发表了简单谈话，他们一致殷切希望和平。马叙伦说：“我们总算尽了力量，我们还是满意此行的收获的。”黄延芳紧接说：“我们都是无党派的人，我们见了蒋主席、马歇尔、周恩来。大家都说要和平，我们倒要看前途怎么样？看谁会欺骗我们。”包达三也说：“只要一打仗，中国人民即无法生活。”阎宝航接着说：“我们将继续为反内战、争和平尽力。”

代表们回到上海后，我和上海工作委员会的许涤新等负责同志还分头去拜访了代表中的上层人士，对他们进行慰问。他们都表现很好，不因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殴辱而有任何怨言，相反的都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更加坚定了反对内战的决心。

“六·二三”运动取得成功的经验

“六·二三”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它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是上海人民从抗战胜利初期对美蒋存有幻想到识破其反动面目的一个大转折。由于国民党蒋介石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竟敢公然镇压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这就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看清了蒋介石破坏和平，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

从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把“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

“六·二三”运动也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第一次大汇合，也是大检阅。通过这一运动，我们对上海革命人民进一步组织和动员起来了，培养和锻炼了党员和各级干部，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扩大和巩固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大大地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我们能领导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主要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对局势有正确的分析，对上海工作有正确的指示。尤其是周恩来，随着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破坏和平不断扩大内战，及时地指示上海的工作，从要作好两手准备转到要开展广泛的反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并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果断地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去南京请愿。同时也由于上海地下党及时地发动与组织好各界群众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期在日帝统治下生活的上海人民，对敌伪极为仇恨，对国民党有正统观念，对美帝有幻想。我们抓住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不断地揭露国民党一连串破坏和平，扩大内战的行动，宣传了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使群众从事实上认识到国民党没有任何和平诚意，从而纷纷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逐步形成了“六·二三”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我们能领导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织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去南京请愿，还和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有着密切的联系。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和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对党外民主人士推心置腹，亲

自做了大量的形势教育工作，使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与蒋介石比较亲近的人，也投身到反内战要和平的群众运动中，组成了广泛的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当上海代表挨了打，流了血，受了伤，国民党特务要他们回上海时，他们都说：“我们是代表上海几百万人民的。内战打不得，我们要求蒋介石下令不打内战。”他们能这样坚决，不是偶然的，是我党长期工作的结果。

“六·二三”运动能取得成功，也是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抗战八年积累起来的力量基础上，又经过10个月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工作，广交朋友迅速建立起工人、职员、学生、教师、文化界等的群众组织，击破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同时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党的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党员也深深地隐藏在群众之中，团结群众，积蓄力量。因此，到1946年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时，我们能够迅速有力地领导群众投入斗争。

总之，“六·二三”运动能获得成功，主要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正确和及时的领导；由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地下党共同配合、协作，统一部署；也是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和基层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协同作战的结果。

* * *

6月26日，国民党终于撕下假面具，以3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我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新四军五师被迫突围，全

面内战由此开始。7月1日，何香凝、彭泽民、蔡廷锴等联名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和各党派代表，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7月3日，上海文化界包括文艺、戏剧、电影、音乐、漫画、木刻等方面260人，对时局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镇压。7月11日暗杀了昆明的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朴，7月15日又枪击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招待记者谈话时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的一种反动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

8月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发表声明宣布调停无效。8月1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坚持内战、独裁，和平谈判就此破裂。国民党终于完全彻底揭下了欺骗人民的假面具。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更加威胁到全国和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国民党统治集团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前，通过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转给上海地下党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央指示，指出国民党地区黑暗时刻又到来，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准备在5年时间内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这一指示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上海地下党在党中央领导下，更进一步贯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七大”路线和地下工作的

“十六字”方针，和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全面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形势发生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新变化时，我们又迎来了1947年5月上海和全国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6期）